

# 照金革命史话

中 共 铜 川 市 委

编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 《照金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主 任：冯新柱      辛拴明

副主任：张应龙      姚文琦

成 员：何建平      谢常山      刘建设      刘玉平      梁月兰

主 编：谢常山

副主编：刘建设

编撰组成员：皇甫江      杨 妮      许 征      王亚东

梁晓沛      赵 瑛      王都喜      董秉坤      姚志贤

审 稿：姚文琦      刘玉平

# 序 言

冯新柱 辛拴明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之际，《红色照金》系列丛书正式结集出版了。怀着敬仰之情，认真阅读了这套沉甸甸的史料，那一段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峥嵘革命岁月一幕幕呈现，使人心潮澎湃，思绪难平。

照金这片红色的热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3 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燃起了西北革命的燎原之火，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做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最终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出发点，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革命根据地。

“坚定信念、不断探索，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坚韧不拔、顾全大局，忠诚于党、敢于牺牲”的照金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成为后来延安精神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铜川人民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艰苦奋斗、锐意进取，谱写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豪迈诗篇，老区面貌和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照金，以其峻美的自然风光和特有的红色文化，已成为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国防教育基地；如今的铜川，秉承照金革命精神，正在向经济强、文化兴、生态美的全国知名休闲养生城市阔步迈进。

为永远铭记照金这段光辉的革命斗争史，继承和弘扬照金革命精

神，中共铜川市委与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策划编印了《红色照金》系列丛书。编纂了大量有据的史料，收录了一些民间叙述，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生动翔实地介绍了照金及铜川的革命斗争历程，展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认识、了解和宣传照金革命史，研究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谨以《红色照金》系列丛书献给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

让我们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先烈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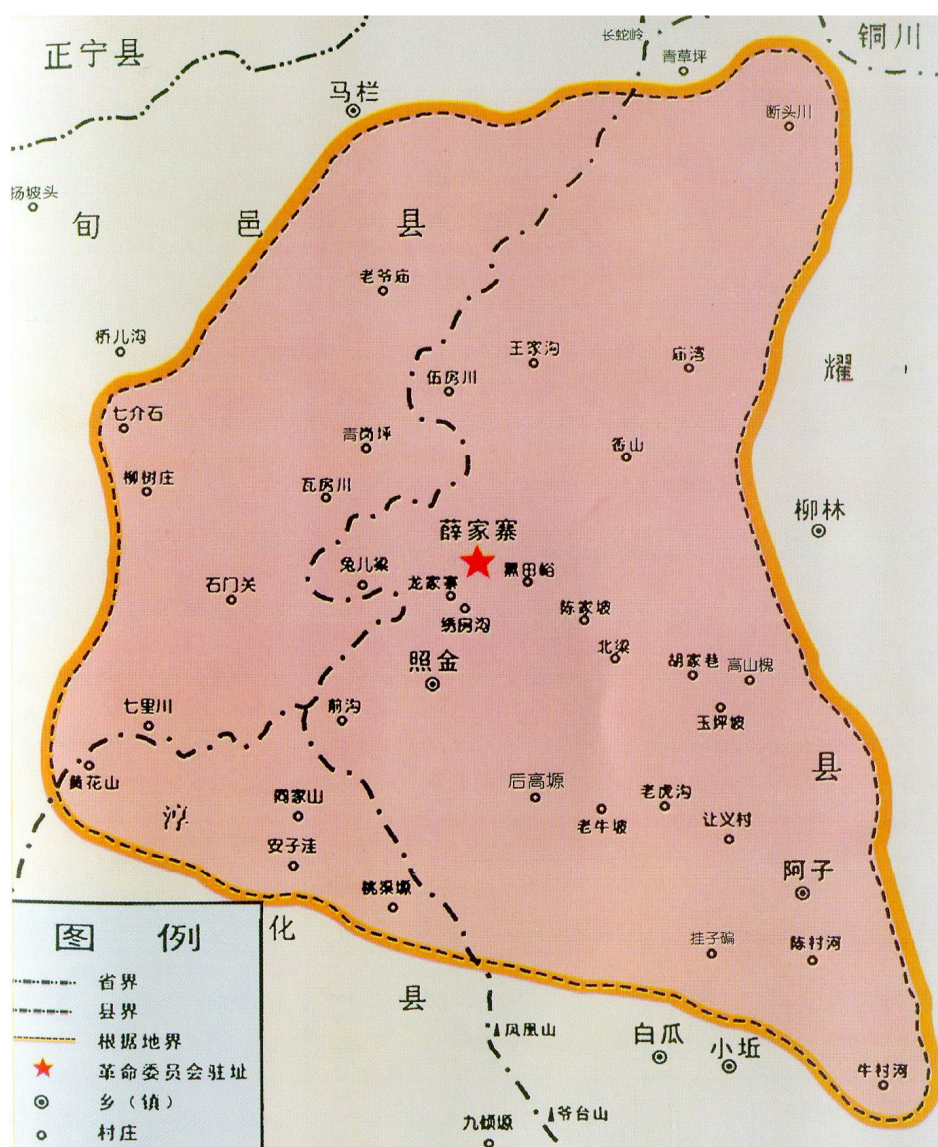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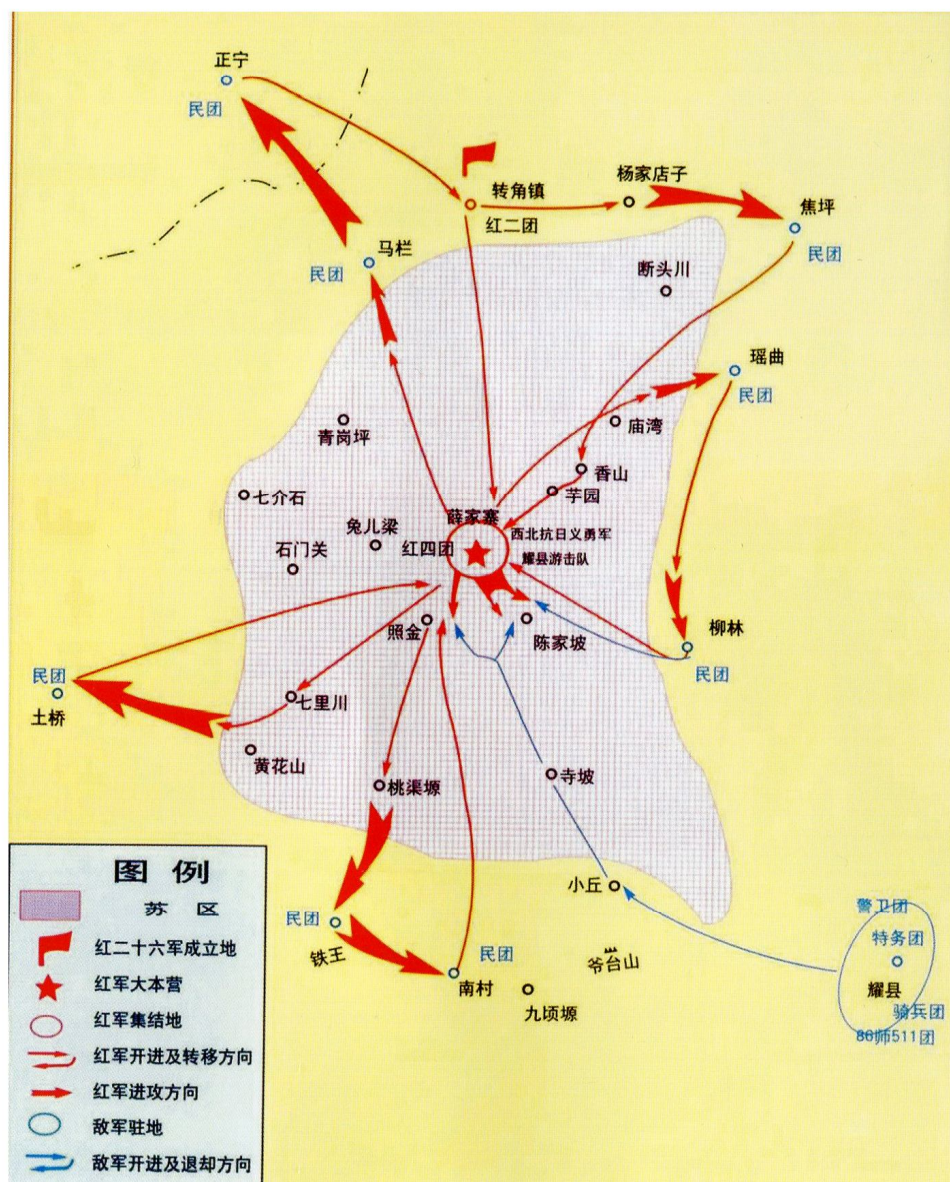
(1930年—19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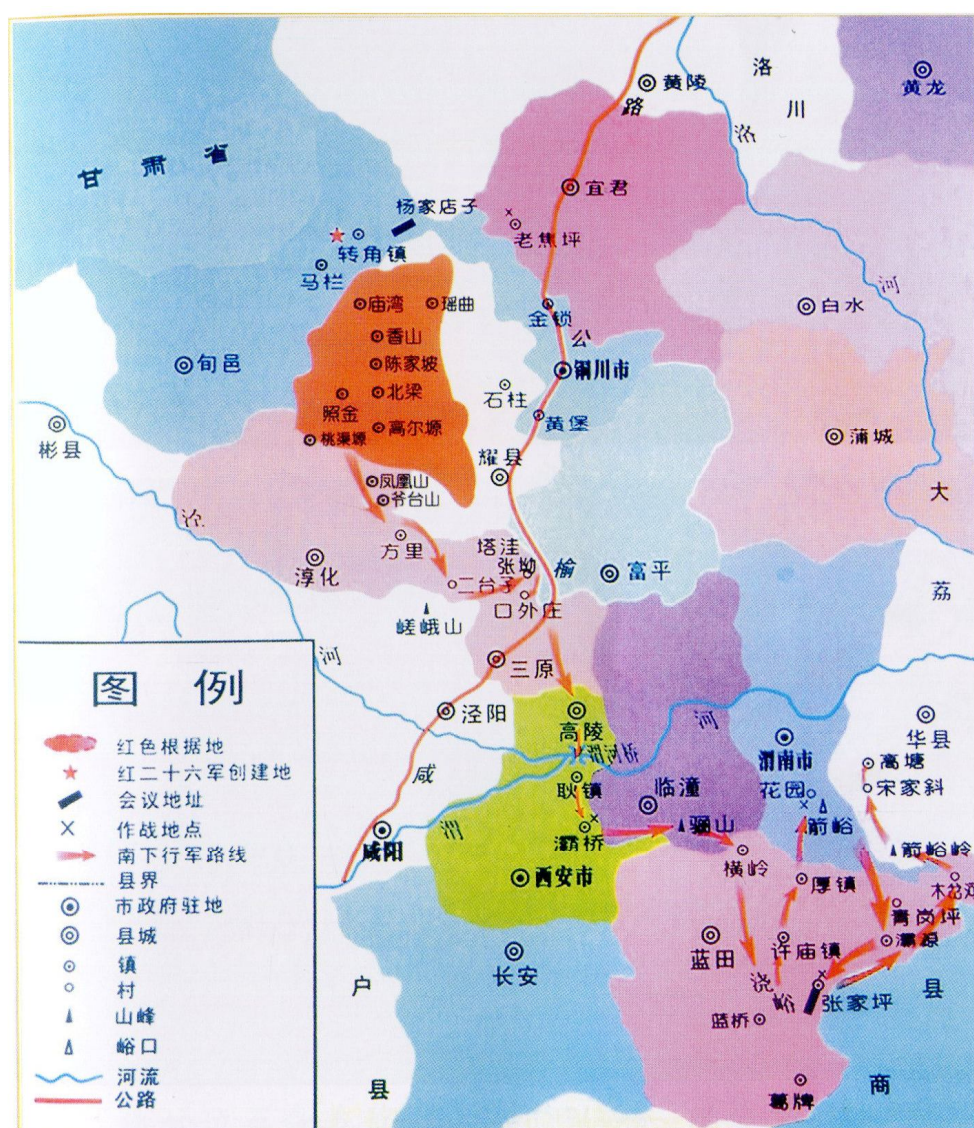
## 1933年以照金为中心的 陕甘边根据地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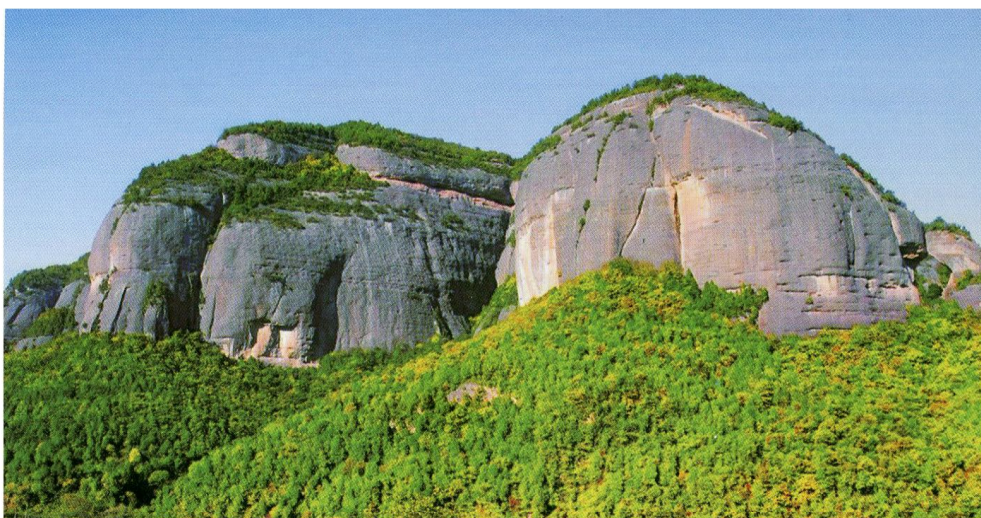
##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反“围剿”斗争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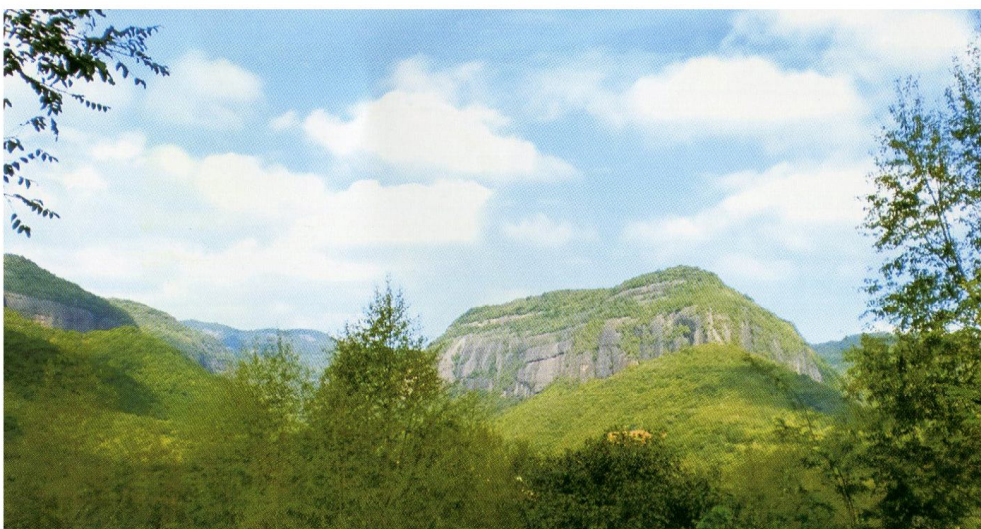
## 红二十六军在以照金为中心的 陕甘边根据地活动及南下路线图



#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红军大本营 ——薛家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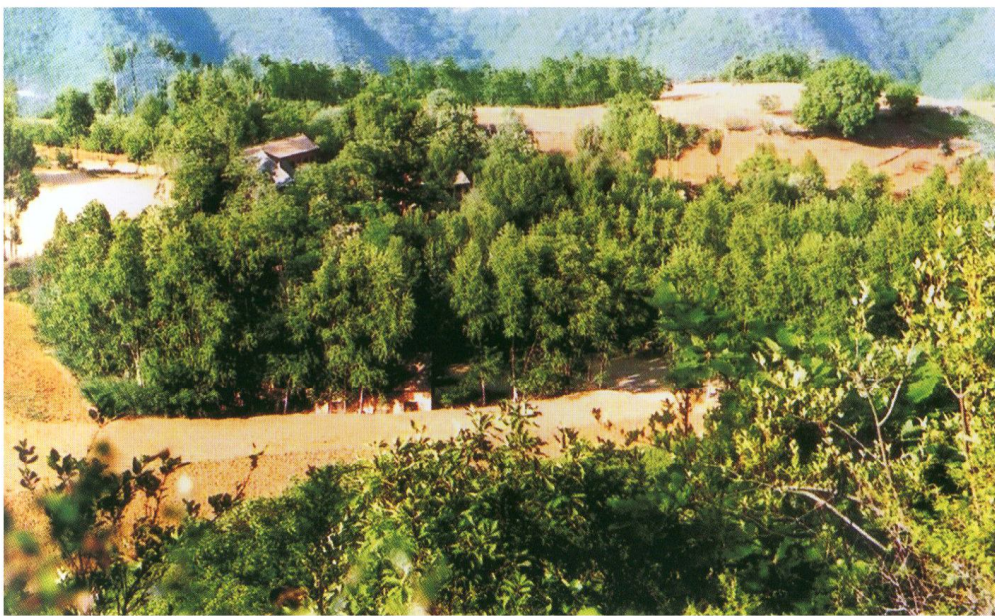
近 景



远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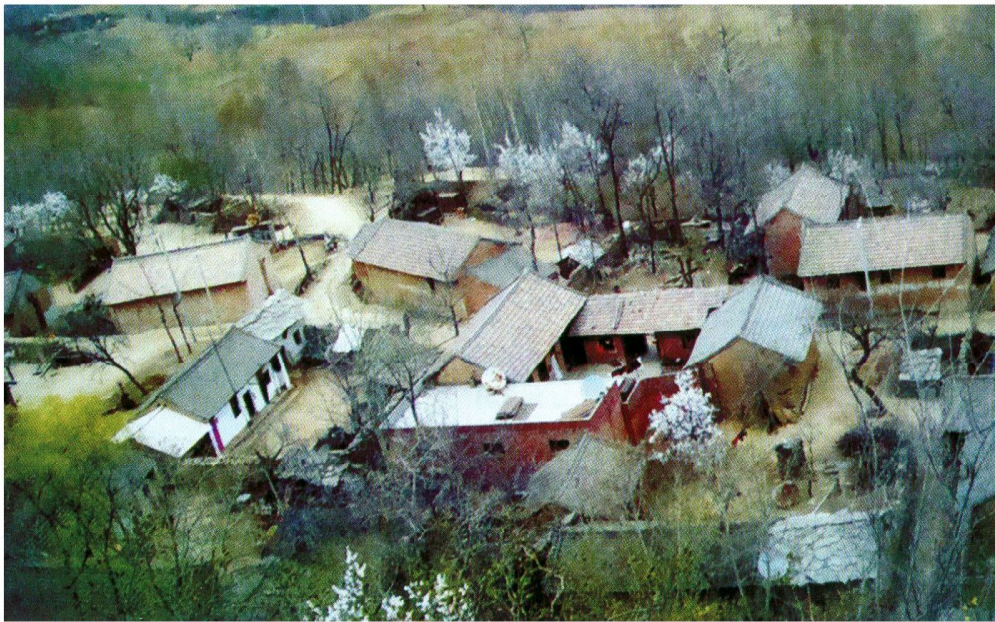
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部成立旧址——兔儿梁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旧址——照金岳家山



陈家坡会议旧址



陈家坡村旧貌

# 目 录

## 第一章照金苏区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前期活动中心

### 第一节照金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 第二节照金社会结构与经济状况

## 第二章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陕西及照金周边革命形势

### 第一节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 第二节渭北农民武装的建立

## 第三章渭华起义后陕西及照金周边革命形势

### 第一节陕西省委多次改组与调整

### 第二节渭北地区中共组织恢复与发展

#### 一、三原县中共组织恢复与发展

#### 二、旬邑淳化县中共组织恢复与发展

#### 三、耀县中共组织建立与活动

### 第三节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

#### 一、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

#### 二、分粮分配土地

### 第四节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与重新恢复

####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

####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重新恢复

## 第四章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前期斗争

### 第一节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军陕甘游击队

### 第二节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历程

- 一、攻占职田镇
- 二、攻打旬邑县城
- 三、转战永寿乾县礼泉三原地区
- 四、转战中部宜君富县洛川地区

## 第五章红二十六军成立与照金苏区的创建

### 第一节红二十六军成立

### 第二节照金苏区的创建

- 一、首战焦家坪
- 二、火烧香山寺
- 三、再战庙湾
- 四、省委派来代政委
- 五、红二十六军转向外线歼敌

### 第三节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 第六章照金苏区的建设与发展

### 第一节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

- 一、土地革命
- 二、经济建设
- 三、文化建设
- 四、后方基地建设

### 第二节年轻富有朝气的党政军领导成员

- 一、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
-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

三、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

四、习仲勋身兼四职

第三节反“围剿”斗争

第四节政治保卫队遇袭

## 第七章红二十六军南下

第一节北梁会议

第二节二台子会议

第三节张秀山密信报省委

第四节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第五节刘志丹重返照金

## 第八章陈家坡会议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

第一节三支武装力量的形成

一、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二、耀县游击队建立

三、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

第二节杜衡被捕叛变省委遭受严重破坏

第三节陈家坡会议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

第四节红军东西出击游击队保卫薛家寨

第五节奇袭张洪镇

第六节袭击合水县城

第七节薛家寨失守

第八节习仲勋带病撤离照金

## 第九章包家寨会议与红四十二师成立

### 第一节包家寨会议

### 第二节红四十二师成立

### 第三节三路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

### 第四节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 第五节照金苏区的恢复和陕甘边区南区的形成

#### 一、照金苏区的恢复和陕甘边区南区的形成

#### 二、陕甘边区南区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 三、陕甘边区南区所辖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 第六节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的建立及其活动

## 第十章关中特区的形成与斗争

### 第一节关中特区的形成

### 第二节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的建立与撤销

### 第三节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恢复与活动

### 第四节除掉雷天一陈克敏

### 第五节与友区划界谈判

## 第十一章抗战时期的关中分区

### 第一节关中分区的形成

### 第二节关中分区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 第三节关中分区的发展

### 第四节关中分区所辖县党政军群组织

#### 一、党的组织

二、政权组织

三、军事组织

四、群众团体

#### 第五节“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 第六节关中分区经济建设

一、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与发展工商业

三、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与合作社经济组织

四、开荒种地与安置难民

#### 第七节反摩擦斗争

一、旬邑事件及摩擦与反摩擦斗争

二、智取照金

三、爷台山反击战

#### 第八节隐蔽战线的斗争

一、反特情报战

二、柳林客栈

三、地下交通线

### 第十二章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中分区

#### 第一节关中分区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第二节解放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党政军群组织

一、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

二、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 三、关中军分区

### 四、关中分区青、工、妇组织

## 第三节关中分区所辖县党政军群组织

### 一、党的组织

### 二、政权组织

### 三、军事组织

### 四、群团组织

## 第四节关中分区的保卫斗争

### 一、关中突围保存实力

### 二、七战七捷收复失地

### 三、破袭咸榆公路牵制胡马

## 第五节减租减息支援新解放区和支前

## 第六节关中分区党政军组织完成历史使命

# 第十三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 照金革命简史大事记(1932 — 1949)

## 照金革命历史参考书目

## 后记

# 第一章

## 照金苏区是陕甘边区 革命根据地前期活动中心

照金是一个被台塬、丘陵和沟壑拱围着的山区小镇。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在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以照金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创建了照金苏区，使之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前期活动中心。这个向来为人少知的山区小镇因此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为人所仰。

照金苏区包括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印台区)等县部分地区，总面积约 2500 平方公里。

从军事战略眼光来看，照金苏区虽然距离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西安较近(150 余公里)，但照金进可取，退可守，机动性很大。向东经宜君、同官可截断咸(阳)榆(林)公路；向南经富平、三原、泾阳可出击渭北平原；向西过淳化、旬邑、永寿、彬县、长武，可扼守西(安)兰(州)交通要道；向北可退守子午岭深山梢林之中，是一块得天独厚、较为理想的武装割据区域。

照金苏区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建的较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她既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前期活动的中心，也是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而形成的，并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照金革命史，其实就是照金苏区的革命斗争历史。照金苏区从 1932 年初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及其周边活动开始算起，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先后隶属陕甘边

区三路游击区、陕甘边区南区、关中特区和关中分区几个发展阶段，抒写了 17 年的峥嵘岁月。照金革命历史，既是一幅绚丽多彩的革命斗争画卷，丰富凝重，灿烂夺目；又似一首激越跌宕的交响曲，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照金苏区革命斗争历史和孕育出的革命精神，永远放射出她那金子般的光芒，光照千秋，激励后人。

## 第一节 照金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照金，位于陕西铜川耀州区西北 50 公里处，地处子午岭桥山山脉南端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两县交界，面积 164 平方公里。

照金境内山峦叠起，河溪纵横，沟壑交错，密林遍布，中心地带险峰林立。远古时期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如今呈现典型的丹霞地貌特征。山崖远看似红霞披身，近看色彩斑斓。悬崖峭壁千仞，如刀削斧砍，直指蓝天。无数奇峰异洞隐藏于山峦之中，景色奇丽，幽幻莫测。出生于耀县(古华原)的宋代著名画家范宽巨作《溪山行旅图》就是以照金的山势景色为蓝本创作的闻名于世的山水画。在这一带山势地貌中，尤以薛家寨为代表。其“寨”并非为村寨，而指海拔 1600 余米悬崖峭壁上横贯着的数处天然岩洞，崖势雄奇，极为险要，易守难攻，便于藏身储兵，隐身万千兵马十分容易，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传说唐代薛刚曾在这里屯兵练武，故称薛家寨。薛家寨有一天然石洞，传说为宋代杨家将巾帼英雄杨八姐向北藩方向射箭所致，名曰箭穿崖。

照金地名的由来，一为清时以地处照金山麓而故名。另外，是根据一个美妙的传说而得名。传说隋炀帝当年巡游此地，身穿锦衣绣袍，雨后映照金光，便开御口：“日照锦衣，遍地似金，此地应为照金。”

照金地处关中传统农耕经济区域北部边缘，历史上又有多次民族融合的过程，民俗中不仅积淀有深厚的关中农业文化遗存，且极富地方特色。耀县曾称耀州，耀州窑和耀州瓷历史悠久，享誉国内外。古往今来，照金一带贩卖耀州瓷器的脚客、驮户川流不息。陶瓷文化在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和影响。

## 第二节照金社会结构与经济状况

照金素为穷乡僻壤，土地高度集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耀县李卜客等大地主和香山寺院，以各种手段占有了照金地区大多数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多数土地为租种土地。由于生产工具原始，耕作方法落后，薄田每亩仅收二至三斗(一斗合 30 斤)，肥田每亩也只收四至五斗。农民收获微薄，地主佃租却十分繁重，按常规要将收成的三分之一或一半缴租，农民所剩无几，生活十分贫苦。1929 年前后，中国大面积连年灾荒，人称“民国 18 年年馑”，照金地区涌入大量陕西关中及山东、河南、四川、山西等省灾民，人多地少，土地更趋集中，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国民党耀县政府在照金建立了严密的保甲民团系统，以后沟寨、坟滩村、照金村为界，南为八保，北为九保，划区治理。两保之中，设一武装民团，以当地劣绅张彦宁为团长。民团在乡村恣意横行，征调民工建造碉堡，营修山寨，强行摊派枪支弹药费用，私设监狱，滥施淫威。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十分庞杂，每逢夏割秋收，民团保甲逐户催征，甚至坐场追索。照金没有集市贸易，农民手中货币奇缺，一般以粮食、猪、羊等实物交纳捐税。民团、保甲、官绅往往趁机压低品级，克扣民财，以饱私囊。

照金地区沟深林密，素为土匪潜形肆虐之处。1924 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员在这里视察社情时惊呼：“查邈年地方不靖，伏莽滋多”，足见匪祸之重。当时，无村不受匪害，房上村、芋园村很多人家财物被土匪抢劫一空，房屋窑洞被土匪焚烧夷平，庄稼被毁。为避匪害，许多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女不得不提早出嫁。同时，军阀部队常以剿匪为名到照金骚扰百姓，搜刮民财，残害无辜，邀功请赏。每当军阀部队将至，百姓四处躲避，十室九空。

由于这里土地高度集中，保甲民团横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匪患兵祸交相为害，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人民群众改变人生命运的愿望异常强烈。因此，当年的照金，就像一堆焦燥异常的干柴，一但有星火引燃，便成燎原之势。

## 第二章

###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

### 陕西及照金周边革命形势

#### 第一节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1927 年 4 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中国政治风云突变，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大屠杀所吓倒，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顽强地继续战斗下去，南昌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即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这一决定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土地革命阶段。为此，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八七会议所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牺牲代价之后所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为了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政策，1927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 9 号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亦称九二六会议或九二五会议)，会议对大革命陕西党务工作的成绩和缺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检查，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明确提出目前工作的总原则，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在军事政治

方面：“在党的总政治口号之下，勇猛地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新军阀的斗争，以期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促进中国革命”、“要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抗捐、抗税、抗粮，取消高利贷，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决议案还就国民党工作、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党务工作作出规定，提出了“走到农村中去”、“走到军队中去”、“武装农民”等口号。会议还通过了《组织工作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文件。改选了省委。

九二六会议是中共陕西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在革命危急的重要关头，检查和纠正了陕西党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比较切合陕西实际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开始策略的转变，成为陕西土地革命战争的转折点，陕西革命斗争开始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历史时期，陕西先后爆发了清涧、渭华武装起义，渭北数县农民起义和“交农”运动。这一次次起义和“交农”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次次革命壮举和创举，不失为在革命前进道路上一次次有益的探索。清涧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打响的陕西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开创了陕西乃至西北武装起义之先河，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鼓舞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志。渭华起义的历史贡献在于：首先，这是陕西共产党人领导的以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斗争新方式，符合土地革命战争的大方向，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其次，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党仍然能够动员十万之众的农民和军队拿起武器，扛起锄头和梭镖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开战，锻炼教育了陕西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培养了革命干部，积累了斗争经验；其三，渭华起义建立起陕西历史上第一个渭南崇凝区农村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存下农革命军中配备有政治委员之职，这是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之肇始；第四，最值得一提的是，渭华起义和清涧起义一样，不少参加起义的人员后来参加了创建陕甘边、陕北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以至血洒疆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志丹、谢子长认真总结几次起义经验教训，成为领导创建陕甘边、陕北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

领袖人物，民族英雄，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西北高原逐渐形成燎原之势。王泰吉和带领蓝田民团策应渭华起义的汪锋等也成为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成员。为配合渭华起义，三原、泾阳、礼泉、旬邑、淳化、咸阳、长安、户县、周至、永寿农民起义和“交农”运动，由于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又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在国民党重兵围攻镇压下失败了，但是起义展现了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及其为他们争自由、争解放、求翻身、立志实现社会变革的彻底革命精神。也展现了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兄弟强烈的革命要求及高涨的革命热情。这种革命要求和热情，如团团烈火，从来没有被枪炮、屠刀所扑灭。创建照金苏区的春风一吹来，埋藏在地下的革命火种立即闪闪发光，越烧越旺。

上述各县，大多位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周边地带，旬邑、淳化的一部分，后来成为照金苏区的所辖区域。抗日战争前后，陕甘边区南区先后改为关中特区、关中分区，特区和分区所辖的淳耀县、赤水县、新正县、新宁县、永红县，其区域基本仍是照金苏区的所辖范围或周边地带。

## 第二节渭北农民武装的建立

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陕西共产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重新建立农民武装。早在大革命时期，陕西全省各地的农民协会，大都有农民自卫团组织，农民自卫团手持大刀、梭镖维护社会治安，将任意摊派粮款，横行乡里的恶绅、地主、恶霸砍死之事也屡见不鲜，咸阳各地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武装组织十分壮大。1927年5月，淳化西区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团员100多人，围歼了欲在润镇进行破坏的股匪30余名。

1927年6月以后，冯玉祥开始在陕西“清党”反共，镇压工农革命运动，陕西中共组织遭破坏，农民协会遭查封，农民自卫武装被

解散。土地革命战争一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切实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除恢复健全和发展党团组织力量之外，在发动农民起义的同时，恢复建立和发展农民自卫武装，从省委到各地工委，特委、县委或县工委都设有军事或军委，或者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

1928年5月，三原、旬邑、淳化、礼泉县农民起义都建立有农民自卫团组织，自卫团在起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旬邑起义前夕，农民武装400余人整编为4个中队。起义后，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将起义武装力量编为三个连，总指挥程永盛，队长吕振帮，副队长程双印。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30余武装人员由吕振帮、程百印、程双印、第五伯昌等骨干人员率领，转入旬邑县和淳化县北部石门关、七界石山区(均属照金苏区)整编为旬邑游击队(亦称三水游击队)，游击队发展到60多人。1932年1月，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率领西北反帝同盟军从桥山山脉北端沿子午岭南下照金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旬邑游击队即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特务队，归中共旬邑县委和红军陕甘游击队双重领导。

渭华起义时，为了加强农民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曾从渭南、华县选调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南越秦岭，到洛南驻军许权中旅学习军事，受教于共产党人许权中、刘志丹、谢子长、廉益民等人的军政教育。这批参训人员在许旅营长、共产党员张汉俊(李大德)率领下返回渭华参加起义。许旅曾赠送一批枪枝弹药，陕东特委将其正式编成陕东赤卫队，任命张汉俊为队长，冯养浩为赤卫队中共支部书记，薛自爽为副队长，下辖3个分队和一个大刀队，约百余人员。除许旅正规军一部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配合渭华起义之外，陕东赤卫队是正式农民武装，战斗力很强。起义中坚持塔山阻击敌人，张汉俊和部分队员战死疆场。起义失败后，一些人员随西北工农革命军转移蓝田，后来又辗转渭北、照金，参加创建渭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处于耀县周边的咸阳地区革命斗争，直接影响到耀县及其照金的

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否。1929年，陕西正值民国十八年年馑，素有“粮仓”之称的关中平原赤地千里，满眼荒凉，到处是一片悲惨的景象。

“三野无青草，室内无悬磬”、“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国民党陕西当局救灾不力，贪污舞弊之风依旧。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针对农村的严重灾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整顿恢复党团组织的同时，将领导灾民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发动广大灾民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咸阳地区党组织按照临时省委的指示，立即成立灾民自救队，发动灾民“吃大户”，自救队是武装性质的。5月，在武字区西王堡成立了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黄子文任主任，他率领武字区11名武装人员和数十名群众捣毁了国民党武字区区公所，分了武字区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帆家的粮食，并于当晚将其处决。随后，黄子文带头成立渭北灾民自救队，由陈云樵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下编四个大队，各大队下编3个分队，约180余人，枪100多支。渭北灾民自救队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也包括照金地区。灾民自救队发动灾民打击土豪劣绅、分粮、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活动，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渭北灾民自救队成立不久，便逮捕处决了离任回省途经三原武字区的国民党宜君县县长潘恩桐，缴获短枪及财物。

1930年1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在礼泉(原醴泉)县南乡史德镇召集秋步月、吴焕然、张晖、米佐周、张百忍等，研究部署西路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并正式成立了礼泉游击队，秋步月任队长。礼泉游击队成立之后，立即在县南的纪村和张冉村建立了两个活动据点，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同时与在西府一带开展工作的张含辉以及张百忍、米佐周领导的800余灾民武装力量相配合，在礼泉、兴平、乾县、武功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1930年初，中共乾县县委书记王敬之变卖自家土地、耕畜、大车等，购买枪枝弹药，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3月，王敬之与上官克勤等准备在乾县县城发动武装兵变，因购买枪支时被敌发觉，兵变未成，王敬之被迫暂时离开乾县。

渭北咸阳各地的灾民武装抗粮抗税斗争，狠狠打击了当地豪绅地

主的嚣张气焰，深得贫苦灾民的信任和拥护。这一带的革命形势几经起伏，但以农民为主的武装游击斗争生生不息，坚持多年，许多游击队员后来又参加了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照金苏区的革命斗争。

## 第三章

# 渭华起义后陕西及照金周边革命形势

### 第一节陕西省委多次改组与调整

清涧、渭华及渭北几县武装起义和“交农”运动失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向革命力量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们派出特务密探，侦查中共陕西各级机关驻址和领导人行踪，西安全城一度宵禁，军警到处搜捕，恐怖笼罩古城。街上行人，不准三五成群，不准交头接耳，违者以军法论处，中共组织屡遭破坏。1928年11月28日，省委书记潘自力不知长安县委已于前一日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前往太阳庙门主持会议，被潜伏特务逮捕入监，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1929年2月初，由于共青团陕西省委两位负责人被捕叛变，致使党、团陕西省委多位负责人被捕，党团陕西省委遭受第一次大破坏，接着成立了党、团陕西临时省委。1930年10月8日，又由于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被捕和叛徒告密，党团陕西省委又遭受第二次大破坏。1931年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团省委多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在破坏与调整中恢复与发展。在改组与调整中贯彻执行中央和临时中央的指示和任务，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发动兵变与武装起义，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苏维埃政权；领导开展以在校学生为主和各界市民参加的城市抗日救亡运动。

### 第二节渭北地区中共组织恢复与发展

#### 一、三原县中共组织恢复与发展

在省委遭受两次破坏，多次改组与调整期间，渭北特别是三原县中共组织得到恢复与发展，这对耀县及其照金地区中共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对耀县及其照金革命形势的恢复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

用。

三原地处关中平原腹地，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经济、文化发展。三原是渭北第一个建立党团组织的县，也是陕西最早建立党团组织的县份之一。1927年7月建立的中共三原县委，下辖中共高陵、富平、蒲城、旬邑特支和淳化一高支部及6个直支属支部，有党员101人。渭华起义和三原两次“交农”围城斗争失败后，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在白色恐怖中离开三原，县委工作停止。

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陆续派员赴各地恢复整顿基层组织。1930年5月，临时省委派员前往三原联络党员，在党群关系较好的武字区建立了中共三原特别支部，黄子文任书记，随后基层组织得到恢复。中共三原特支建立后，按照临时省委的指示，领导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等地的中共组织。1931年5月，中共三原武字区委成立(亦称三原区委)，中共三原特支终止。中共武字区委下辖7个支部，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2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遭破坏，7月，中共三原县委重新恢复，金理科任书记。

## 二、旬邑淳化县中共组织恢复与发展

旬邑起义失败后，隶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的中共旬邑区委遭到严重破坏，区委成员和一些共产党员不得不出外隐蔽。1929年初，出外隐蔽的崔维峻、崔廷儒、蒲玉阶、第五伯昌等共产党员先后回到旬邑，他们以教书为名，秘密建立了中共旬邑特别支部，崔维峻任书记，并按照临时省委指示，先后整顿恢复了原来党的基础较好的郝村、魏洛、县城、东涧等4个支部，建立了嘴头、芝村、义阳3个支部，共有党员40多人。同时，旬邑特支还领导淳化县白庙薛家支部。到1932年秋，中共旬邑特支又先后建寺了张洪镇、王家、安乐、井坳等9个支部，下辖支部达到13个，有党员121人。为了加强领导，发展组织，旬邑特支随即建寺了西区(张洪)、南区(土桥)两个区委。1932年10月，在中共旬邑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旬邑县委，焦思洲任书记，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3年3月，中共旬邑县委改属中

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成为照金苏区的一个县级组织。

淳化县农民起义失败后，中共淳化区委停止工作。1929年7月，中共三原县委派第五伯昌到淳化白庙薛家、王家嘴一带开展恢复建立工作。第五伯昌发展任连俊等6名党员后，建立了白庙薛家支部，任连俊任书记，隶属中共旬邑特支领导。9月改属中共三原特支领导，1933年3月，和中共旬邑县委同时改属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成为照金苏区的一个中共支部。

### 三、耀县中共组织建立与活动

渭华起义失败后的1928年冬，耀县籍青年学生、共产党员张邦英、曹雯从西安民立中学毕业后，由中共陕西省委介绍回耀县从事建党工作。耀县属山岭、灰石、台塬相间的黄土梁地貌，约占三分之二县域，自然条件较差，经济落后，农民不时自发起来抗粮、抗租、抗捐。

回到耀县的张邦英和曹雯，经过一段时间秘密联络，与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隐蔽耀县的共产党员冯鸿儒取得联系，遂在县城西街面坊建立了耀县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小组，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冯鸿儒为党小组负责人，公开身份为面坊帮工。张邦英和曹雯分别在县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和南街女子小学任教，二人通过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师生交谈、游戏、交朋友等方式，讲革命道理，与进步青年师生密切关系，唤醒年轻人的阶级觉悟。

1929年冬，冯鸿儒离开耀县回渭南原籍，中共耀县小组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失去联络。1930年春，张邦英辞去教员工作，前往驻三原县的讨逆军甄寿珊部寻找中共组织。部队后来移驻西府凤翔县，张邦英与在该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周志学接上关系，军中党组织随即决定由张邦英任中共营委书记，以营部书记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同时，介绍时任连队司务长的耀县同乡杨再泉入党。1931年2月，部队移防甘肃镇原，张邦英又介绍时任连队文书的耀县同乡张仲良入党。讨逆军被杨虎城收编

后，张邦英、杨再泉、张仲良先后离开部队回到耀县。这年夏，部队又转回陕西泾阳，张仲良途经三原时，与中共三原武字区区委委员王曲贤接上关系，受武字区委委派，回耀县开展党的工作，其公开身份为庙坡头小学(石人小学)教员。张仲良先发展阿姑社村陈学鼎入党，又介绍从天津返回耀县的共产党员刘林圃接上关系。6月，受中共三原武字区区委指示，张仲良在杨家河杨再泉家主持成立了耀县历史上第一个中共耀县支部，张仲良任支部书记，有5名党员。为适应秘密斗争的环境，支部转移到耀县城西北16公里的阿姑社村，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后属照金苏区。为尽快发展壮大组织力量，开展农民运动，同年12月，中共耀县支部按照中共三原武字区委的指示，改支部为特支，特支成员进行了分工，张仲良仍任特支书记，杨再泉、宋子岐、刘林圃分管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中共耀县特支建立以后，活动地域、范围逐步扩大，由川道向台塬区域的农村发展，特支成员分别前往野狐坡、石人堡、华里坊、王益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抗租斗争。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批先进分子相继被吸纳入党，党的队伍逐渐壮大。至1932年4月，全县党员发展到51名。先后建立了阿姑社、野狐坡支部和王益村特别支部，特支下属3个村支部，1个党小组。

这时，正处于青黄不接之际，陕西关中地区连年大旱，饥饿年馔，兵祸匪患，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饿死病死者以数十万计，背井离乡逃难者不计其数。陕西及耀县当局不但不减免苛捐杂税。反而征调民工建造兵营，老百姓与县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广大农民的反抗情绪空前高涨，县城西边的小丘、西原一带农民和外地流落到照金、柳林、瑶曲、香山一带的灾民纷纷行动起来抗粮抗捐。此时，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照金，偷袭照金成功，全歼了照金镇民团，转而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和驻焦家坪国民党军一个连队，击退了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民团。两次进攻歼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同时，三原武字区游击队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运动也波及到耀县。

随后，渭北游击队也前往耀县照金、柳林、瑶曲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张仲良和中共耀县特支成员借机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的“五抗”斗争，通过鸡毛加木炭的传贴方式，汇集西原楼村、小丘一带的一两千农民兄弟上县城，进行“交农”斗争。“交农”农民围住县城几天，县政府不得不与“交农”农民谈判。几次谈判，毫无结果，“交农”农民愤怒了，便架起农具当干柴，焚烧了县城西门。“交农”斗争坚持几昼夜，迫使县长李建堂答应减免粮税，停建军营，“交农”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5月，特支书记张仲良因领导“交农”斗争，被耀县当局逮捕，经党组织营救，40多天后获释。

这次“交农”斗争，和红军陕甘游击队、三原武字区游击队、渭北游击队活动一样，在整个耀县及照金地区人民群众中都产生了巨大反响，革命的春风进一步唤醒了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农民和灾民，为创建照金苏区做好了思想准备，奠定了群众基础，培养了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建立训练了红军和游击队武装。

6月，张邦英回到耀县，协助张仲良工作。7月，中共三原县委恢复，耀县特支归属三原县委领导。不久，中共耀县特支改为中共耀县区委。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成立，耀县区委即归渭北特委领导。10月八九日，张邦英和张仲良2人赴三原县长塄堡，参加了渭北特委召开的渭北各县党组织领导人联席会议。2人返回耀县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精神，即在耀县泥阳堡关帝庙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耀县县委，由张仲良任县委书记，县委设组织、宣传、军事3个部。

耀县县委成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和渭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革命，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耀县县委便将领导农民进行普遍的“五抗”斗争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斗争上来。县委积极配合渭北游击队在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打游击，帮助建立农民联合会，打土豪、分田地，保护群众分粮斗争。渭北游击队在耀县照金地区的高山槐分粮3天，分粮300多石，300多户群众受益。在分

粮斗争中培养了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建立了中共西塬特别支部和城内党小组。

11 月，省委派巡视员来耀县指导工作，鉴于张仲良在“交农”斗争中被捕和从耀县党组织的实际出发，调张仲良去西安国民党凿井训练班做党的地下工作，由张邦英接任县委书记一职，继续领导东西两塬革命斗争，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不久又在东区的孙家塬、刘家那、泥阳堡建立起三个党的基层支部，至 1933 年 1 月，全县党员已增加至 84 名。

### 第三节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

#### 一、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渭华起义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从恢复三原武字区的中共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是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对创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整个过程帮助、支持和影响极大的革命根据地，其西部区域与照金苏区相连。照金苏区与渭北革命根据地息息相关，两块苏区南北呼应，互为依托，相互策应，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照金苏区的南部前哨阵地。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曾给红二十六军下达两项任务，其大意为：一是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二是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苏区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红二十六军几次转战渭北革命根据地建党、建政，建立游击队武装。渭北游击队前去照金配合红二十六军，改编后加入红二十六军序列。红二十六军既是创建照金苏区的主力红军，也是帮助、支持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渭北革命根据地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后来又被派往照金苏区，成为照金苏区党政军重要领导人。

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高李村、康家洞、宋家河、石桥、觅子等地；西

南接泾阳县的安灵、老庄、口镇等地；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方里、石桥等地；南到三原县的白鹿原、天齐原南畔；北延伸到耀县的华里坊，楼村(坡头)、东西让牛村、小丘等地，与照金苏区部分地区成插花地带。渭北革命根据地东西约 30 公里，南北宽约 25 公里，总面积约 750 平方公里，人口 4 万多。

渭北的三原、泾阳、富平、耀县、旬邑、淳化数县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尤以三原县武字区最为突出。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和后来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三原县的农民运动犹如一场烈火，越烧越旺。为配合渭华起义，三原县进行了两次“交农”围城斗争，斗争虽然失败，党的组织遭受挫折，但 1930 年 5 月又建立起中共三原特别支部。1931 年 5 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6 月，区委又在富平与三原交界的地方陆续建立了农民协会、穷人会。7 月 10 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各地中共组织加强对农民运动的联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渭北苏维埃政权。1932 年 2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仲鸣(唯炽、志敏)和从北平回陕的黄子文到达三原武字区。为了深入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根据地培养干部，焦、黄二人在长塄堡举办党员训练班，每期三四天，历时一个多月，培养党员 40 多名。期间，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也曾前来授课。3 月 21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组建中共渭北特别委员会(未及时成立)，由省委书记杜衡兼任特委书记。4 月 12 日和 5 月 31 日，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和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先后被捕。6 月初，正在渭北巡视的陕西省委常委李杰夫(高维翰)指定孙海章任区委书记。后以孙海章“右倾”为由又选举孙铭章为区委书记，胡德润、赵应奎、邓万祥、孙平章为委员。7 月，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金理科任书记，黄子文、赵应奎、马宗德为委员。9 月，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三原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三原现有 3 个区委，县委所在地武字区委有 7 个支部，农民联合会有 10 个分会。”

10月8日至9日，中共陕西省委主持召开渭北各县党的联席会议，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20多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渭北特委，创建渭北苏区，任命高维翰为特委书记，李冲霄、金理科、黄子文、王烈(汪锋)、曾楚川、黄子祥、顾先臣、郑彦青、程建文为委员。渭北特委领导三原、蒲城、耀县县委和富平县刘家卓区委，共有党员150多人，特委机关设在武字区。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共青团渭北特委也随之成立，团特委由程建文、金天华等组成。接着又相继成立了雇农工会和10多个村妇女联合会及两个妇联分会。

政权组织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经历了由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到革命委员会的发展演变过程。

1931年9月下旬，武字区反日救国会成立，候守愚任主任。反日救国会依照农民协会的组织形式，下设5个分会，各村设村会。在中共武字区区委领导下，反日救国会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施行农民协会的职权，开展反契税、反豪绅、反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斗争。

1932年3月上旬，武字区反日救国会改为农民联合会，黄子祥任主任。其组织成份完全是中农、贫农和雇农苦力，会内设有雇农工会。农民联合会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反捐税、分粮食。同时还成立了武字区妇女联合会，孙平章代理主任。

8月，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祥任主席。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三原县武字区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三原县委、共青团三原县委代表，武字区农民联合会、雇农工会和少年先锋队代表共28人。大会选举15人为革委会委员，其中5人为主席团委员，主席黄子文，书记李冲霄。渭北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三原县武字区，下辖三原、富平、耀县3县的部分地区。渭北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兼政治保卫队)、教育等部门。还在革委会、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中设立党的领导机构，时称党团，即后来的党组。大会通过了12项决议，其中包括立即公布

和实行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各村堡成立少先队、赤卫队、雇农工会等组织，开展肃反，保卫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禁种鸦片等。大会通过了革委会宣言和致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共陕西省委、东北义勇军和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通电。

为了加强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依照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巩固与加强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和立刻实现扩大革委会的工作，吸引武字区后区、肃字区、武字区、耀州(即耀县)、富平、高陵的斗争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以及中共渭北特委常委会的意见，于10月18日，召开了村代表会议，改组扩大了渭北革命委员会，由6人组成主席团，黄子文仍担任主席。

**武装组织**三原县农民武装组织建立较早，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农民运动处于逆境。1928年2月上旬，共产党员黄子文和唐玉怀主持成立了抗敌委员会。23日，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抗敌委员会和游击队活跃在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石川河西的淡村一带，抗粮、抗款、打土豪，处决了国民党武字区的民团团总，在5月的三原农民“交农”围城斗争中，黄子文带领的农民武装发挥了骨干作用。1929年，黄子文和唐玉怀领导成立的武字区筹赈委员会，实际主持了武字区的地方行政和筹赈救济工作。1930年，黄子文领导的武字区农民武装，成为渭北灾民救济的主要力量。

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后，立即决定建立武装组织。随后各村立即建立了赤卫队，并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积极勇敢分子为骨干组成武字区赤卫队，区委委员孙铭章兼任队长。

1932年3月中旬，武字区游击队成立，孙铭章任队长。4月下旬，中共武字区决定由黄子祥负责组建武字区游击大队。不久武字区游击大队建立，孙铭章任大队长，下设3个分队，有队员40余人，长短枪34支，主要活动于西至心字区、东至富平石川河、北至耀县西原、南至心、武两区的塬畔一带。8月1日，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

正式成立了渭北游击队，马志舟任队长，金天华任政委，共 60 余人，近 40 支枪。9 月中旬，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被敌杀害。三支队特务队即由习仲勋从照金带到武字区，被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又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主要在富平耀县边界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渭北根据地在组建武装组织的同时，还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拥红扩红活动。1932 年 4 月 21 日，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阎灯彦、杨重远率领下，由照金附近到达武字区。次日，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在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 3000 余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林，与会者无不兴奋至极。大会由黄子文致辞，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讲话，各团代表发了言。当晚，获悉国民党军队将前来进剿，五支队便于翌日凌晨转移至耀县上楼村。6 月 13 日，已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的黄子文从照金同到武字区扩红，短短的 3 天之内，近百青年踊跃报名。之后，由黄子文带人陕甘边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 二、分粮分配土地

1931 年 5 月，武字区赤卫队建立后，采取白天分散，晚上集中的办法开展活动。活动范围多在耀县西北部，接近照金的地区，还有富平的石川河以西及三原武字区和心字区，组织掩护群众收割庄稼，进行“五抗”。8 月，武字区赤卫队发动了反区公所、反地亩契税和反豪绅的斗争。10 月，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召开千人群众大会，斗争了区长薛荫堂，迫使其取消按地亩登记契税所摊派的款项，大快人心。同时，武字区赤卫队还处决了反攻倒算的豪绅地主、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崔福堂，烧毁其“变天账”。

1932 年 3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仲鸣在武字区孙家壕召集武字区区委成员和耀县张仲良、杨仲杰以及淳化县党组织代表 20 余人开会，会期历时 7 天，详细讨论了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的问题。4 月上旬，黄子文指示王瑞琪等组织农民联合会，分了太和

堡大地主张玉泉家粮食 20 余石。4 月 27 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有五六十人发动，以至很快发展到 1500 人之多。整个的继续的分配五六天之久，分了武字区 20 余家所存的粮食与财产。”6 月 2 日，中共陕西代表团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后区，西原心字区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分配，共分粮 200 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队，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器。国民党军队一派去，被 200 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报告还说：“由于新的武字区委成立，由北平回来的黄子文参与领导，发动了广泛的分粮斗争。农联会发展到 600 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 1500 余人，群众斗争情绪似火一样地燃烧起来。”10 月 5 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指示渭北游击队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帮助当地建立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打土豪，保护群众分粮斗争。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杀豪绅、抗粮杀恶差，致使国民党耀县政府不敢在当地收款收粮。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的农民联合会开展群众分粮、杀豪绅的斗争，同三原武字区域连接起来，富平国民党当局和地主豪绅的统治不能到达这一区域。

随着分粮斗争的深入，土地分配也逐步展开。1932 年 10 月 10 日，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武字区南区逐步开展分配土地斗争。20 日，中共渭北特委召开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会议要求在有利的贫农、雇农的原则下，立即以农联会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斗争。26 日，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党支部加强对分配土地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中共三原县委分片负责。27 日，党团渭北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各支部开展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工作。28 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武字区 38 村堡代表会议，会议学习苏维埃土地法，总结武字区南原土地分配经验。

土地分配斗争开始后，武字区 38 村堡的群众就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积极性。中共陕西省委渭北特派员贾拓夫在给中共三原特委的指示信中称：“三原农民分粮斗争的开展已经深入到分土地的阶段。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非常迫切坚决，一般农民说‘分粮不是根本出路，一定要分土地’。事实上农民已经自己动手分配土地，如义合村农民没收了地主杨海青的土地。”同年，上合村党支部领导群众分地 220 亩(其中公地 20 亩)，10 多户农民分得了地，口外庄 13 户农民分得土地 83 亩。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也为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工作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教训。

#### 第四节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与重新恢复

#####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挫折

正当渭北革命根据地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于 1932 年 10 月 6 日曾发、出这样一个指示性文件：《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文件指示“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10 月 7 日，中共陕西省委又专门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日运动的指示》。依此，中共渭北革命委员党、团组织于 10 月 30 日召开会议，决定在 11 月 6 日至 8 日连续三天召开群众大会，隆重纪念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11 月 6 日，庆祝大会正式召开，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中共三原县委书记金理科代表党、团组织讲话。会后，1400 多名与会群众游行到武字区向马额乡民团示威。7 日，参加大会的各界群众多达 2000 余人。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作政治形势报告之后进行游行。武字区后区游击队荷枪实弹作前导，游行队伍从武字区下原到距三原县城仅五六公型的西阳镇穿街而过，经富平窑头、淡村返回。8 日，又举

行游艺大会。整个纪念庆祝活动波及富平、三原数镇，耀县、高陵、泾阳一带一些群众也远道而来参加，展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精神风貌和斗争气魄。

但是大规模的庆祝、游行活动，也暴露了革命的力量。11月9日，国民党陕西当局，集中三原、富平、耀县、淳化、泾阳、高陵等6县民团和三原庄里、耀县小丘的驻军联合行动，向渭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国民党部队占领武字区后，疯狂镇压根据地军民，连续进行了三天大搜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齐搜”。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家乡甘涝池村30多人被抓，群众财物被抢，房屋被毁。不到一个月，根据地中心武字区遭六次洗劫。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被迫分散转移，工作瘫痪。渭北游击队被冲散解体，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牺牲。

##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重新恢复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党组织恢复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围剿”之后，中共陕西省委立即派干部前来根据地进行恢复和重建工作，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整党组织5次。

1932年1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特派员贾拓夫巡视渭北，整顿遭敌“围剿”后的渭北党组织。贾拓夫召集原中共渭北特委领导人和富平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富平县城召开紧急会议，代表省委宣布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之职，决定以李冲霄、郑彦青、王烈(汪锋)、金理科、顾先臣组成新的中共渭北特委，李冲霄任书记。不久，贾拓夫、李冲霄和杜衡在武字区召开渭北特委扩大会议，由杜衡传达省委紧急指示，再次改组渭北特委，由金理科任特委书记。此时，黄子文因在讨论红四方面军人陕后的革命形势问题时与杜衡发生意见分歧，被杜衡以“右倾机会主义，为由，错误地停止了黄子文的一切工作。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贾拓夫主持，在武字区召开渭北特委扩大会议，宣布撤销渭北特委，宣布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由刘林生任书记，并组成5人常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下辖耀县，

富平、蒲城 3 个县委和三原、白水、武字区、心字区区委，以及高陵特支，同时成立了共青团高陵中心县委。

1933 年 1 月，中共陕西省委又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组成人员，书记仍为刘林生，王烈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为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的需要。此后，王烈、习仲勋、金理科、高维翰(李杰夫)等一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干部被派往照金，中共陕西省委再次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成人员，由杨声(刘映生)任书记，赵伯平接王烈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5 月，赵北平接任书记。

新成立的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积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工作，决定中共武字区由赵应奎书记和 5 名正式委员、两名后补委员组成区委常委会。1933 年 1 月 20 日，中共武字区区委改组，马志舟任书记，并恢复 18 个党支部。3 月，中共心字区区委成立，宋士斌、韩学理先后任书记。

中共渭北特委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领导恢复渭北革命委员会工作方面也尽了最大努力，先后恢复了一些农联分会组织和工作。

**重建武装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之后，即以反攻武字区为中心任务狠抓了根据地武装的重建工作。负责军事工作的曾楚川首先将渭北游击队被冲散后陆续回到武字区的游击队员重新集中起来，在南原和武字区后区各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分别有 20 多名队员，10 多支枪。不久，黄子文将这两支游击队合编为渭北游击队。12 月底，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金理科、金天华、程建文、黄子文在三原太和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渭北游击队整顿事项。会议决定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各有 20 多人枪。改编后的两个中队立即前往照金，配合正在照金地区活动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1933 年 1 月 19 日相继回到武字区，在富平尚村组织掩护 300 多名群众分粮斗争。

1933 年 1 月中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县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苗家祥任大队长，全队 50 余人，编为 3 个中队。

原渭北游击队改称第一大队，仍由黄子文和金天华分任大队长和政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金天华在第二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刘清和任书记。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先后捕杀了国民党区长、民团团副各一名，还有七八个恶差，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三四十支枪。1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杨声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召集中共武字区区委会议，研究决定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各中队行动方向为：第一中队在武字区和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活动；第二中队由心字区向西发展，与第二大队相呼应。23日，第一中队与敌激战半日。24日，第一中队又遭敌袭击。26日，第一中队与第二中队汇合，改由马志舟任大队长，开赴照金地区。2月4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照金芋园阻击国民党夏玉山民团，直接参加了创建照金苏区的斗争。

渭北游击队恢复后，两个游击大队还帮助各地建立起几支游击队，一支是富平都村、淡村游击队，由六七个党员组成，四五支枪；一支是武字区游击队，共40多人；一支是耀县西原游击队，有七八十人，30多支枪；还有一支是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金天华帮助建立的心字区游击队，有10多人枪。

1933年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在三原、富平另成立一游击指挥部，指挥开展游击斗争。据此，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原渭北游击队两个大队，总指挥李平(刘捷三)，政委金天华(后由张培述接任)，参谋长李天保。随后，武字区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补充支队，心字区游击队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二补充支队。4月下旬，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率领第一大队配合开创照金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歼国民党驻军一个排。5月，黄子祥接李平担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声任政委。后杨声去耀县协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张秀山接任政委。期间，王世泰、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500余人，黄子祥率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大队100余人，与苗家祥所率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二大队一起汇合，在泾阳县西苗村召开军人大会，正式授予渭北游

击队第二大队旗和关防图记。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游击大队和补充支队，为配合红二十六军创建、巩固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 第四章

# 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和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前期斗争

### 第一节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军陕甘游击队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以兵运工作为基础，在陕西和甘肃边县地区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块红色割据区域。

中国共产党莫斯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分析了在西北地区开展兵运工作的有利条件，加强了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和部署。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谢子长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受命前去宜川县凤凰山地方武装梁占魁部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乘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兵力之机，成功组建了一个团，活动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同年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甘肃庆阳与陕西保安县吴起边界的三道川一带，训练部队，准备起义，却遭到地方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世麟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甘肃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的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陕北的安塞、保安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甘肃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编4个连。部队整编后，遭到国民党陇东驻军陈蛙璋部谢绍安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刘志丹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率余部编入国民党驻陕西彬县的苏雨生部，刘志丹任补充团团长。刘志丹补充团扩充部队，筹措军需，引起苏雨生怀疑，遭苏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

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省府参议材斌丞以及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刘志丹获释。获释后的刘志丹，以陈珪璋部第十一旅旅长的名义驻防甘肃宁县早胜镇招兵，扩充武装，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先遭原井岳秀部高广仁团袭击，后又差点遭陈珪璋部蒋云台暗算。脱险后，刘志丹带着马锡五、王璧成连夜冒雨人子午岭回到保安家乡。

在兵运工作一次次受挫的情况下，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兵运和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这年9月，刘志丹同马锡五等来到陇东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编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建立后，活动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袭击当地地方武装，逐渐壮大起来，率先在西北地区竖起了走红色“武装割据”道路的旗帜。

1931年9月，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由于受到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围剿”，处境危险，在拓克宽、阎红彦等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在保安、安定、靖边和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后又收编了杨琪、师储杰率领的两支“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

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在支队长阎红彦等率领下，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东华池一带寻找刘志丹和南梁游击队，并与之汇合。为加强两支游击队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建立中共队委会。在传达整顿的基础上，中共队委会建立，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

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游击队上下一致拥护，游击队内部纪律松散，成分不纯的问题也确实存在，应当整顿，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指战员的食宿和各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游击队便借陈珪璋部扩充实力之机，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甘肃庆阳新堡一带，得到一批军用被装军需物资。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前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批评游击队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游击队脱离陈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游击队南下甘肃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3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顿部队，谋求更大发展。

为加强反帝同盟军的建设和领导，中共陕西省委于1月22日发出指示，要求西北反帝同盟军重视和加强政治、军事和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向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同时要求部队进行整训，并为建立红军游击队做准备。为此，省委还派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前来反帝同盟军主持改编工作。整编过程中，部分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军心不稳。于2月6日缴了第二专队的枪，并打死打伤部分干部战士，一时混战。师储杰趁机拉走属于自己原先保运武装的部队，造成部队损失和内部的不团结。对此，一些革命老前辈、史学界等后来都有一些评价：“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红军陕甘游击队或陕甘游击队)，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4个大队，并建立了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高维翰任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这支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

## 第二节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历程

### 一、攻占职田镇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建立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由谢子长率领，向渭北的旬邑、耀县、富平、三原一带游击。途中活捉了几个土豪劣绅。2月13日拂晓，陕甘游击队队员巧扮国民党旬邑县张洪镇保安队，打入旬邑县职田镇城内，乘其不备，一举捣毁国民党职田区公所，活捉职田民团团长和绅士七八人，烧毁了绅士局账簿、粮册、卷宗，分了“田义和”酒坊的高粱400多石。这时，驻旬邑县张洪镇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搞兵运工作共产党员、七连连长李明轩，送来警卫团将“围剿”游击队的情报。红军陕甘游击队当即撤出职田镇，处决了罪大恶极的豪绅，押走其他豪绅，埋伏于阳坡头。2月14日，“围剿”职田镇的警卫团三营及彬县、长武县、旬邑县三县民团千余人扑了个空。15日，“围剿”之敌便跟踪阳坡头而来，红军陕甘游击队采取埋伏与迂回侧击，断其后路的战术，置“围剿”之敌于疲命之中。加之李明轩作内应，借机大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快跑。”弄得“围剿”之敌纷纷撤退，游击队奋力追杀，占领职田镇。

这次战斗共歼敌500余人，缴枪150多支，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之后的首战告捷，也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

### 二、攻打旬邑县城

红军陕甘游击队攻打甘肃县城(山河镇)后，集结于甘肃正宁县寺

村原休整。4月上旬，在寺村原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大会期间，各村推举七八十名代表，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高维翰当选革命委员会主席，各村也成立了村革命委员会。此时，接中共旬邑县特支报告，旬邑县城内敌警戒疏乎，兵力空虚，防守懈怠。据此情况，红军陕甘游击队当即决定乘机攻打旬邑县城。

4月17日晚，谢子长率红军陕甘游击队从寺村原出发，星夜兼程，18日晚，到达旬邑城下，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在队长吴岱峰带领下，乘城内之敌熟睡之机，首先摸掉西堡子上的岗哨，然后冲入堡内，俘敌一个连又两个排，控制了制高点。接著第二大队又掩护攻击西城门的登城游击队员，抢占了西城门楼。此后，一、三大队集中火力攻击东、南城门。城内守敌及国民党旬邑县政府部分人员纷纷逃至北山，陕甘游击队顺利占领旬邑县城。

红军陕甘游击队入城之后，打开监狱，释放了无辜被押群众。分了地主粮食，捣毁了县“老衙门”，迫使国民党县政府迁往张洪镇。当日傍晚，红军陕甘游击队撤出县城，分两路上了太峪原，到达马家堡休整。

此次战斗毙俘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这是红军陕甘游击队攻克的第一座县城。

### 三、转战永寿乾县礼泉三原地区

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在马家堡集结休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前来游击队。不切实际地指责游击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将游击队原来的4个大队编为第三、五两个支队，并独立活动。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此后，第三支队西进彬县、永寿、乾县、礼泉一带，破毁西兰公路，阻击敌人“围剿”，迎接掩护刘林圃、习仲勋率领的两当起义部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发

动群众，壮大武字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4月21日，刘志丹率第三支队200余人，兵分两路西进，一路骑兵四五十人从彬县过泾河，直驱永寿地区，一举攻克永寿县城监军镇，歼敌20余人，然后继续向五峰山前进；另一路步兵140余人从彬县驽家河渡口过泾河直至五峰山，与骑兵汇合。第三支队以五峰山为据点，分路游击，相机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壮大游击队力量。4月30日，第三游击队袭击了永寿县常宁镇民团，缴枪50余支。由于两当起义部队中途被土匪武装袭击打散而失败，刘志丹迎接、掩护起义部队任务随之告终。接着，第三支队分兵出击礼泉县北山南坊和叱干镇，步兵迂回到五峰山南麓，攻打南坊和乾县民团及土匪，骑兵由刘志丹率领攻打叱干镇民团。

阎红彦率领的第五支队，4月18日晚从旬邑县马家堡出发，星夜兼程，于4月21日到达三原县武字区后，22日中午，中共武字区在龙堡(火烧庙)召开欢迎五支队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陕西省委代表，五支队干部战士，武字区各界群众，与会者达3000余人。大会在发言之后，作出五项决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决定成立武字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在接近照金的耀县西原和三原心字区开展分粮斗争。4月23日清晨，第五支队为避敌重兵袭击，随即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

#### 四、转战中部宜君富县洛川地区

5月上旬，陕甘两省国民党驻军合力向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五支队展开大规模“进剿”。危急时刻，三、五支队于5月10日集结于旬邑清水源。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便于统一指挥，决定恢复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高维翰为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分析敌情态势认为，井岳秀部八十六师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富县(原鄜县)、洛川地区，兵力分散，且距西安、延安较远，不易增援。加之这些地区群众基础较好，沟壑纵横，台塬相间，山高林密，有利于开展游击斗争。遂决定甩掉敌人，向中部、洛川地区运动，寻机歼敌。随后，

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率部向北转移，于5月15日晚，在照金地区以北宜君县马栏镇(今属旬邑)一举歼灭井岳秀八十六师两个连及民团，缴获长短枪200余支。5月17日，红军陕甘游击队继续北上，先后于凤凰山、五里镇、焦家坪连打三个胜仗，歼敌500余人，缴枪500余支，然后转战于中部、宜君、富县、洛川地区。半个月內作战9次，8次获胜，歼敌1400余众。5月底，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泉临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时再遭国民党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只得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红军陕甘游击队和中共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举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湫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委。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无休止地开会讨论。国民党军队乘机进占了湫头原到寺村原村庄要道，部署好了“围剿”游击队的准备工作。危在旦夕的红军陕甘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李艮却要部队严防死守，死守不成拼命进攻。虽然李艮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战略战术指导思想错误，结果游击队在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和三嘉原突围三次战斗中均告失败，伤亡惨重，部队撤到宜君县马栏镇时，只剩下200多人。在游击队指战员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派谢子长重新返回部队，担任总指挥，部队随即开赴照金一带活动。

9月初，敌陇东警备九十七、九十八两个团队，从正宁、宁县等地自西向东而来，井岳秀八十六师五五一团由同官向西北步步逼近。富平、耀县、同官民团由耀县向西进攻，企图“围剿”陕甘游击队于照金。

9月上旬，谢子长率红军陕甘游击队向照金以南地带行动，在杨柳坪捕捉敌一侦探。从侦探口中得知富平、同官、耀县民团400余众，

正向照金地区进犯，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游击队由杨柳坪向后山撤退数十里，诱敌深入，然后掉过头来杀个回马枪。民团进入照金扑空后，果然上当，以为游击队已经“逃窜”，放松了警戒。游击队总指挥部抓住战机，趁夜晚直奔照金。次日拂晓，还在睡梦中的民团，被三面包围。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的坟滩、柿坪等地将民团300余人一举歼灭，此战缴获长枪300多支，其中有一支英国造大机头驳壳枪，是游击队第一次获得的一支连发武器，活抓民团头子党谢芳。随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安子坡，又重创一民团。为避敌锋芒，红军陕甘游击队向北转移，在淳化县安子洼、正宁县刘家庙两次与敌遭遇，战胜敌人。在小丘击毙保安团团长马希哲和敌连长康德润，鼓舞了照金地区军民的斗志，打击了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随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安子洼、南梁、保安东山、富县墩儿梁、八卦寺一带遭受挫折。总指挥部不得不决定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相机消灭小股敌人。刘志丹带70多人到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杨森带五六十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团进入照金；谢子长带30多人掩护，照料30多名伤病员在平定川养伤治疗。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自成立以来，七八个月时间内，长驱直入转战数县，作战几十次，攻城袭镇胜多负少，缴获甚丰，部队得到了实战锻炼，积累了斗争经验。为由红军游击队转变为正规红军创造了条件，也为创建陕甘边区新苏区，特别是照金苏区，实行武装割据奠定了基础。

## 第五章

# 红二十六军成立与照金苏区的创建

### 第一节红二十六军的成立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七八个月以来，屡遭“左”倾错误的干扰，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部队的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提出在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正规红军。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其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

1932年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关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初步设想成立红军一团(拟按红军编制法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连可编枪七八十支)，努力在最短时间内编成红军一师，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再扩充就是四十一师；并“在各地的游击运动中抽出一部分最精锐的部队，编为一团”，征调西安的工人，三原、富平、蒲城的农民参加红军。

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重申了中央关于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要求“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

根据党中央的上述决议和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相应地通过决议并发出指示，具体部署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组建红二十六军的工作。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一指示和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帝国主

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进一步提出：“必须按照现有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番号即用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第一团)”；红军应当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者，要有铁的纪律；政治工作应当按照中央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去建立；战术上，红二十六军在继续采用袭击进攻战术的同时，也应学习阵地战与平原战，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队伍。

1932年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对红二十六军的编制、任务、战略战术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红军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红二十六军。12月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决定。杜衡错误的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分别给谢子长留党察看3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之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12月22日，部队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12月24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军政治委员杜衡兼红二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土地改革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也是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的诞生，是中国特别是西北革命历史的必然产物。她的成长虽然经历了曲折与艰辛，但是她的战斗历程和创造的革命业绩，树立起西北红军这面旗帜，永载史册。

## 第二节照金苏区的创建

### 一、首战焦家坪

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团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就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

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完成任务，红二十六军建军后，立即对照金及其周围的敌情态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决心横扫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据点，打开局面。当时，照金周围民团据点，除陕甘游击队时期已经摧毁的以外，尚有焦家坪、庙湾、柳林、马栏、照金、香山、高山槐等据点。这些据点有的虽被攻克过，但又被敌重新占据。这些据点中焦家坪、马栏属宜君县民团占领，其余为耀县夏玉山(外号夏老么)民团占领。为了打好建军头一仗，鼓舞全军指战员的战斗士气，红二十六军决定首战焦家坪较弱之敌。

焦家坪属宜君县，位于宜君县城西南、同官县城以北，距离西南方向的照金镇约四五十公里。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团驻地杨家店子在凤凰山东南麓，山地平缓。焦家坪据点守敌严加防范，将哨兵设在凤凰山梁上，以防遭到偷袭。红二十六军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决定由红二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麻痹敌人，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拔掉据点。为此，红二团作了周密的部署。12月25日下午，红二团撤离杨家店子，向与焦家坪相反方向的宜君马栏据点进军，摆出一副攻打马栏的态势，造成敌人的错觉。红二团的行军方向，致敌人上当，信以为真，放松警惕，撤除了山梁上的观察哨。

红二团向马栏方向行进20公里之后，当夜急行军返回。26日拂晓时，将焦家坪之敌包围，立即发起攻击，步兵连便衣队先行接火，一举突破敌人防守。骑兵连乘胜冲击，冲得敌人乱了阵脚，敌团总仓皇逃窜，红二团一举将敌全歼，俘敌60余名，缴枪60多支。战斗进行顺利，指战员士气高昂，就连团长王世泰身边的警卫员也冲了上去，缴获三支步枪，兴高采烈而归。首战告捷，指战员欢呼雀跃，士气倍

增，红二团震慑了其他据点的守敌，显示了刘志丹的军事指挥艺术。

## 二、火烧香山寺

攻克焦家坪据点之后，红二团又立即撤出，经衣食村南下香山寺。

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方向 10 多公里的笔架山腰，历史悠久，建寺于中唐时期。寺内广厦千间，气势宏伟，雕梁画栋，精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树木林立，花草芬芳。四周苍松翠柏，古槐参天，怪石嶙峋，突兀峭立。山径崎岖蜿蜒通幽，地形险峻独特异样。香山寺，是陕甘两省边界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寺中和尚上千，尼姑数十，东南亚国家香客居多。寺产土地多达数十万亩，存粮上千石，还贮有大批粮食、物资。

时值灾年，四方逃难灾民流落此地，多达万人。红军路过，齐声呼救。为拯救灾民于水火，红二十六军决定进驻香山寺，开仓放粮。

红二十六军进驻香山寺后，军政委杜衡却提出：香山寺是照金东北方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旦由敌人占据，对创建照金苏区必构成威胁，必须放火焚烧。军政委意见，指战员怎么能去反对。又征求灾民意见，灾民异意者不多，举手欢迎。这样，杜衡的个人意见便成了红二十六军的决定。

决定之后，由杜衡分工部署。烧寺，由红二团负责执行；分粮由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当时分粮解救灾民十分需要，也很正确，灾民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和游击队。这些曾经吃到过红军分给粮食的灾民，在创建照金苏区和长期的革命斗争年代，给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游击队以全力的支援。但是杜衡火烧香山寺，完全是一种无视党的宗教政策和文化遗产的“左”倾错误行为。

火烧香山寺之后，红二十六军在照金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开辟香山寺、九保两个地区。红二十六军率红二团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使红军活动区域扩大到薛家寨和照金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年农民灾民纷纷要求参加

红军，红二团扩建了步兵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300多人，长短枪300多支，红二团开始筹建随营学校。

### 三、再战庙湾

红二十六军自成立以来，经过20多天的转战，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割据区域逐渐形成，在此有利形势下，杜衡脑子又发热起来，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极力推行战略上的轻敌，战术上的死打硬拼，他令仅有300多人的红二十六军打大仗，美其名曰是为了扩大红军声势，加快建立根据地，集中力量，一鼓作气，消灭根据地周边的豪绅地主武装。红二十六军在研究部署下一步行动军事会议上，杜衡一意孤行，极力主张部队攻打庙湾夏玉山民团。

庙湾镇位于耀县县城西北32公里处的沮河两岸，清末以地处河湾、镇南有庙而得名，与西南方向的照金镇相距十来公里。因此，当杜衡提出攻打庙湾时，刘志丹、王世泰、杨重远等向杜衡提出建议，暂时不打庙湾。其理由是庙湾是夏玉山的老巢，经营多年，除民团总指挥部所在地地形险要，筑有明碉暗堡，防守严密，储有足够粮弹物资外，团丁多系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目前，我们无力吃掉它。另外，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期，夏玉山民团与游击队建立有统战关系，民团曾给游击队帮助过武器弹药和给养，提供过情报，彼此互不侵犯。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二十六军带来困难，当地老百姓也可能遭受其害。

两条理由和建议，杜衡根本听不进去，强令攻打庙湾，红二十六军指战员不得不执行命令。为尽量减少部队损失，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团参谋长郑毅和刘志丹以及团参谋处处长杨重远等一起制定了作战计划，其部署是：由杜衡、郑毅、刘志丹带队沿近路抵进庙湾后山，于拂晓发起攻击；由团长王世泰率骑兵连绕道走庙湾下川隐蔽起来堵截逃敌，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1933年1月17日晚凌晨后，红二团分两路从照金向庙湾行动。由于事先对山路距离估计不准，先出发的步兵未按拂晓前的预定时间

到达庙湾后山，而骑兵已经按时进入隐蔽阵地。眼看攻击时间已到，步兵还未开火，偷袭已失掉战机。早上 8 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可能是民团走火)，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骑兵连误以为步兵连已与民团接火，立即发起攻击。一个冲锋，几十匹战马似雷掣电闪，冲进庙湾街里。骑兵连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身先士卒，直接冲向民团碉堡，民团立即龟缩到 3 个碉堡里，阻击红军骑兵冲锋。此时，郑毅、刘志丹带领主力步兵连从山上压下来，投入激战。但是由于红二团没有重武器火炮，缺乏攻坚能力，虽经步骑兵多次强攻，终未奏效，部队也有伤亡。更令骑兵连战士痛心的是连长曹胜荣牺牲，指导员张秀山负重伤，还有几个班长流尽最后一滴血。

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下午，战斗仍在继续，胜负难分。本应立即撤出战斗，不必恋战。但红二团参谋长郑毅重新组织起突击队，反复冲锋四五次，但每一次却被民团以密集的射击和威力很大的手榴弹压了下来。不得已，才于下午 4 时撤出战斗。

庙湾一战，不但没有拔掉夏玉山民团据点，自己反而伤亡二三十人。干部战士对杜衡、郑毅十分不满(郑毅原是冯玉祥部军官，喜欢摆开阵势打大仗)，纷纷要求检讨失利的原因。但是，杜衡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检讨自己“左”倾冒险主义的战术指导错误，反而弃卒保帅，为平息众怒，硬是把失利责任全推到郑毅身上，撤了郑毅团参谋长之职。

撤了郑毅之职，指战员纷纷要求任命刘志丹任红二团参谋长，杜衡迫于指战员的压力，不得不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郑毅被任命为步兵连连长。

撤出庙湾战斗，红二团返回照金休整。照金地区当地群众生活本来困难，又涌来各地大量灾民，红军的粮食物资供给也发生困难。经过短暂休整后，步兵连留下部分干部战士，以配合游击队发动群众，在照金苏区建党建政，骑兵连单独向照金东北方向的宜君方向活动，伺机消灭敌人，设法搞些粮食和物资。曹胜荣牺牲后，由强世卿任骑

兵连连长，团参谋处处长杨重远兼任指导员。

1月27日，骑兵连出发离开照金，当夜宿营衣食村的一个半山凹里。半夜，遭到夏玉山民团的偷袭，睡梦中的骑兵连指战员仓促应战，战马狂奔嘶鸣，无法展开战斗队形，慌乱中，只得向后山梁撤退。等摆脱敌人，战马已损失过半，骑兵连只好绕道甘肃宁县、正宁地区返回照金。强世卿回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家乡组织游击队，由杨琪接任骑兵连连长一职。

骑兵连遭袭，直接原因是指战员麻痹轻敌，选错了骑兵战斗的宿营地。而根本原因还是杜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破坏了与夏玉山民团的统战关系。

骑兵连返回到照金，陕西当局派出3个正规团队和当地民团，以孙辅臣为总指挥，向红二十六军发动“围剿”，面对十倍“围剿”之敌，以刘志丹为首的大部分指战员主张红军避敌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作战，调动敌人离开照金地区，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但是杜衡却错误地要求坚守照金，消极防御，执意把部队拉到照金附近的上芋园和下芋园，待敌进攻。结果坐失良机，致使红军失去了拉到外线作战的良机。

2月4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夏玉山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上下芋园，红二十六军被迫迎敌，敌人不但人数占优，武器火力很强，步枪、火炮一齐袭来，红二十六军只好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退路又被夏玉山民团截断，形势相当危急，幸好渭北游击队赶到，阻击夏玉山民团，红二团才摆脱危险，跳出包围圈。

芋园战斗，红二团不但伤亡了一些战士、马匹，还丢掉了4门“榆木火炮”。“榆木火炮”顾名思义，是用榆木作的，炮身用红布外套套上，行军时用骡子驮运，外形像似大炮，完全是为了震慑敌人，以助军威，没有实用价值，这是刘志丹的发明。

芋园战斗，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连续第二次碰壁。不但使红二团失掉了作战的主动权，而且使创建照金苏区工作蒙受损失。

芋园战斗后，红二团和渭北游击队进入照金，这是照金苏区的中心区域。在刘志丹、王世泰、杨重远等正确意见的指导下，红二十六军和渭北游击队集中力量，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强击弱，骚扰袭击敌人，搞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经过 20 多天的反“围剿”，敌人退出了照金地区，红二十六军返回照金。3 日 3 日，军政委杜衡自行离开部队返回西安。临走时，言称去向省委“汇报工作”。

#### 四、省委派来代政委

杜衡走后，省委派王烈从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三原中心县委来到红二十六军，并化名汪锋。汪锋系陕西省蓝田县玉山镇街子村(现属九间房镇)人，1927 年冬入党。1931 年春节过后，中共陕两省委书记高维翰派人通知汪锋到省委报到。2 月下旬，汪锋按照通知规定的接头暗号和地点见到了高维翰，高指示汪锋前去杨虎城主政的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干部训练班(亦称干训队)开展兵运工作，学习掌握军事技术，建立和扩大卫士营党的力量，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打些基础。卫士营编制很大，张汉民任营长，约有上千官兵，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汪锋进入卫士营干训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在干训队秘密成立了中共支部，汪锋任支部书记，冯世光、李光明任支部委员。汪锋进入卫士营 3 个月之后，6 月 10 日，卫士营扩编为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约 2000 余官兵，张汉民继任团长，阎揆要(共产党员)任三营营长。

警卫团扩编成立后，汪锋回省委军委，主管军委组织工作，负责与张汉民、阎揆要以及警卫团中共组织联系。1931 年 10 月底，阎红彦率领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为书记。人冬后，游击队缺乏冬装、武器、经费，给养困难，汪锋代表省委军委前去警卫团与张汉民、阎揆要商量之后，张汉民派阎揆要、马子敬前往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慰问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送去枪支弹药、经费和情报，解决了燃眉之急。1932 年 1 月和 2 月，这支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反帝同盟军和红

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2月初，时任省委军委书记的高维翰由省委派往陕甘边去找谢子长，改编西北反帝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担任游击队政委兼中共队委书记，省委决定由汪锋临时负责省委军委工作。这年四五月间，汪锋参与省委决策发动了甘肃两当起义和靖远起义。两次起义前期准备工作也是由汪锋代表省委和省军委部署安排布置的。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其中的谢子长、刘林圃、张秀山，也是经汪锋具体安排送行出发的。

七八月间，张汉民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恢复组织关系，任命为上海中央军委驻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负责搜集驻防西北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陕军“围剿”红军陕甘游击队以及西北各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的情报。汪锋和张汉民、阎揆要等一起，先后在西安市竹芭市街同聚军衣庄、骡马市擗毡作坊、彬县水帘洞以及汪锋干亲家韩有录的东涝巷裕茂兴鞋铺建立起秘密联络站，以便警卫团为红军陕甘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军用地图、望远镜和通讯器材，隐蔽掩护来往西安的党内干部和游击队伤病员，安排省委负责人秘密开会或接头。这些联络站点，当时和以后曾多次掩护过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阎红彦、杨重远、贾拓夫等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

这年8月16日的省委会议上作出决议，批评高维翰在陕甘游击队犯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上山逃跑主义”错误，决定撤销其省委常委、军委书记职务，调往中共渭北特委工作，由汪锋接任省委军委书记一职。

汪锋在省委军委书记任上，仅仅4个月时间。在这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陕甘游击队在反“围剿”斗争中有了较快的发展，并着手正式成立红二十六军。10月初，因两当起义领导人和几个主要成员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以及汪锋手下一个搞兵运工作的人员被捕，省委书记孟坚紧急通知汪锋转移三原隐蔽，避避风头，兼任渭北特委军

委书记，与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等一起领导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汪锋兼顾省委和渭北特委的军事工作，奔波于西安和三原之间。11月下旬，省委派汪锋以省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前去周至县与人秦岭北麓的红四方面军联系，等汪锋到达时，红四方面军又南越秦岭。12月中旬，由杜润芝接任汪锋省委军委书记一职，汪锋任渭北特委改组后的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3年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东涝巷韩有录裕茂兴鞋铺秘密联络点的阁楼上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汪锋去陕北，接替赵伯平陕北特委书记一职，调赵伯平回渭北任中共三原县中心县委副书记。3月初，省委却派渭北游击队把汪锋和高维翰送往照金的红一十六军，随同的还有李秉荣。3月初，汪锋和高维翰在照金杨柳坪先后找到王世泰和刘志丹。此时，杜衡已经回西安了。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正式给红二十六军下达了重要指示，其任务是加紧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新苏区，组织苏维埃正式机关，实行分配土地，武装工农。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队的行动，并且为了与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更密切地配合起来，红二十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捷三为总指挥，任命汪锋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任命高维翰负责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派习仲勋、金理科等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或重要成员，以及党团骨干前赴照金，参加领导照金苏区的工作。

## 五、红二十六军转向外线歼敌

为统一领导照金地区各游击队的作战行动，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7日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示信是写给“励君及团委诸同志”的，励君就是杜衡，团委就是红二团党委。从指示信发的时间来看，杜衡还没有回到省委。

省委指示信内容，是根据渭北游击队政委金天华2月7日“关于

武字区及边区和红二十六军情形给三原中心县委报告”的内容而形成的。

省委的信一开头便称：

“适才接到三原报告，知道在耀县、宜君、三水最近产生了五个游击队，省委根据这一形势便提出下面几个意见：

一、省委认为前次关于游击战术及红二十六军编制问题的信，仍是正确的，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指挥部之下，应有中心部队，作为生长成正式红军的骨干。

二、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红军“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省委已调天华同志来省委解决渭北游击队的问题。

三、关于兵变组织的耀县游击队，省委不同意三原县委提出的办法——改变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据县报告，他们已经征调了五六十个农民战斗员到这一部队去，现在的办法应该是将这些兵变与当地农民配合起来，成为几个小游击队，开始游击行动，在编制地要注意每一个小队须(需)有几个最坚定的分子作骨干。”

为贯彻执行省委指示信精神，红二十六军先以照金、旬邑游击队为基础帮助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又协助成立了中

共陕甘边区特委。

3月下旬，得到休整的红二十六军指战员，在汪锋、王世泰、刘志丹的率领下，转入外线作战，主动向东出击，攻克同官金锁关，消灭民团30多人，截断咸榆公路。4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再次改组，决定杜衡回红二十六军担任政委。伏击战之后，汪锋、王世泰和刘志丹又率红二团由泾阳县西凤山跨越泾河，翻山来到淳化县南村堡，一举歼灭南村堡一股民团。4月13日，又歼灭旬邑土桥敌河工队30余人，紧接着，又全歼彬县高龙镇守城民团。红二十六军进入三原武字

区，与渭北游击队汇合，利用游击队熟悉地形环境，了解敌情民情的优势，由游击队佯装“溃逃”的模样，引诱敌人上钩。由红二团设伏袭击，歼敌一个排。伏击战之后，杜衡由西安返回红二十六军。

红二十六军外线作战，以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扫清照金周边敌人的许多据点，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基本确定了照金苏区的四周区域范围，确保照金苏区党政军群组织的成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 第三节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的经验，经过一年时间的浴血奋战，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日趋形成。照金苏区的党、政、军、群组织逐步健全和完善。中共陕西省委除派汪锋、高维翰、黄子文等去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外，1933年1月14日又派曾在渭北根据地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金理科、习仲勋等到照金苏区筹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

金理科、习仲勋和汪锋、高维翰几乎是同时分别于3月初到达照金的。3月8日，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书记金理科(李逵)，习仲勋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特委机关驻照金薛家寨，下辖旬邑、耀县两个县委。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的同时，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也同时成立，书记师克寿。6月，师克寿调红二十六军，习仲勋兼任共青团特委书记。

此时，照金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中共陕西省委也认为照金苏区革命形势发展“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3月15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即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员)、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

员出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4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岳家山召开陕甘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出身的穷苦农民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会等部门。此后，照金、香山、芋园、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建立。大批坚定跟着共产党、世代穷苦出身、且有威望的农民兄弟成为苏维埃组织的领导骨干。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革命法令，建立革命新秩序。

此前的3月中旬左右，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红二十六军帮助下在照金兔儿梁已经成立，红二十六军特派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下辖耀县、旬邑等10多支游击队武装。4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李、妙斋的职务，派其负责薛家寨后方基地的建设，由黄子文任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5月，李妙斋继黄子文复任总指挥。

苏区创建之初，在开展分粮斗争的同时，照金地区的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群众斗争进入高潮。

1933年初，照金地区各村普遍建立农会组织。农会一般设主任1人，委员若干，均由有革命觉悟的贫苦农民担任。当时，主要有芋园村农会(王文强为主任)、房上村农会(马长贵为主任)、陈家坡农会(王满堂为主任)、韩家山农会(李三少为主任)、黑田峪农会(杨玉财为主任)、碌碡坪农会(李龙发为主任)、大崖子农会(张老五为主任)、老爷岭农会(潘克军、朱贵为主任)、金盆村农会(潘克顺、丁月良为主任)、北梁农会(陈开榜、白明礼为主任)等。

在农会普遍建立的同时，妇女联合会也纷纷成立。

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大力开展武装群众工作，在各区县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保卫红色革命政权，肃

清潜藏敌特分子，维护革命秩序，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向红军、游击队不断输送优秀分子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陕甘边区革委还实行禁烟、禁赌、放足等政策，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经过诸多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使根据地的基层组织更加健全，军民更加团结，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

## 第六章

# 照金苏区的建设与发展

### 第一节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

#### 一、土地革命

照金地区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地主和寺院手中，失地农民和灾民以租种土地为生，收成微薄，佃租繁重，生活艰辛。1929年后，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四川、山西以及关中大量灾民涌入，照金地区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更加强烈。

1933年春，陕甘边区党政领导机关和照金地区各乡村党、政机构以及群众团体，根据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发动阶段：陕甘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习仲勋、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等亲自带领干部深入乡村，和基层干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分配的意义和政策。第二，组织阶段：一般是上级指导，乡村革委会和农民联合会、妇女会共同负责，确定具体分配对象，统计户数人数，研究分配方案等。第三，实施阶段：首先宣布没收一切地主、反动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其次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采取两种形式进行分配，一是谁种归谁，即确认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其地归佃农所有，农户不再向地主交纳佃租；二是由贫、雇农代表统一丈量没收的全部土地，测定每块土地的标准等级，按照人口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标准进行分配。分配的原则是，贫雇农享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给予适当补充。

在土地分配运动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法令，宣布废除了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身上的佃租、欠债和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

据调查，当时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占有土地 2000 余

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克、陈家坡地主梅牛玉的土地 5000 余亩。秀房沟村分配了大地主安东财的大部分土地。大崖子村分配了地主杜十二的 500 余亩土地。香山、陈家坡、北梁、韩家山、杨家山、谢家庄、老爷岭、黑田峪、南趟、小崖子村、碌碡坪、兔儿梁、杨柳坪、孙家山等乡村，还分别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潘家、雷家、李家、耀县学堂、香山寺院及当地地主的大量土地。

土地革命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照金苏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以各种方式支援红军，如照金群众中掀起了参军热潮，先后有 30 多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子、青年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其中很多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照金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动，男的不分昼夜为部队运送粮草、修建工事、打造堞墙；女的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制面粉、做饭洗衣。此外，群众还热情地护理红军、游击队伤病员，不辞辛劳。事实证明，照金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不但使耕者有其田，而且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使党和红军、游击队获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对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有着重要意义。

## 二、经济建设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积极推行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实行生产互助互帮自救，鼓励群众努力增产增收、改善生活。

1933 年春夏之际，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薛家寨山下的亭子沟建立起集贸市场，约定 5 天一集，后来几乎天天有集，上市交易买卖商品主要是粮食、蔬菜等农副土特产品，粮食中有面粉、苞谷、小麦、小米、豆类；蔬菜有土豆、萝卜、白菜、大葱、豆角、辣子，还有豆腐、活鸡、鲜蛋，偶尔也有肉和其他东西。红军游击队和党政机关的后勤部门在集市上坚持公买公卖、“要让群众先买”的原则，保护白区来的中小商贾，受到群众称赞。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苏区还是白

区远近的群众也前来交易，货杂人旺，集市氛围浓厚，上市物资日益增多。

亭子沟集市贸易市场，不仅方便了周围群众，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红军的生活和其他必需品，从而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苏区经济。

### 三、文化建设

1933 年初，随着照金苏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除开展武装斗争，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领导群众分粮、分地，组建地方武装外，也非常重视苏区文化建设。当时，青壮年农民、灾民，还有一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纷纷自愿参军，红军在数量上增加了不少，但文化素质却普遍贫乏。根据这种情况，红二十六军决定成立随营学校。校长由李杰夫担任，汪锋任政委，学员 30 余人，后陆续增加。随营学校一方面教给学员文化知识、讲授革命道理；另一方面还对学员进行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的训练和培养，使他们迅速成长，为红军培养了后备骨干力量。为活跃战士们生活，红二十六军在战斗的间隙和休整期间，经常开展一些小型文艺活动。在对广大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时，以顺口溜、快板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效果很好。

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的建立和苏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表明党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不忘军事教育，不忘发挥文化、舆论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这对党在照金苏区长期开展革命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四、后方基地建设

照金苏区的薛家寨，是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红军和游击队的后方基地。1933 年 3 月初，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成立后，总指挥李妙斋就率领陕甘边游击队(当地人称耀西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进驻了薛家寨。从此，薛家寨成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大本营。陕甘边各地的游击队、起义军、革命青年纷纷来到照金，薛家寨成了同

敌对垒的指挥中心。

薛家寨的山梁上，顺序排列着5个寨子，5个寨子有4个相互连通，以4号寨子最为险要。从山下仰望，5个寨子壁立千仞，坚硬的石灰岩山体构造，暮春初秋，寨子上有积雪可现。站在四五号寨子山梁前端，向下鸟瞰，山下秀房沟、黑田峪过往行人一目了然。为了照金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十分重视薛家寨后方基地的建设，在薛家寨办起了修械所，从西安兵工厂接收来几批修械技工，最多达六七十人，修理枪械，制造弹药和地雷。修械所制造的麻辫手榴弹，形似甜瓜，下边大，上端小，大头顶端有底火，上端安装一小环，用麻丝拧成辫状作柄，便于红军和游击队战士战斗时携带，所以叫“麻辫手榴弹”，这是一位叫“武功”的同志发明创造的。其原料大部分是将铜币熔化而成的，全为铜质，这是红军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一种杀伤威力较大的重要武器。薛家寨还建有红军医院、被服厂等。

为了寨上安全，加固了哨门，后哨门(北哨北)修有碉堡，筑了堞墙，设岗放哨。打堞墙需要黄土，薛家寨是石头寨，石质坚硬无比，黄土都是当地群众从老远的地方肩挑、背驮而来的，历时半年多时间。

为了方便上下寨子，游击队和群众一直把路从山下迂回修到山上寨子。寨上的吃粮，除购买征用以外，大部分还是通过统战工作从大地主手里弄来的。经过一番建设，薛家寨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之家”，照金苏区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

## 第二节 年轻富有朝气的党政军领导成员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党政军群组织之所以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除了党的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之外，也与苏区党政军几位领导成员分不开。他们年轻有为，对党忠诚，苦大仇深，经过战斗洗礼和实际锻炼，有工作魄力和能力。

## 一、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

金理科，1904 年生于陕西三原县，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2 月，负责三原县武字区“抗敌委员会一分会”工作。这年 7 月，三原农民“交农”围城斗争失败后，担任中共武字区委南原支部书记。1931 年参加渭北游击队，第二年与马志舟一起，领导组建了三原县口外庄赤卫队，在武字区一带活动。1932 年 7 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书记。这年 11 月上旬，渭北革命根据地遭敌“围剿”，中共陕西省委接连两次改组渭北特委，第二次改组时，金理科临危受命，以省委委员兼任渭北特委书记，收拾扭转危局。12 月下旬，渭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金理科受中心县委委派，和黄子文、金天华、程建文在三原太和堡重建根据地武装，将南原和武字后区两支游击队合编成立了渭北游击队，黄子文任指挥、金天华任政委，下辖两个中队，共 40 多人枪。渭北游击队成立后由黄子文、金理科带往照金地区，配合红二十六军创建照金苏区的行动。近 20 天后，渭北游击队回到武字区。紧接着在富平尚村掩护 300 多名群众分粮斗争。金理科为恢复渭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被群众誉为“民众领袖”。

1933 年 3 月 8 日，金理科担任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在主持特委全盘工作的同时，在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支持下，前往照金附近的高尔塬、小池一带开展活动，逐步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建立起游击队第六支队。他还到淳化县北部的十里原、马家山、城前头、铁王等地建立恢复党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组建起淳化游击队，在领导特委一班人为创建和发展照金苏区工作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 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

周冬至，陕西富平人。1928 年，16 岁的周冬至参加了富平西区的“交农”斗争，同年加入共产党。1929 年随母亲逃荒避难到照金。1932 年秋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照金，后来，结识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留在照金开展群众工作的李妙斋，周冬至对照金一带人熟地熟，又有

人缘，有革命激情和干劲，在李妙斋的帮助下，周冬至和李妙斋一起创建了芋园游击队。1933年1月，周冬至担任了红二十六军后方筑路总指挥，修筑通往薛家寨山上的道路。3月5日，芋园游击队改编为耀县游击队和政治保卫队两个队，周冬至任政治保卫队指导员，带领保卫队在照金苏区参加土改工作。4月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当选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习仲勋一起致力于照金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11月，被任命为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九支队支队长。1934年冬，在一次巡逻中不幸被叛徒杀害于旬邑县甘草坪。

### 三、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妙斋，1903年出生在山西汾西县城关镇店头子一贫苦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抱着“不把这不平等的社会砸烂绝不回汾西”的决心和志气，辞别家人，于1927年11月间西渡黄河，来到陕北清涧县，投身陕北地方势力派高双成部任事务长。1928年，经马济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妙斋就在高双成部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13月，担任高双成部营长。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李妙斋随军驻河南许昌，任邓宝珊警卫营营长。中原大战结束，任邓宝珊卫士长。1932年2月，邓宝珊任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执掌甘肃军政，李妙斋任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队长，名叫李华峰。这个补习队是个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学员分为军官队和军士队两个队，约260余人，也是邓宝珊最基本的部队。军士队中有11个秘密党员，9个担任队长、分队长或班长。1932年9月中旬，蒋介石给邓宝珊一批武器，约五六百支步枪和弹药。邓宝珊派李妙斋率干部补习队前去平凉接运武器回兰州。出发前，李妙斋和补习队党员秘密商量接收武器后进行起义事宜。他们认为，在补习队干下去，以后再向大处发展是不可能的，现在，起义客观条件具备了，在平凉附近进行起义最为

适宜。但是有的党员认为补习队党的力量薄弱，学员多数为小资产阶级，没有起义思想准备。最后商量决定到平凉后再成立行动委员会，由行动委员会视情况决定是否起义。到平凉后，邂逅中共陕西省委派去的李艮。李艮与李妙斋、周志学等党员谈话后，遂决定实行起义。起义地点选择在平凉西 35 公里处的蒿店，起义一旦成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的名义开展游击活动，援助陕甘游击队创建新苏区。10 月下旬的一天，正式起义，但因党的力量薄弱，思想不统一，学员思想基础工作没有做好，地方反动民团追击，起义失败，史称“蒿店起义”。

蒿店起义失败后，李妙斋不得不离开邓宝珊部，来到陕甘边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这年 11 月，刘志丹派李妙斋前往照金地区开展工作。

李妙斋来到照金芋园，住在一户山西籍灾民韩天成家里。李妙斋按照刘志丹的指示，以寻找乡亲揽活为掩护，串村走户，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并逐步将工作扩大到房上、黑田峪、秀房沟等村落。李妙斋白天和群众一起上地干活，了解情况，晚上走家串户，秘密宣传革命。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李妙斋着手建立党组织，成立农民游击队。他发展了邓允乾、邓克勤、王金海、韩天成、潘世珍等人入党，并成立党支部。同时组织韩天成、韩歪、韩黑子三兄弟和邓克勤、何乾富、黄登文，秘密打制马刀、长矛，购买枪械弹药，于 1932 年冬组建了芋园农民游击队，邓克勤(照金白沟村人)任队长。这是照金地区第一支游击队。

在芋园开辟工作期间，红军陕甘游击队又派出一批干部到照金、香山、旬邑、宜君等地发展革命力量，由于这批干部的努力，从 1932 年底到 1933 年初，相继成立了香山、上下芋园、照金等 4 支农民游击队。农民游击队实行统一管理、分散活动的原则，由李妙斋负责指挥，人们习惯上也称其为陕甘边游击队。

李妙斋所领导的陕甘边游击队，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既有

国民党正规军，又有很多民团、土匪武装。李妙斋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善于通过统战工作来求生存、求发展。他同庙湾民团团总夏玉山交上“朋友”后，夏玉山曾为陕甘游击队掩护伤员，代购枪支弹药，通风报信。

1933年1月17日，杜衡执意打庙湾，结果失利，不但没有消灭夏玉山，反致红二团遭到很大伤亡。红二团只好决定将李妙斋继续留在照金地区做地方工作。

不久，李妙斋带着陕甘边游击队、北梁妇女游击队和红军伤精员上了薛家寨，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沿山修筑道路，整修窑洞，筑堞墙，修掩体，开辟交通壕。薛家寨上面的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仓库，寨下和芋园的交易市场，最初都是经李妙斋之手办起来的。寨上存粮很少，特别是遇到连阴雨天，游击队和伤病员吃粮困难，李妙斋和薛家寨上下秀房沟一户开明地主搞好了关系，多次向这户地主借粮，他都如数借给。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打了胜仗，运回粮食，李妙斋又如数还粮。这户地主还腾出自己粮库窑洞，让游击队和红军存粮。总之，薛家寨一度之所以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大本营和后方基地，是与李妙斋的筹思谋划、辛勤工作分不开的。李妙斋不论是打仗、搞游击队武装和做群众工作，都是十分出色的。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集体中，他的年龄最大，阅历丰富，工作成绩出色，大家都很敬重他。

后来，整顿游击队武装，黄子文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一职，李妙斋以主要精力去抓薛家寨大本营基地建设。不久，又复任总指挥一职。

#### 四、习种勋身兼四职

在照金苏区，身兼四职的领导干部就要数习仲勋，其4个职务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团委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此时，他还不到20岁。

习仲勋这次来照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32年的八九月间，是

为追随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而来。这年4月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打入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中共营委书记习仲勋和省委军委成员刘林圃以及该营的共产党员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官兵，在驻地甘肃两当县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计划北上旬邑，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陕西永寿县岳御寺时，遭国民党部队及土匪武装的围攻而失败。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西去永寿一带接应时，起义部队已经失败而散。

两当起义失败后，由于长途跋涉，加上敌人通缉搜捕，弄得习仲勋疲惫不堪，心力交瘁，直到病倒。为躲避风头，寻找组织，他从长武县亭口辗转回到富平，又不敢进淡村家门，只好投亲靠友，四处躲藏。时隔多日，去富平县城找高小时的石仲伟老师，不幸被十七路军驻防县城部队抓去，经过时任县教育局长的石仲伟营救获释。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第一高小与同学程建文邂逅，程是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前来三原武字区视察工作的。二人简单化装，次日同行，出了富平县城，当天赶到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三原武字区长坳堡，见到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表达了渴望尽快前去红军陕甘游击队寻找刘志丹、谢子长的心愿。

习仲勋寻找刘、谢二人的迫切心情，得到了同村周老四的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勋在家乡发展的党员。习家和周家向来关系融洽，过从甚密，结为干亲。周明德老人的侄儿周冬至，也是习仲勋的干兄长。关中十八年年馐，周冬至随父母亲逃荒要饭到照金，在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下来，租种田地，糊口度日。留在富平老家的周冬至叔父周明德时常赶牲口或推独轮车运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顺便看望侄儿一家。他往返次数多了，也听到一些关于刘、谢等带游击队在照金及其周围活动的消息。周明德把听来的消息告诉给了习仲勋，并愿意以推盐车换粮为掩护，偕伴而行，带习仲勋去照金，打听刘、谢活动消息。

这样，周明德推车，习仲勋拉车，赶到一百四五十里外的照金，住在周冬至家中。

功夫不负苦心人，习仲勋终于打听到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镇西边四里远的杨柳坪驻扎，他急忙从老爷岭周冬至家赶到杨柳坪，找到谢子长。几天后，又见到了刘志丹。

习仲勋分别见到仰慕已久的两位革命长者，倾诉了两当起义失败的经历与挫折，得到刘、谢二人的勉慰和教诲。比习仲勋年长整整10岁的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你的这些情况我知道，两当兵暴时你还是队委书记。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大习仲勋17岁的谢子长对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9月12日，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趁着浓雾弥漫，攻打反动民团，击毙和生擒民团团总党谢芳以下六七十人，然后筹粮筹款，北上保安。临行前，谢子长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七支队。”刘志丹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不但有吩咐，还特意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

(即保卫队)留在照金，并交代和安排习仲勋参与这支武装的师导和教育，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一起行动。这个特务队，正是1928年5月旬邑武装起义部分人员组成的游击队。在程双印、第五伯昌等率领下辗转加入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经游击战磨练，这个特务队人员整齐，政治坚定，英勇善战。

习仲勋和程双印、第五伯昌一起，率特务队与李妙斋组织的游击队并肩战斗在芋园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赤卫队、少年队等群众组织。

留在照金的特务队，正在发动群众创建照金苏区的时候，队内却发生了支队长陈克敏叛变的事件，给游击队的工作和安全带来严重破坏和影响。特务队分队长陈克敏，又名陈连升，原籍河南泌阳，土匪出身，生性凶残不羁。谢子长、刘志丹率队离开照金，一段时间过后，特务队队长程双印，凭借坚定的党性和负责保卫工作的敏锐嗅觉，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陈克敏政治投机行为，预谋叛乱，重操土匪旧业。于是他便带特务队数人赶到碌碡坪欲制止陈克敏叛乱。当程双印他们刚刚踏进一孔窑门时，事先隐藏在窑内的叛徒向他们开枪乱射，程双印等一时不知所措，出现混乱，程双印当场牺牲。

陈克敏叛变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特务队这支武装，习仲勋和第五伯昌商量后决定，由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任代理队长，带队迅速撤离照金，南下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三原武字区。

一个多月前，习仲勋离开武字区去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如今为了保留特务队这支革命武装，又回到武字区。

习仲勋、第五伯昌带来的特务队，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亦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陈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主要活动于渭北根据地西北边界的富平、耀县地区。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军委书记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的王烈(汪锋)和第五伯昌曾来第二游击队检查指导工作，给游击队讲话。

在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第二游击队同第一游

击队一起，参加渭北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接受革命的洗礼。

但是，在党内“左”倾错误指导下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和大游行示威后，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驻军和六县民团联合武装“清剿”袭击渭北革命根据地，渭北游击队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率第二游击队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然后由队长陈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游击队转移到旬邑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照金也不安宁，敌人到处捕杀革命者，他俩又返回心字区，在一个有水的洞内隐藏了 10 多天后转危为安。国民党驻军和六县民团“清剿”袭。击过后，李杰夫回了省委，习仲勋秘密转移到富平县西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富平西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所辖区域，这里和根据地中心三原县武字区一样，也遭到驻军和民团的“清剿”和袭击。

习仲勋携带枪支，转移到家乡淡村附近的唐家堡，在一个叫岳强明的家中，召集姚万忠、刘鸣凤、岳强明几个党员开会，成立了淡村党支部。姚万忠任书记，随后，还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勋以淡村党团员和革命青年为主，建立起淡村游击队，二十来个游击队员，由岳强明和刘鸣凤负责。接着，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武，带领游击队来到淡村开辟工作，习仲勋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

在富平西区，习仲勋带领当地党组织，指挥两支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发动上千农民强制收缴和分配当地豪绅粮财和土地给贫苦农民，处死民愤极大的两个恶霸地主。既开展斗争，又要隐蔽自己，习仲勋和几个领导骨干成员有时晚上不得不在荒郊野外塌陷的坟墓洞中过夜。

12 月中旬，中共渭北特委在富平原县城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心县委员，兼共青团三原县委书记，机关随后由富平迁回三原武字区，开展兵运、军运工作。2 月底或 3 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正式调习仲勋回省委另行

分配工作。这时，红二十六军已从庙湾战失利中恢复过来，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省委选派一批重要干部前去照会，充实和加强党政军群的领导，习仲勋就是其中之一。3月初一天，习仲勋出发来到三原县城。第二天，经鲁桥镇，为避民团，取道线家塬落脚表姐家。第三天，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化装行商模样北行，经三原武字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时，与自行离开红二十六军回西安的杜衡邂逅。第二天，二人分手，习仲勋赶赴照金。

第三次来到照金的习仲勋，身肩四职，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等组成强而有力的党、政、军领导核心，以红二十六军作坚强后盾，发展和巩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在这片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内，建立革命新秩序，区、乡、村革命委员基层政权得到巩固，穷苦百姓翻身解放。

在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习仲勋和金理科、周冬至、李妙斋走进山村，通过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依靠基层政权和农村骨干分子，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土地革命。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仅仅是编制序列和组织形式。但是很难对 20 多支大小不一、驻地分散的游击队武装实行统一的领导。照金游击运动发展很快，游击队内也混进一些投机分子，组织严重不纯，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破坏军民、军政关系的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红二十六军党委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特委军委决定改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调原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任总指挥。

整顿期间，习仲勋和黄子文等撤销原有编制，对游击队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一番彻底整顿和改造，遣散了一批成份不纯、严重违纪分子，将原来 23 支游击队建制，重新整编为一、三、五、七、九、十一支队和妇女游击队。整编后，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进行阶级教育，大大提高了游击队的军政素质。在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

的影响带动下，基层群众武装工作也开展起来，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妇女队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革命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和他的战友们也为照金苏区的民主政权和游击队武装建设做出了贡献。

### 第三节反“围剿”斗争

照金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和红军游击队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惊恐和不安。照金苏区距离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西安较近，苏区红军和游击队武装威胁着国民党当局的安全，影响了他们的税收、粮款，苏区内一些被分粮、分地、镇压的地主恶霸“喊冤”告状，国民党陕西当局不能容忍下去，一面调拨大批武器弹药，装备照金苏区周围县区的反动民团，一面派正规军配合民团“围剿”照金，苏区军民开展了一场反“围剿”斗争。

4月下旬，国民党调集正规军4个团、6个县民团，委任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原为共产党员)为总指挥，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进犯之敌以骑兵团和部分民团为主力，寻找红军和游击队决战，其余民团在陕甘两省的淳化、三原、同官、正宁、合水等县分路堵截。国民党八十四师的一个团与十七路军警卫团、特务团相机协助骑兵团进攻苏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党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习仲勋、黄子文率领游击队，坚持照金苏反内线斗争；红二团转移外线插入敌后，寻机歼敌，打破“围剿”。红二团在王世泰、汪锋、刘志丹率领下，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赋予的任务，转战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宜君等地，所向披靡，一路攻敌，捷报频传。先后在宁县王乐堡、金村庙、段家堡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进犯之敌顾此失彼。坚持苏区内线斗争的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在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利用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抗击敌人外，游击队还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骚扰敌人。

这次“围剿”总指挥王泰吉，是位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他曾和刘志丹一起领导西北工农革命军参加渭华起义，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不愿打红军，对“围剿”敷衍塞责，常跟在红军后边虚张声势，国民党当局的这次“围剿”只能是草草收场。

粉碎“围剿”之后，红二十六军于6月中旬返回照金。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团体，根据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在芋园、照金、秀房沟、大崖子、香山、陈家坡、北梁、老爷岭、黑田峪、碌碡坪、杨柳坪、孙家山等村镇，继续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 第四节政治保卫队遇袭

国民党当局的这次“围剿”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但是，“围剿”期间，受过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多次打击的反动民团及土匪武装，却利用“围剿”之敌一度占领照金之机卷土重来，出没于苏区之内，进行扰乱破坏。尤其是以民团名义，驻扎在与薛家寨隔沟相望的龙家寨陈克敏民团土匪武装，给内线反“围剿”斗争带来很多麻烦。

5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和黄子文两位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从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决定带政治保卫队前去距薛家寨东南10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北梁附近征收粮草。次日清早，习仲勋和黄子文带政治保卫队20余人由党家山出发，路过房沟村，再上陈家坡。行至半坡上，事先埋伏在坡顶的陈克敏民团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突然开火，向保卫队袭来。习仲勋和黄子文果断指挥，相互推让对方迅速撤离。黄子文刚刚离开，习仲勋腰部中弹，倒在地上，鲜血殷红衣衫。保卫队员黄金荣疾步过来，搀扶习仲勋撤退。这时，敌人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并一再高喊，“交枪！交枪！”结果，习仲勋同几个队员一起被俘。押解途中，一个叫黄致祥的押解人员，利用机会，释放了习仲勋。原来这个黄致祥虽为反动民团团丁，

曾经写信要投奔游击队，只是游击队把他的来信未核实清楚，没有答复，仍留在民团。但是他同情共产党、红军和游击队，向往革命。

习仲勋脱险之后，拖着沉重的双腿，带着重伤来到柳林一个小山村，进入一个叫郑老四的贫苦农民家中。郑老四和老伴用土方为习仲勋消疼止血，重新包扎，做饭送水解饥饿，晚上又把习仲勋送往南边四五里外的庵子村。这时，周冬至、黄子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王满堂，以及被冲散的政治保卫队队员也来到庵子村，五六名伤员已经得到分散安置。

过了几天，黄子文和周冬至组织保卫队员和群众，用担架把负重伤的习仲勋送回薛家寨营地，安排在二道寨子一孔石窑内医治伤情。王世泰、汪锋、刘志丹返回照金后，都前来看望。

# 第七章红二十六军南下

## 第一节北梁会议

红二十六军结束外线作战，返回照金。为了研究苏区工作，制定红二十六军下一步行动计划，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党委于6月17日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杜衡、汪锋、刘志丹、金理科、李妙斋、李杰夫、秦武山、高维翰、师克寿、杨文谟、高锦纯、李秉荣、惠泽仁、魏武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杜衡违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二十六军必须要更加紧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根据地”指示精神，错误地认为陕甘边区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建立新苏区。为说服大家，杜衡提出南下渭华的几个有利条件：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基础工作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二十九军，可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刘志丹、金理科等多数人反对南下，他们认为，渭华地区一直是国民党反动势力最为雄厚的地方，属平原地带，交通方便，地面开阔，不易游击作战，敌人易于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动兵马和重武器进攻。而对于红军，则无所遮掩，不易立足，主张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坚持照金苏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正在治疗养伤的习仲勋，不能参加会议，他委托金理科，把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的意见带到会上。然而，杜衡不顾现实情况，对刘志丹、金理科等人横加指责，还给他们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否定了他们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强制会议通过了部队南下渭华的决定。

杜衡独断专行，执意要把红二十六军送上不归之路，并非是他一叶障目，只看到南下渭华对红军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对红军不利

的因素。这是杜衡“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本质、共产主义信仰丧失、革命意志动摇的必然结果。

杜衡在陕西党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多年，向来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巧言善辩，马列主义词藻常常挂在嘴边，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权欲极重。3月初，杜衡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在他的强烈要求下，3月23日，省委全会接受了杜衡提出的改组省委的错误意见，对省委重新进行了改组，杜衡如愿地当上了省委常委。省委改组后，陕甘边区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认为杜衡屡次害怕艰苦，借故不愿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坚决反对杜衡留在省委工作。加之省委书记孟坚一再请求离开陕西，省委乃于4月9日召开全会，会议同意孟坚离陕请求，由袁岳栋接任省委书记，免去杜衡的省委常委职务，令其立即返回红二十六军。

杜衡返回部队的时候，正是反“围剿”斗争之际，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作战。一回到部队，杜衡就被“围剿”之敌所吓倒，对继续坚持陕甘边区斗争丧失信心。一天，红二团行动到照金西边一个叫尖坪的地方，杜衡私下里就对汪锋谎称：省委有个考虑，可能的话，打算让红二十六军到渭华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杜衡实际是在试探汪锋的口气。汪锋觉得眼下正是反“围剿”时期，杜衡的话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在意。6月17日，杜衡在北梁会议上把南下渭华作为“省委指示”正式下达以后，汪锋便以应该执行“省委指示”支持了杜衡的意见和主张。

## 第二节二台子会议

1933年6月21日清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团召开了动员大会。杜衡和红二团参谋长刘志丹在会上分别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刘志丹宣布了行军序列：骑兵连为前卫，红二团和随营学校居中，少先队押后。行军路线是经洪水镇、泾阳、高陵，然后南渡渭河上临潼山。为了确保南下，部队作了必要的调整，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守根

据地，多余的武器留给地方。动员大会结束后，红二团指战员 300 余人，带着七八十匹战马，以及比较充足的枪支弹药，从北梁出发，挥师南下。

当天下午。红二十六军到达桃曲原。大约下午 4 点多钟，部队正在开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偷偷占领村南土寨，向红二十六军猛烈开火。刘志丹、王世泰等观察敌情后，指挥部队截断敌人退路，经过一场激战，歼敌 80 多名，缴获一批枪支。

6 月 22 日，红二十六军由桃曲原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 100 多华里，到达三原县二台子，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汇合。

张秀山是第一次打庙湾时负伤离队去西安疗伤的，当他伤愈离开西安返回部队时，省委书记袁岳栋要他回到部队转告杜衡，要求红二十六军粉碎敌人围剿后，积极巩固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张秀山在二台子见到杜衡后，立即向他转达了省委的指示。然而，杜衡对省委的指示置若罔闻。无奈，张秀山又向刘志丹、王世泰转达了省委指示。刘志丹向他说明了红二十六军出发前，陕甘边区特委曾在北梁召开会议等有关情况。

这天中午，杜衡在二台子一个学校操场边大树下主持召开了红二十六军党委和渭北游击队负责人联席会议，史称“二台子会议”（实际上会议地点距离二台子 10 多里），讨论红二十六军南下开辟渭华根据地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杜衡、王世泰、汪锋、刘志丹、高维翰、黄子文，渭北游击队的张秀山、黄子祥，以及高锦纯等连队负责人。会议开始后，杜衡首先讲话。继续奢谈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有利条件。他说，部队今天要转移方向，南渡渭河，到渭华、商洛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商洛山势险要，比北山富裕，同时依托南山可威胁西安，既能切断陇海路，又可与陕南红二十九军汇合，取得支援帮助。渭北游击队领导人对杜衡的意见表示异议，劝阻他不要冒此风险。张秀山再次向杜衡传达省委要求创建、巩固陕甘

边区根据地的指示，认为红二十六军孤军深入白区，敌情不分，不利于部队发展。杜衡拒不接受劝阻，指责张秀山有本位主义思想，强令红二十六军尽快南渡渭河。

6月23日拂晓，部队出发。下午，部队行进到三原武字区的长坳。在长坳，红二团根据渭北游击队的要求，配合游击队攻打了敌富平张德润民团。此民团据守长坳，是当地地主豪绅特意从富平请来，专门对付游击队的。由于杜衡急于出发南下，所以红二十六军只配合游击队打了一下长坳，很快就撤出了战斗。接着，部队开到寇家庄，杜衡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指定汪锋代理红二团团党委书记、政委。之后，杜衡只身离队，部队继续前进。

### 第三节张秀山密信报省委

二台子会议上，张秀山对杜衡拒不听从省委决定，急于南下渭南的行动感到不安。长坳战斗结束后，他连夜写了密信，通过交通，速送陕西省委。省委接到红二十六军南下的消息，非常着急，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而且会将红二十六军断送在渭南一带，省委书记袁岳栋立即亲赴三原，阻止红二十六军南下。

袁岳栋急冲冲赶到三原县城，正巧碰见杜衡，袁岳栋遂在三原民众教育馆召集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以及杨声、黄子文等5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袁岳栋主持。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南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经对斗争，杜衡勉强承认他“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停止南下，仍回照金根据地，由黄子文追赶途中的红二十六军，传达省委这一决定。同时，由赵伯平立即通知高陵党组织，在渭河畔拦截红二十六军。黄子文追到渭河边，红二十六军已过渭河。高陵党组织亦未能将部队拦住。

渭河渡口，是渭北地区通往西安的一个主要渡口，北口位处高陵县。红二十六军离开寇家庄，连夜向高陵方向行进。6月25日早晨8

点左右，部队行至渭河渡口。夏天的渭河，水涨河宽，波涌浪急，几百号人马仅有两只小木船摆渡，拖延时间，万一驻高陵敌人追来必然是背水一战。幸好从河南岸划过来一只木船，正是反动民团团总薛兆兰。等小船一靠岸，薛兆兰被捉。小船用来摆渡，骑兵连连人带马入水过河。两个小时，渡河完毕，部队渡河后经耿镇，径直向南行军。途中，在灞桥附近村子发现敌军四五十人正在吃饭。乘敌不备，红二十六军迅速将其包围，迫使敌人缴械。当晚，部队在临潼骊山以西山坡宿营。在这里，汪锋召集王世泰、刘志丹等召开团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意见争论不一，有的主张部队继续前进，有的主张后退返回。在这关键时刻，刘志丹发表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意见。他认为：进也险恶，退也险恶。进，可以与敌周旋；退，惟有与敌决一死战。再以党内是非而论，中途返回，胜败都难以分清是非曲直。最后，他以简洁的语言，陈述了败于进而不败于退的利弊，终于说服了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意见作出决定，继续南下。

红二十六军渡过渭河，国民党陕西当局立刻调动兵力，在渭华各坳口和商洛南山各重镇布防。另从西安出动两团兵力追击红二十六军。当时在红二十六军周围，白军及民团有四五千之众。渭华山谷一带是华山余脉，有南北长二三十里几个大山坳(峪口)，坳口有村庄，南北出口非常狭小，加之红二十六军未能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因此被敌人围在几个山谷之中。

6月26日拂晓，一场恶战开始了。部队在前进中，与敌警备一旅唐嗣桐部和临潼敌保安团遭遇。红二十六军战士奋不顾身，先敌数分钟抢占高山头，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向秦岭山区进发。敌人拼命进攻，紧紧咬住红二十六军不放。为了迅速摆脱敌人合围，汪锋、刘志丹带大部队先行撤出阵地向羊毛山前进，王世泰带骑兵连掩护撤退。沿途，部队又碰到几股民团堵截，指战员们精神抖擞，连续冲锋，杀开一条血路，翻越两座大山，日经五战，行军100余里，于下午4时多，到达蓝田县流峪口，后折回厚子镇穆家堰宿营。

27 日，红二十六军翻越秦岭南下受阻。清晨，部队刚刚行进不到 10 里，便中了当地民团埋伏。红二十六军立即反击，打死打伤十几个民团团丁，敌余部逃窜。红二十六军转锋向东，经周楚庙、桥南至箭峪口宿营。28 日，红二十六军进入箭峪沟。中午，敌人追了上来，与红二十六军后卫部队接火，战斗十分激烈。为了掩护汪锋、刘志丹带主力继续前进，王世泰率步兵一连阻击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王世泰带领后卫部队摆脱敌人追击之后，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络，3 日后，两股部队才在青岗坪附近汇合，这时已到 6 月底。

至此，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根据地整整 10 天。10 天内，部队找不到地下党组织，联系不上群众，杜衡所讲的一切“有利条件”都未能出现在眼前。部队只是在敌人连日围追堵截下，孤军作战，一路苦撑。至此，红二十六军已钻进了死胡同：路是崇山峻岭，人是挨饥受饿，马是疲惫不堪，缴获的 200 多支枪反而成了累赘，只得一焚了之。

#### 第四节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部队在青岗坪经过休整，7 月 1 日继续南进，大约四五天后，到达坝龙庙附近。由于刘志丹事先派人给坝龙庙民团团总李林荣谈去亲笔信，劝他保持中立，帮助红二十六军购买粮食和物资，部队在此没有受到阻击。借此机会，红二十六军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筹集粮秣。

7 月 8 日，部队进驻张家坪。张家坪地处西安至商洛的交通要道上，四面环山，梢林密布，公路两旁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住着十几户人家。当晚，部队夜宿张家坪。第二天清晨，山中浓雾弥漫，村庄道路一片模糊。早饭后，红二团党委在村内一个大客店里召开党的扩大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会议未结束，村外就响起激烈的枪声，敌警备一旅唐嗣桐旅和地方民团趁大雾从东北沟里突然打进张家坪。听到枪声，与会人员立刻冲出店外，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多次强攻，争取时间，使汪锋、刘志丹带领部队分别在上午突围出去。突围中，汪锋

腿部中弹受伤。第二天八点钟，敌人组织大约两营的兵力，向红二十六军占据的山头再次发动猛烈攻击。红二十六军被迫沿大台子山、瓦房沟节节撤退，最后从坝龙庙南山向东穿插，抵洛南县两岔河一带，才算摆脱敌人。张家坪一战，红二十六军全体将士浴血奋战，分路突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兵败终南山。100多名战士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受挫失败，是杜衡“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断送了年轻的红二十六军，是陕甘红军历史上遭受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 第五节刘志丹重返照金

红二十六军在张家坪被敌冲散之后，分三路突围出来。突围中，汪锋中弹负伤，弹头留在腿部。汪锋忍着巨痛，带六七十名指战员从界牌沟突围，翻越北坪、新店子、鸭峪到达窄峪川的卡房。后因敌人追来，转由半沟向野竹坪、葛牌镇行动。途中，多次与地方民团遭遇，战士伤亡很大。部队突围到甘家坪时，只留下随营学校校长赵启民等10多人。汪锋留在当地养伤，其他同志化装成农民，分散出山。刘志丹带领部队沿公路突围几公里后，调头上了南山，到蓝桥一带，又由蓝桥向北辗转于深山密林之中。他牵挂着失散的同志，几乎每天都派人外出联络。红二十六军战士多是陕甘边区的人，对蓝桥一带的地理极为不熟，加之部队整日流动，没有固定的地方可找，结果只有派出的人没有回来的人。就这样，刘志丹带领部队在密林中坚持了20多天。王世泰带部队突围到两岔河北山后，把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保留二连番号，补充了战士，仍由吴岱峰当连长，高锦纯当指导员，余下的人直属团部领导，由杨文谟负责。他们在两岔河一带活动大约一个多月，部队经常没有吃的，没有宿营地，生活异常困难。

三股部队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由于环境恶劣，四面受敌，战士疲惫，生活艰辛，只好作出分散出山，返回照金的决定。数日后，

王世泰和刘志丹在石头峪后山重逢，一行人朝着华县方向运动，两天后到达华阴庙的南山梁豁口，夜宿半山坡，遭暴雨、山洪袭击。天亮，继续西行，3天后又转回坝龙庙一带。住在薛增平(原渭华起义时的一个队长)家。由于薛向当地民团暴露了刘志丹等人的身份，使大家面临随时被包围和袭击的危险。紧急关头，刘志丹沉着冷静，带领大家机智地逃出险境。几天后，刘志丹等在箭峪后沟碰到省委派来营救的黄子文以及渭南县、地下党同志，在向导的引领下，他们连夜下山，天亮前到达黄麓口，找到当地党组织。

在黄麓口，刘志丹、王世泰等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为民除害，枪杀了宋家斜恶霸宋宗武。第二天晚上，在地下党员王杰向导下，刘志丹、王世泰等来到华县赤水镇，靠近渭河。赤水一带，敌人封锁很严，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刘志丹和王世泰等人。赤水渡口，敌人有一个排把守，盘查森严。为了确保刘志丹的安全，渭南县委反复研究后决定，派几名水性好的地下党员，夜间护送刘志丹、黄子文、曹士荣泅渡，闯过敌封锁线。王世泰和李胜云(黄子文的爱人)假扮夫妻，以走亲戚为由骗过敌人，从敌严兵把守的渭河渡口携枪过河。计划执行很顺利，渡河后，刘志丹一行先后来到白家庄，刘志丹住在张文华家，王世泰住在白思堂家。

在白家庄期间，几个人白天隐蔽，夜间出外活动。主要是打土豪劣绅，筹集路费。有一天，地下党组织报告，敌人有两只满载面粉的船，搁浅在白家庄南的河滩上。渭华县委研究决定夺面粉救灾。后由王世泰、白思堂、张我公带领数百名群众，夺走敌人两船面粉，并把面粉全部分给群众。此后，敌人发疯似的到处搜捕参与这一行动的指挥者和群众。为确保刘志丹安全，地下党组织将一些路费和一副货郎担子交给刘志丹。刘志丹他们买来衣服及其它物品，将枪支藏在货郎担箱底夹层之中，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一行4人，扮成游乡串村的卖货郎，在地下党组织协助下，北朝蒲城荆姚、兴镇、六井方向一路北上。

回照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近路，从蒲城以西，经富平、耀县；

一条是远路，经蒲城、白水、洛川、富县、甘泉、保安、合水、宁县、正宁、耀县 10 县，绕道回去。因敌人刚刚围歼过王泰吉起义部队，近路沿途哨卡林立，封锁严密，通行困难。远路，虽然路线长费时间，但沿途有地下党关系，比较安全。最后，刘志丹一行 4 人决定舍近求远，绕道陕北西行回照金，并根据各人情况进行了分工。白水以南由黄子文负责，洛川以上由王世泰负责，保安以西由刘志丹负责。他们西进保安，经大凤川至合水县包家寨。由包家寨动身进子午岭，途经五亭子、芦包梁、艾蒿店、马栏川、老爷岭，顺桥山山脉南下，于 1933 年 10 月 4 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安全返回陕甘边照金。汪锋则在两个月之前的 7 月底辗转回到西安。半个月之后，由省委派往陕南汉中巡视工作，重建中共陕南特委。

# 第八章

## 陈家坡会议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

### 第一节三支武装力量的形成

#### 一、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之时，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却率全团官兵起义，转投革命营垒，这对改变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造成照金苏区红军主力兵力薄弱的局面无疑是一件莫大的好事。

王泰吉，陕西一位传奇人物，陕西临潼县(今西安临潼区)人，出生于1906年，曾就读于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他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西北党组织创建人魏野畴影响，家境虽好，却立志革命。这一年5月，他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同年冬，被派往河南开封，任国民军二军学兵营排长。一年多后转入陕西甄寿山部，任教导团一营营长，驻防陕西西府山区麟游县城。这时，甄寿山部仍隶属国民军二军。1928年春，王泰吉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执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率二营发动兵变，打算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史称“麟游起义”。起义后，撤离麟游县城，北进经崔木镇到达礼泉县南坊镇，因受到当地民团袭击围攻而失败。王泰吉随后进入渭华地区，与刘志丹、唐澍等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遭通缉，只身潜往河南，暂时落脚在南台县一富户家中打长工，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不幸遭敌逮捕，押解南京监狱，与党失去联系。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在陕西军界、政界和教育界任职多年，与杨虎城有深交之谊的父亲王新斋，托杨虎城具保，王泰吉得以出狱。出狱的王泰吉从南京北上山东，看望正在临沂“剿匪”的杨虎城，杨留他在身边任参谋。杨虎城

入陕后，又任命王泰吉先后担任十七路军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新兵训练处处长、骑兵团团长。1932年夏初，骑兵团驻防耀县。其间，王泰吉了解到南方中央红军两次反“围剿”胜利，根据地扩大；北方，许权中、谢子长等一批自己熟悉的共产党人奔赴察绥抗日前线，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看眼前，刘志丹、汪锋坚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再看国民党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危亡，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国策，“围剿”红军和苏区，镇压革命群众。王泰吉听到、看到这些现实，回归革命队伍，继续革命，为国抗战，为民族效力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两个月前，王泰吉率领骑兵团和民团四路“围剿”照金苏区时，就无心“进剿”，虚以应付。进军途中，他策军缓行，始终与红二十六军保持一定距离，虚张声势。一天，红二十六军转战到淳化小茨，骑兵团驻天王镇，两地相距5里，两军哨兵可以相互对视，总指挥王泰吉却佯装不知，双方相安无事。不久，红二十六军北上正宁、宁县，骑兵团尾随两天，后调头返回耀县县城，“围剿”就这样应付过去了。王泰吉回西安向杨虎城“交差”，二人有一段对话，很是耐人寻味：“我把刘志丹打败了，他们都跑山上去了。把红军照金的老巢也给收拾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我手里没有炮兵，没打下来。”王泰吉说。

杨虎城却表态说：“算了吧！打人家寨子干啥。”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王泰吉就派老同学、时在三原中学任教的何寓础作为自己的代表，寻找中共陕西省委。何寓础原为中共党员，此时虽没有组织关系，但仍与党保持着联系。何向省委汇报了王泰吉起义的打算。6月中旬，王泰吉回到耀县县城，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省委认为，王泰吉此时如能起义，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对陕西、对陕甘边和照金苏区的斗争都是有利的。省委便派余海丰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和何寓础一同由西安来到耀县，在县城北风景秀丽的天宝滩，余、何二人与王泰吉进行了秘密会议，拟定起义计划。王泰吉坦诚地介绍了骑兵团内部情况及耀县军政当局，余海峰代表省委对骑兵团在国难

之时倒戈起义表示欢迎。余、何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后，省委先后派杜衡和渭北游击队政委杨声(刘映胜)到耀县，具体领导骑兵团起义，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县委委员周芝轩和孙烈到耀县协助起义工作。为了给起义筹备装备，6月下旬，王泰吉去西安向杨虎城报告“围剿”战事时，领到一批军饷和装备，并买回大量雨具。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王泰吉和省委代表杨声再次召开连排长和进步士兵秘密会议，安排了起义的具体事宜。

1933年7月21日拂晓，耀县古城枪声大作。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驻耀县县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领千余人马在耀县宣布起义。时值盛夏，起义军袒露左臂，臂膀系着红布条，扛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大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头冲向县政府、保安团、民团、警察局，迅速收缴了耀县城内所有武装(胡景铨民团、雷天一民团和警察局、县政府)的枪支，占领耀县县城，并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简称“抗日义勇军”或“义勇军”)。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省委代表杨声任政治部主任(党代表)。义勇军成立后，布告民众，宣传抗日，同时开仓放粮，释放全部在押“犯人”，逮捕了当地一批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中午12时，起义军在耀县西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处决了耀县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两家大地主的财物和国民党政府的存粮，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扩大了抗日影响。此外，义勇军还协同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由市民代表组成的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拨给了游击队一批枪支，有力地支持了耀县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王泰吉率部起义数日后，向三原方向行动。途中遭到暴雨，行动缓慢，当天部队行军到渭北根据地时，受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几千人的欢迎，给起义部队送来了鸡蛋、瓜果进行慰问，举行了欢迎大会。“兵富不能作战”，第二天出发前，王泰吉下令全体官兵将起义时缴获的大量烟土、银元、首饰等财物一律交公。部队随即向三原县城进发，当行至鲁桥镇轳轳把村时，与追剿起义部队的十

七路军孙友仁团遭遇，发生激战，义勇军受到重大损失。王泰吉见力不抵敌，下令义勇军掉头向照金转移。正在此时义勇军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部和参加起义的雷天一民团叛逃，致使军心浮动，导致起义部队最后遭受严重挫折。

骑兵团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部队中党的力量过于薄弱，全团仅有党员二三名，起义时派去的几位党员不能立即培养和利用骨干分子影响部队；起义准备时间较短，对部队未能作必要的政治教育，有相当多的官兵对这次抗日义举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起义部队纪律较差，人心涣散，有的人甚至公开利用起义之机，大发横财；起义之前，对内部不可靠人员未能作适当处理，起义中，又将已缴获雷天一民团枪支全部退还，民团配属起义部队，还委任雷天一为民团大队大队长，委任原国民党耀县县长为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结果都叛离而去，对部队起了瓦解的作用；对军事形势估计不足，采取了向三原行动的错误方针，致使起义部队进抵鲁桥镇轳轳把村时与敌孙友仁特耀县让：牛村与王泰吉汇合，途中，从义勇军溃散士兵口中得知，王泰吉率义勇军 100 余人取道西路小丘进入照金，习仲勋于当日率队返回照金，与王泰吉见面。

当晚，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安排王泰吉和义勇军宿营在薛家寨山下。王泰吉无不歉疚地对他们说：“你们看，我才带来那么一点儿人。”习仲勋宽慰地说：“兵不在多而在精，现在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坚决革命的都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陕甘边特委恢复了王泰吉的组织关系。

王泰吉率骑兵团耀县起义，意义重大，影响深广。起义是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照金苏区红军武装力量空虚的情况下，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起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激发了正在处于困难境地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军民

战胜困难、勇斗时艰的顽强革命精神。

除此而外，王泰吉率部进入照金，为根据地带来了 100 挺还没有拆封安装的手提式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先进的重武器装备，这是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从来未有的，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军民武器装备水平。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进入照金，大大增强了苏区的军事力量。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决定打掉盘踞在后沟寨子反动民团，既能解决照金苏区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挖掉这个反动武装据点，消除威胁。后沟寨子处在一条沟内，站在寨子，仰望是高山，俯视是石崖，中间筑墙，地形特殊复杂，寨内间有房屋、窑洞，藏粮甚多，当地不少土豪士绅躲藏于此，是国民党地主民团一个顽固堡垒，游击队几次下手，未能得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在王泰吉率领下，将寨子包围起来，以迫击炮和“麻辫手榴弹”为主要进攻武器，发起猛烈袭击。同时发起政治攻势，进行战场喊话。民团只好打开寨门投降。义勇军和游击队进入后沟寨子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暂时缓解了苏区军民吃饭生活问题。

## 二、耀县游击队建立

王泰吉率骑兵团起义之前的 6 月下旬，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在县城北街曹雯家中主持召开县委会议。会上，杜衡代表省委向县委通报了王泰吉将率领耀县骑兵团起义准备进展情况，传达了省委对耀县县委全面配合起义的要求。为此，省委还责成耀县县委立即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省委还把张仲良从西安派回耀县，协助县委建立武装。

7 月 21 日，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当晚，中共耀县县委在曹雯家里召开第二次会议，省委代表杜衡、杨声和张仲良参加了会议。会上就配合骑兵团起义具体工作进行研究，决定立即组建耀县游击队。第二天，陈学鼎来到北区民团，民团团长赵连壁有病，不能正常工作，陈学鼎代理了民团团长，并将这支武装全部拉到阿姑社，同时协同陈国栋带领的同官西区农民起义军，智取阿姑社城堡，击败了阿姑社地

主武装，使这次农民起义获得成功。此时，早先在阿姑社发展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带领 50 多名赤色群众，参加了起义军。在此基础上，中共耀县县委成立耀县游击队。陈学鼎任游击队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耀县游击队收缴了北区民团枪械 30 多支，把民团中倾向革命的分子吸收为游击队员。耀县游击队组建后，积极配合起义部队在乡村开展革命斗争，召开了阿姑社村民大会，没收了恶霸左善楚的仓郭家产，焚毁了左家盘剥人民的土地契约，追捕镇压了左氏三霸 分粮百石，收缴大烟土 500 多两、银洋 300 余元，不仅解决了托义军的部分给养，而且赈济了广大贫民，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陪着，游击队由孙家塬党支部书记蔡奉凯带路，到东区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张廉明。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不少青壮年自愿参加了游击队。义勇军通过县委给游击队调拨来 19 支毛瑟枪，县委又利用雷天一民团内部人员的社会关系，弄到 10 多支枪和四五箱子弹，加强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八九十人、六七十支枪。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三原进发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耀县县委带领游击队转移到白家庄，继续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同地主阶级作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分了周家地主的粮食，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张仲良任副队长兼政治指导员，曹雯任经济委员。游击队下辖 3 个中队，陈国栋任第一中队中队长，王安民任第二中队中队长，张治怀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全队共约百人，六七十支枪。7 月底，游击队在陈学鼎、张仲良、张邦英带领下从自家庄出发，向西北方向挺进，经墓坳、道东、高山槐等地，进入照金苏区，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将耀县游击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三支队。

### 三、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

渭北游击队是以 1931 年 5 月组建的 30 多人三原武字区武装赤卫队为基础，经一个时期的发展壮大，先后改称为武字区游击队、武字区游击大队而形成的。1933 年 2 月初，金天华率领渭北游击队曾经

进入照金，在芋园配合红二十六军作战，创建照金苏区。在芋园阻击战中，帮助红二十六军突出敌人包围圈。3月上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渭北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4月下旬，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渭北游击大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歼侯家堡国民党骑兵排。5月，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张培述先后调离，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祥任总指挥、杨声任政委。

红二十六军南下前夕，要求渭北游击队到嵯峨山南麓二台子与之汇合。渭北游击队接信后先期到达二台子。二台子会议之后，红二十六军继续南下，配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攻打驻长坳堡国民党张德润民团，营救被捕的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长孙平章。此后，杨声去耀县协助王泰吉发动骑兵团起义，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代表县委决定张秀山任渭北游击队政委。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三原中心县委的请求，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4日，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在三原武字区焦村，召开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游击队负责人黄子祥、杨森等30余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杜衡传达了省委决定，议定了红四团的编制和干部名单。任命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黄子祥为红四团团长，原陕甘游击队大队政委杨森任政委，原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参谋长李天保任参谋长。红四团编制4个连(当时仅有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一连连长马子舟，指导员王伯栋；二连连长高占胜，指导员王安民。7月26日，红四团在武字区小道口村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大会由黄子祥主持，杜衡授旗，赵伯平出席大会。武字区各农联分会代表和200多群众带着衣物、鞋袜等慰问品参加大会。

7月27日，王泰吉、杨声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三原鲁桥辘辘把战事失利，红四团为策应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收拢部队，北上照金，减轻国民党部队对照金苏区的军事压力，决定再次打击富平淡村张德润反动民团。7月30日拂晓，红四团于武字区与淡村交界的老户沟伏击张德润民团。经两小时激战，除少数团丁漏网之外，包括张

德润在内的民团人员被击毙或生俘，张德润被就地处决。

## 第二节杜衡被捕叛变省委遭受严重破坏

7月26日，杜衡在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三原县武字区小道口村参加完向红四团授旗大会之后，返回西安。7月28日，杜衡同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宣传委员贾拓夫及高岗4人，来到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作掩护，研究王泰吉率骑兵团耀县起义失败善后等问题。饭间，国民党特务尾随而来，贾拓夫、高岗寻机逃脱，袁岳栋、杜衡当场被捕。袁、杜二人被捕后即叛变投敌。侥幸脱险的贾拓夫，暂时隐蔽在西安，处理省委危局。高岗带着省委的介绍信赶赴照金，通报袁、杜被捕叛变事件。袁、杜被捕叛变后全部供出陕西地下党组织状况，供出了省委及其下属组织领导人姓名和活动据点，供出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和王泰吉起义来龙去脉，供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照金苏区有关党和红军、游击队等重大机密。接着，袁、杜二人带着国民党军警、特务四处寻找并当场指认抓捕革命同志，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相继被捕入狱。陕西关中、甘肃陇东等地下党、团组织遭受空前的严重破坏。关中幸存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入低潮。

袁、杜二人的被捕叛变，被国民党陕西当局一直视为芒刺在喉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首要“进剿”目标。8月上旬开始，国民党以六个正规团队的兵力，再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敌人进入三原武字区，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游击队员和赤色群众。据当年8月9日《新秦日报》披露：仅杨竹荪团第一营在老户沟一带获嫌疑犯百余名。第二营在油房沟、第三营在太和堡获犯各七八十名。并正在对各该地区中之高窑、地洞继续搜查破坏。敌进入武字区后，见人就捕，肆意枪杀，许多村堡和群众倾家逃离，人去房空。在这次“围剿”中，渭北根据地农村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先后有四五百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赤色群众遭敌逮捕，其中包括中共三原中

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被迫转移照金苏区，渭北革命根据地被敌占领。

袁、杜二人被捕叛变，致使陕西省委3年多时间没有重新恢复起来，其间成立的几届临时省委也屡遭破坏，直到西安事变之后的1936年12月25日才正式恢复成立了新一届陕西省委。

### 第三节陈家坡会议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袁、杜二人被捕叛变，省委破坏，渭北革命根据地丧失，陕西革命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和挫折，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巩固扩大照金苏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党当局对渭北一带的“围剿”，直接卡住了关中通往陕甘边及照金地区的通道，土匪、民团在苏区内骚扰破坏，烧杀抢掠，致使照金苏区越来越小，物资极缺。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也开始动摇，甚至叛变投敌。虽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相继进入照金，但还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照金苏区仍然存在着严重危机。

为了组建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巩固和加强红军建设，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尽快发展红军主力，避免分散活动而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秦武山、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王泰吉、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及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连以上干部，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原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去西安寻找省委，新任书记秦武山和习仲勋主持会议。会议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清算了“左”倾错误，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还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重返照金的指战员等陕甘边现有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集中指挥，形成红军主力部队，以便集中优势兵力，形成拳头，深入陕甘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会议决定王泰吉任陕甘边区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决定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刘志丹未从陕南重返照金之前暂不宣布。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对汇合起来的三支部队的今后行动方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人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会议由当天中午过后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

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这三支红军队伍，今后是坚持集中领导，统一行动，还是继续分散活动。黄子祥、王伯栋等人不同意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红四团回到三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他们认为陕西省委已遭破坏，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减员很大，就目前这点力量，统一行动目标大，困难多，行动不便，还是分散打游击好。与此同时，个别来自三原地区的干部，留恋渭北地区，也要求把部队拉回去。上述观点，遭到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反对，秦武山、习仲勋、杨森、高岗、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等认为分散行动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消灭。只有集中行动，才能使部队形成强有力的拳头，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张秀山曾在渭北游击队工作过，对渭北根据地的情况，对黄子祥、王伯栋等人的思想状况比较了解。他在会上说，渭北根据地各方面条件的确很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敌人能允许我们在那里立足吗？渭北离敌人太近了，距敌人的统治中心西安才100多里，距渭北重镇三原县城仅20多里，敌人是绝不会让我们在他们鼻子底下存在的。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后，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力量很弱，即使部队回去了，敌人打来，部队能坚持得住吗？我们现在有三支力量，如果分散作战打游击，那只会被敌人逐个消灭，不可能形成主力红军部队，不可能形成一个拳头去打击敌人，根据地也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与会绝大多数人员认为，形势确实是严峻的，但是，我们还有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党政军一部分骨干还在，这是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坚决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应该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在陕甘边区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苏区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

争论的第二个焦点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人选。与会的大多数人员主张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黄子祥、王伯栋则认为，王泰吉来任总指挥，不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吗？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是党的领导干部。骑兵团耀县起义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因原是国民党的部队，成分比较复杂，但经过三原辗转把战斗、耀县小丘战斗及照金战斗之后，不坚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剩下的抗日义勇军人员素质较好，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领导红军的问题。

争论的第三个焦点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人选。会上之所以推举高岗任临时总指挥部政委，是因为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支撑危局的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写信给特委，派高岗来领导军事工作。高岗到薛家寨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会议决定高岗任抗日义勇军政委，现在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也是顺理成章的不二人选。黄子祥、王伯栋反对高岗担任这一职务，他们以省委被破坏为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与会的习仲勋、秦武山都证明高岗来时，带有贾拓夫开具的介绍信。

陈家坡会议，是红二团南下失败，省委破坏，陕西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陕甘边区特委与省委失去联系，独立自主主持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上虽然有争论，而且很激烈。但是，最后环是统一了思想，形成共识。这次会议，统一了三支武装的指挥。提出了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方针，为日后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对发展和巩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及照金苏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 第四节红军东西出击游击队保卫薛家寨

陈家坡会议结束之后，由三支武装重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投入保卫和巩固照金苏区的战斗，对处于低

潮时期的陕西人民特别是照金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并以实际作战行动和战果，消除了笼罩在照金苏区人们心中的疑云和党内一些同志的消极情绪。

从8月下旬开始，新成立的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集中兵力，东西出击，巩固和发展苏区。首先向东，先后在庙湾消灭民团一部，在高山槐消灭耀县雷天一民团10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这是对雷天一破坏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接着又先后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在柳林消灭民团数10人。9月初，又向西出击，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坡一带消灭民团100余人。然后转入甘肃正宁金村庙地区，消灭地主武装一部，缴获长短枪10支及部分粮食、物资。东西出击，大获全胜，不仅恢复了照金苏区部分区域，扩大了红军和游击队武装，提高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必胜信心；同时，鼓舞了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照金苏区转危为安，更加巩固。

9月中旬，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为扩大东西出击的有利局面，决定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李妙斋和新任政委张秀山率领下，就地坚持照金苏区斗争，令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即三支队)转入外线作战，进入合水县境内开展斗争。

9月20日，国民党军刘文伯部纠集耀县夏玉山、雷天一民团、陈克敏土匪武装，还有旬邑、淳化、宜君、同官4县民团，共千余人，乘红军主力离开照金之机，兵分数路从黑田峪、鸡架山、后沟、南趟、桢树岭等地对照金苏区袭来，企图首先占领薛家寨。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率领游击队奋勇抗敌，打响了保卫薛家寨的生死之战。

这天拂晓，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和政委张秀山率领游击队主力撤出老爷岭战斗，回到秀房沟还未来得及休息，黑田峪就冒出一股敌人，游击队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几小时的鏖战，游击队以少胜多，击败黑田峪方向的进攻之敌。与此同时，庙湾夏玉山民团和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民团等千余人，在叛徒陈克敏带领下，从薛家寨后梁发动进攻。薛家寨此时仅有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留守。在这兵

寡势孤、情势危急之时，寨上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和妇女游击队的全体队员，纷纷拿起武器，进入哨所、路卡，投身战斗。进犯之敌凭借人多势众和优良装备，轮番发动猛烈攻势，保卫队据险固守，巧布地雷战，并以修械所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和滚石等武器顽强抗击，阻敌于险壁之下。酣战中，山风骤起，大雨滂沱。保卫队坚守在各个哨位点上，冒雨杀敌，愈战愈勇。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和张秀山击退黑田峪之敌后，立即率游击队主力从秀房沟赶回，冒雨增援薛家寨。他们脚踩泥泞，翻山越岭，爬上前哨门，迅速到达后沟。游击队赶到后，立即散开队形，加强各哨位的阻击火力，进行猛烈反击，薛家寨一时石雷滚滚，枪弹齐鸣，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游击队猛烈反击下，敌军人心涣散，畏缩不前，最终狼狈溃退，薛家寨保卫战取得胜利。李妙斋见敌败退，走出北哨门堞墙，吹起哨子，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时，被敌人埋伏在梢林里的伏击手击中，不幸壮烈牺牲。边区特委决定，由吴岱峰继任边区游击队总指挥。

### 第五节奇袭张洪镇

转入外线的红军主力，到达合水固城川，与强世卿率领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汇合。强世卿是先前刘志丹从红军陕甘游击队派回陕北安定组建游击队的。此时的一支队有 70 余人，30 匹马。两军汇合后，战斗力大增。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部队南下，向彬县世店镇前进，途经旬邑北后区底庙原，旬邑县朱鸿章保安团 50 余人前去“清剿”，9 月 21 日拂晓，红军突然发现保安团活动，王泰吉总指挥立即命令步兵就地埋伏，骑兵向两侧迂回包同，便衣队绕到保安团侧后截击。保安团遭受包围，除一人逃跑外，其余 52 人当了俘虏。这时，保安团副班长宋飞，向红四团杨森政委报告张洪镇内仅有保安团第二大队 80 余人留守。宋飞是原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员，打入保安团多时。得到宋飞的情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奇袭张洪镇，由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国栋率领 40 多名红军战士，身藏短枪，化装成保安团团丁，由

宋飞带路先行，大部队随后。

张洪镇是旬邑县重镇，1932年4月12日，刘志丹率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打开旬邑县城，旬邑县政府就搬到张洪镇。如今，张洪镇实际上就是旬邑县县城。

下午3时，经过化装的红军战士到达张洪镇城门口，宋飞先上前与守城哨兵搭话，哨兵一看宋飞带的“自己人”回来，二话没说，让红军战士顺利进城，红军战士顺手缴了哨兵的枪。进城后，宋飞带红军战士直奔保安团团部，团部乱作一团。宋飞趁势大喊：“红军来了！不要怕，快缴枪！”保安团丁一看大势已去，乖乖缴枪。此时，奔赴保安团副团长朱鸿章处的红军战士，当场击毙了朱鸿章和他的老婆。红四团杨森政委率大部队直奔县政府，俘获县府人员，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谢骞等。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连夜开仓放粮，破狱救民。

这次奇袭张洪镇，俘保安团150余人，击毙12人，缴获枪支120余支，物资20驮。9月22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撤出张洪镇，返回照金休整。

10月4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和前去寻找他们的黄子文历经艰难曲折返回到照金。刘志丹的回来，为照金苏区及其整个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集体，增添了主心骨。刘志丹正式上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王世泰任红四团二连连长，黄子文派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 第六节 袭击合水县城

陈家坡会议之后，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率领红军和游击队的强势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奇袭张洪镇回到照金的主力红军，正在进行休整，侦察到驻耀县小丘国民党孙友仁特务团有进犯苏区的迹象；驻扎在中部、宜君、淳化和甘肃庆阳

一带的冯钦哉、何高候、赵文治等部也虎视眈眈，磨刀霍霍，伺机进犯而来。当时，红军主力 400 余人，虽然比红二团时的武器装备有所改观，但仍然与敌之人员、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不可一比。面对可能来犯的强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陕北一支队避敌之主力，转入外线，寻机歼敌；由游击队总指挥部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率领全苏区各游击支队坚持照金苏区的斗争。

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打击目标，选定为陇东地区的合水县城。据侦察，合水县城当时驻有敌赵文治团一个连和一个保安队，总共不到 200 人，战斗力不强。从照金到合水，沿途梢林密布，有利于部队隐蔽行军，这也是刘志丹提出的建议。

10 月 12 日，部队出发，行进 300 里，15 日下午顺利到达合水具黑木塬，距合水县城约 30 里。

合水县城位于子午岭山区城壕川，是个跨山城池，形如葫芦，也称葫芦城。葫芦头面川，葫芦尾连山，城外两条深沟，悬崖峭壁，十分险要。东西两个城门楼高大坚固，是敌人设防重点，有双重城廊，城墙用青砖砌成。

合水城易守难攻，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等综合分析合水县城地形后，决定采用突击队偷然袭击的战术破城。鉴于刘志丹对合水熟悉，决定由刘志丹担任攻城总指挥。刘志丹挑选 20 多名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由红四团二连和陕北一支队组成主攻连。强世卿率突击队攻城，部队在城外隐蔽待命。

18 日晚，部队从黑木塬出发，凌晨 3 点，突击队摸到预定爬城攻击位置，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突击队员柴正祥自告奋勇当爬城先锋，只见他身带几颗手榴弹、一支驳壳枪、三把刺刀和绳索爬城，登上云梯，爬到云梯顶端，再用三把刺刀轮换插入城墙砖缝，脚蹬手攀一点一点向城墙顶端爬去。登城成功，撒下绳索，突击队员们纷纷登城，分组占领攻击位置，首先制服哨兵。正在熟睡守敌，万万没有

料到如此坚固的城防，红军竟然如同天兵飞降，一时乱作一团，束手被擒。这一仗，除少数敌人乘机逃跑外，其余被歼被俘。合水县长及县城内的十几个大地主无一漏网，救出押在监狱内的 80 余名共产党员、革命骨干和赤色群众，其中包括前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二支队二大队队长杨培旺。同时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开仓放粮。随后，红军撤离合水县城。

奇袭合水县城，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充分显示了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和刘志丹的指挥才能。

合水县城被破，敌赵文治丢了一个县城、一个连，他恼羞成怒，率 200 余人尾追红军而来。王泰吉、高岗、刘志丹决定采用疲劳战术，牵住赵文治鼻子，与其周旋，拖疲拖垮，然后瞅准时机把敌消灭于运动之中。赵文治果然上当。10 月 28 日，红军牵着赵文治行进到庆阳县毛家沟门地域，总指挥部见时机成熟，当即部署迎敌，待敌跟进时，红军迅速占领地形，给敌以突然打击。

随着总指挥王泰吉一声令下，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敌死伤大片，顿时大乱。红军乘机发起反冲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从正面，红四团从右侧，耀县游击队从左侧，猛烈进攻。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红四团骑兵连奋勇冲杀，勇猛追击 5 公里，一举将敌全线击溃。此次战斗，共毙俘敌 200 余人，缴获枪 200 余支(挺)、弹药大部。毛家沟门战斗，重创赵文治团，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大振了红军军威，大灭了敌人的锐气。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张洪镇、合水、毛家沟门等战斗的胜利，毙俘敌 800 余人，缴枪 500 余支(挺)、骡马 100 余匹。几次胜利，为扩大主力红军，建立扩大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扭转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斗争的被动局面。

## 第七节薛家寨失守

红军主力北上之后，敌人经较长时间准备，再次向薛家寨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的《西京日报》公开发表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陕西政府主席)、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为再次“围剿”照金苏区，占领薛家寨。10月11日，国民党当局将驻陇东之杨渠统旅长调回西安，担任“围剿”总指挥。面对敌情变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与游击队总指挥吴岱峰、政委张秀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反“围剿”，保卫薛家寨。

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共6000余人，携带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向照金苏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围剿”。敌以孙友仁特务团(附属一个炮兵营)及三原、淳化、耀县三县的民团为主力，进攻薛家寨；以冯钦哉师一个团在中部、宜君一带堵击；以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一带堵截；以陇东赵文治团为追击部队。

为了把迫击炮等重武器运到有利位置，敌人到处抓捕群众来修建小丘到龙家寨的道路，并沿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边境构筑了一条堵截线。10月上旬，孙友仁率王占元一个营上山和占据龙家寨的土匪首领陈克敏接头，把一门十二吋山野炮和一门十五吋迫击炮运上龙家寨，敌人的指挥部也设在龙家寨山顶上，与薛家寨形成隔沟对峙局面。由于陕甘边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一支队、五支队、七支队、九支队、十一支队在秀房沟、老爷岭一带与敌人作战，薛家寨兵力空虚，仅有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和少数游击队员，加上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及红二十六军后勤人员共三四百人留守。薛家寨是陕甘边红军唯一的后方基地，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游击队总指挥部等领导机关都驻扎在薛家寨，这里还聚集了习仲勋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储存了大批物资，安置有伤病员，也关押了一些被俘人员。

10月13日，孙友仁率他的特务团和夏玉山、雷天一等反动民团约两千余人，依仗猛烈炮火掩护向薛家寨发动了进攻。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率领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各处险要关隘哨所，全力扼守。敌人用迫击炮轮番轰炸，但由于距离远、技术差，打了几天，

没有一发炮弹击中石洞和红军修筑的工事，红军战士无一人伤亡。随后，敌人几次试图强行登山，但在红军、游击队的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敌人五次大的进攻均告失败，仅 15 日这一天，就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战斗持续了 5 天，狡猾的敌人看强攻不行，便采用了偷袭的战术。10 月 18 日晚，敌特务团 100 多人组成突击队，携带丈余长耙钩，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乘夜色从后山岷岷旁边的一条石缝攀树上寨，然后分散开埋伏起来。19 日清晨，对面山上的敌人只打了三炮，就停止了炮击，当游击队员从战壕里爬出来进行反击时，才发现自己身后已经布满了敌人。这时，敌人全部散开队形，向红军防御工事发起了冲锋，将防御工事突破，哨楼被毁，红军战士王定潮等人阵亡，游击队被迫退守。孙友仁见偷袭得手，即命令炮击薛家寨两道寨门和岩洞，炸伤游击队数人，一个班的游击队员阵亡。敌人由寨门蜂拥而入，占领了薛家寨。在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紧急情况下，照金苏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定。一路由游击队总指挥吴岱峰、政委张秀山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另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向黑田峪方向撤退。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突围部队冲破堵截，边战边退，转移到照金西北部七界石一带。数位红军女游击队员突围时被敌人逼到石崖断壁上，宁死不屈，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国民党军队占领薛家寨后，纵兵抢掠，大肆烧杀，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纷纷反攻倒算，搜山烧山，到处搜集和屠杀革命群众。红军储备在薛家寨的一些粮食、棉花、布匹、迫击炮弹和 100 多挺机关枪零件等军械物资也被敌人抢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等先后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照金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丢失。但是，照金革命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久经考验的苏区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疯狂屠杀所吓倒，红军主力还在，游击队还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照金苏区的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留在当地的红军、

游击队伤病员。斗争形势由公开转向隐蔽，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积极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向盘踞照金的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 第八节习仲勋带病撤离照金

10月13日，当敌向薛家寨发起炮火攻击时，习仲勋审时度势，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过大，坚守薛家寨将面临很大的闲难和牺牲。他认为，欲其死硬坚守而不保，不如提前撤出，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他将这一想法和意见汇报特委后，特委同意他的建议，并立即作出决定：伤势还未痊愈的习仲勋先行撤离薛家寨，隐蔽养伤。

根据特委的决定，习仲勋带少数人员秘密离开寨子，隐蔽在照金地区一个偏僻的地方，边隐蔽，边养伤，边做群众工作，为后续人员撤退做好准备。苏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对共产党、红军和游击队很好。隐蔽期间，习仲勋受到一位老太太掩护和悉心照料。白天，习仲勋隐蔽在山上梢林里。到了晚上，老太太把习仲勋叫回家里，做小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送来点白糖，心诚手到，十分感人，习仲勋称老大娘为“干妈”。但是，隐蔽时间不长，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一次次搜林搜山，形势环境十分险恶，工作无法进行，随时都有被捕危险，习仲勋便化装成农村商贩模杨，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身背褡裢，内藏短枪和子弹，来到数十一里外的七界石，与撤退下来的张秀山、吴岱峰、刘约山率领的游击队相汇合。

不久，阻截游击队之敌何高侯部跟踪而来，习仲勋和张秀山他们率队撤退到甘肃正宁县三嘉原宿营。第二天，又与杨谋子土匪武装遭遇，将土匪击溃。这时，习仲勋突患伤寒，病情严重，难以继续行军，遂转移到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多月，病情还未痊愈，便随同南梁保安队队长郭锡山来到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住在一个叫李老五的人家。这一带仍然有敌人活动，不太十分安全，李老五白天把习仲勋送到山里，晚上接回来吃饭，直到1934年春节前后，他才病愈归队，回到红军“家中”，回到刘志丹身边。

## 第九章

# 包家寨会议与红四十二师成立

### 第一节包家寨会议

薛家寨失守陷落，照金苏区被敌占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不得不另行创建新的活动中心区域。

薛家寨失陷后，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军后方机关人员，分路突围北上，与红军主力汇合，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红军后方机关迁移到甘肃南梁地区平定川一带。

为发展和壮大红军，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红军必须首先创建新的活动中心，以保证党、政、军机关和红军、游击队有个“家”，有自己的后方基地。

刘志丹根据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客观实际，主动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人交换意见，提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刘志丹的建议，当即得到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特委的支持。为此，刘志丹事先还和高岗、张秀山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张秀山对刘志丹讲了“狡兔三窟”这个成语：“兔子为什么有三个窝？因为只有一个窝恐怕被人或者别的走兽捉住它，在一个窝里住的时间长了就容易被别人知道。所以红军只有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换着住，就能够存在下去。”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总结了照金苏区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会议统一了思想，及时作出了三项决议：

第一，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原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的，虽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断送，但她产生的革命影响却深得人心，震慑了敌人，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并为创建照金苏区和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立下功勋。继而，红四团成立，又为保卫照金苏区和工农民主政权发挥了主要作用，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红军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现在，扩大主力红军，创建新的苏区、新的活动中心区域，既是斗争的迫切需要，且时机已经成熟。

第二，开辟三路游击区，建立三路游击队。要扩大和巩固新苏区，必须大力发展游击区，只有各路游击队发展壮大，才能不断骚扰敌人，打击、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与会人员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开辟一、二、三路游击区，建立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决议。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和三路游击队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和策应，开展游击斗争。

第三，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大家认为，以南梁为中心，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早年谢子长、刘志丹在南梁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有斗争的基础，加之群众多是外地难民，深受封建压迫之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便于发动；二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而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会，连接陕、甘、宁三省区 18 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短杂，交通阻塞，便于红军活动。三是南梁是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虽有小股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但大多不敢与红军对垒，在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正确的选择。

包家寨会议，是继陈家坡会议之后，陕甘边区特委在与省委失去联系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是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时作出了转移战略重点的正确决定，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的发展已经走向成熟阶段，陕甘边武装斗争，根

据地创建，以及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走了正确轨道。

## 第二节红四十二师成立

包家寨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会议精神，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迅速率部进入合水县葫芦河川莲花寺，对部队进行了改编。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全师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队改编组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下辖3个连，一连连长赵国卿，指导员王伯栋；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红四团建制不变，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同时，师、团成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杨森任师党委书记，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34年1月，师长王泰吉前去豫西进行兵运工作，由刘志丹接任师长。

红四十二师成立以后，部队广泛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工作。通过教育，使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到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和加强纪律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而涌现出许多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积极分子。红四十二师的成立，大大鼓舞了陕甘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是红二十六军继续发展壮大的标志和新起点。

## 第三节三路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

包家寨联席会议决定第一路游击队是以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为基础逐步组建的。强世卿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安定(子长)县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一个多月以来，在红军

临时总指挥部领导下，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为保卫照金苏区经历了艰苦奋战，作出了牺牲和贡献，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支队已由原来 70 余人发展到 100 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补充和更新。同时师党委选派了一批包括政委魏武在内的军政骨干，加强了第一支队的领导力量，队员情绪高昂，士气旺盛。出发回安定时，杨森代表师党委讲话欢送，魏武代表游击队致谢。11 月 15 日，第一路游击队到达安定县境内。由于游击队总指挥部求战心切，对敌情估计不足，于 11 月 20 日仓促向枣树坪井岳秀部一个正规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未能攻克，游击队损失很大，惠泽仁等 5 位队员牺牲，总指挥强世卿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游击队由魏武率领向北转移，途中又遭文家铺敌人袭击，魏武不幸牺牲。为摆脱困境，游击队分两路北上至安定北区活动，但因损失过大，得不到及时补充，活动受阻，最后被迫分散活动。第一路游击队虽然未能实现预定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不少队员继续坚持战斗，为恢复陕北游击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路游击队是以庆阳、合水、保安三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起来的。杨琪为总指挥(后高岗、惠子俊任政委)，辖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县游击队。在红三团支持下，杨琪领导庆阳游击队先后收缴了东华池民团 20 支枪，动员 60 余名青壮年参加游击队，并以奔袭、偷袭等战术，接连消灭了太白镇、廉家砭、葫芦河 3 地民团，缴长短枪 80 余支，进一步壮大了自己，扩大了根据地。合水游击队先后消灭南梁民团 30 余人，活捉阎家洼子民团团总，缴枪 30 余支，使游击队迅速壮大起来。保安游击支队配合红四团骑兵连先后消灭刘家坪、阎家洼子等民团据点，大力配合主力红军创建南梁苏区。

第三路游击队是以照金原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几支游击队和一直坚持在原地的小股游击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动区域包括原照金苏区及其周边地区。1934 年 2 月正式成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任总指挥张明吾，出任不久遭叛徒暗杀，由王安民继

任。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英勇牺牲，总指挥由陈国栋担任。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先后担任政委。

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就立即挥师南下，为建立第三路游击队作准备。在照金周边支持配合各游击队，主动出击，寻机歼敌，扩大游击区。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宜君县杨家店子，该地守敌一个连企图乘清晨浓雾之机偷袭红军。四十二师当即查明敌情，迅速令红三团从正面进攻，红四团迂回敌后，围歼该敌。

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的指挥下，一举将敌击退。此后，敌占领制高点，妄图与红军对峙。红三团迅速调整部署，令一连从正面攻击，二连、少年先锋连左右迂回，经4小时激战，夺取制高点，敌大部被歼，余部在溃逃中被红四团截歼。此次战斗，共毙俘敌连长以下120余人，缴枪120余支(挺)，红军伤亡30余人。

1933年冬，第三路游击队帮助创建了中宜游击队，中宜游击队在中部、宜君、富县交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34年2月(一说1935年春)建立了中宜县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权。同时，第三路游击队在富县西北部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4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宣布设立富西县。

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决定南下，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扩建游击区。同时，护送王泰吉出边区去豫西。在此之前，王泰吉曾向师党委提出要离开部队去豫西搞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不要去。但王泰吉认为自己利用原有关系，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坚持要求。最后，师党委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一职。不久，王泰吉途经淳化县通润镇被旧部出卖被捕，后押往西安，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壮志未酬而就义。红四十二师护送王泰吉南下进入淳化，立即在原照金苏区及其周边的淳化、旬邑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整顿了各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击了当地反动民团武装，扩大了游击区。

1934年春节，红四十二师为解决部队给养，减轻根据地人民群

众的负担，南下进入耀县、同官，在原照金苏区及其周边地区打土豪，筹集部队经费。寺沟南堡位于耀县县城附近，该地地主豪绅居住集中，堡子有少数地方武装据守，并筑有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师党委决定偷袭夺占寺沟南堡，因攻击行动暴露，偷袭未克，撤出战斗。此后，四十二师进入耀县北塬，准备攻占生义堡。生义堡位于北塬沟畔的一个山嘴上，三面临沟，一面靠塬，地势险要，强攻不易，堡子内住着有地主豪绅。师党委决定智取，遂下令红三团抢占城门，得手后，夺占生义堡。此次部署周密细致，准备工作充分，仅半个小时便拿下生义堡，没收了豪绅财产，解决了部队的给养。

期间，黄龙山土匪杨谋子 60 余人，窜入耀县石底子。该股匪为匪多年，无恶不作，曾对照金苏区造成很大危害，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红四十二师决定歼灭杨匪，为民除害。指战员们一听说要收拾杨谋子，个个来了精神，一举获得成功，缴长短枪 50 余支，杨谋子等罪大恶极匪首被处决，余下经过教育，发给路费，遣返还乡。此匪霸一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之后，第三路游击队主动出击，先后消灭了柴场子、淳化桃渠原等地民团，拔除了民团据点，发展了自己。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中部县小石崖成立时，下辖正宁、宁县、耀县、中部、宜川、富甘、旬邑等县 10 多支游击队，500 余人。

#### 第四节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南梁地区，方圆百里，地处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位于甘肃庆阳、合水，陕西保安、甘泉 4 县交界处。南梁地区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密布，地形复杂，远离陕甘宁三省统治中心。红四十二师为迅速打开局面，为创建南梁苏区创造条件，自进入南梁地区之后，立即兵分两路，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出击，红四团向西发展。红三团东进咸榆公路两侧，连续拔除敌人据点，消灭了沿线地方反动武装。进入甘泉县道佐铺消灭当地民团一部，随后由洛河川向北前进，在葡萄沟门以少部兵力诱敌深入，伏击歼敌二五六旅一个营另配属的反动民

团 200 余人，红三团返回南梁。

红四团西进荔园堡、阎家洼子歼敌两个连。之后进入赵家沟门，肃清了该地民团，后又全歼新堡民团，然后挥师二将川，与红三团汇合，消灭了当地部分反动武装，拔掉了扼守据点之敌，为建立南梁苏区奠定了初步基础。红四十二师经过东西出击，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立。

为进一步发展群众，发展二路游击区，壮大二路游击队，红四十二师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到根据地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发展壮大游击队。同时，红四十二师在平定川、豹子川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储伤病员有了较为安全的治疗、休养环境。

在红四十二师的配合下，南梁地区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将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同时，新组建了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等 5 个赤卫大队，共计 100 余人。赤卫队配备梭镖、大刀、猎枪，装备少量步枪，从事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员，保护群众等任务。赤卫队的建立，使红军、游击队有了后备军，加之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南梁苏区得到了迅速扩大与发展。

红四十二师不断出击，开辟了二、三路游击区，并抽调部分干部，拨出部分武器弹药，装备了地方游击队，使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使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体系。截止 1934 年 2 月，陕甘边红色区域已扩大到保安、安塞、甘泉、鄜县(今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铜川、宜君、黄陵等 14 个县的部分地区，此时，以南梁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纵横三四百里。

为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基地，

开展游击战争，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于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苏区小河沟四合台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人民的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雷生秀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教等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推动了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1934年春，红四十二师派惠子俊、强家珍、马仰两等一批斗争骨干，前往庆阳以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南梁根据地西北苏区。

同年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之后，陕甘边地区的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今富县)、甘泉、旬邑、淳化、中部、耀县、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南梁苏区的创建，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在与中共陕西省委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独立坚持正确政治军事路线的胜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以后以南梁为中心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成熟与巩固的显著标志。

## 第五节 照金苏区的恢复和陕甘边区南区的形成

### 一、照金苏区的恢复和陕甘边区南区的形成

自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作出成立红四十二师、创建南梁苏区、

建立三路游击区战略决策以来，经 7 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三项战略决策已经基本实现，或正在实现之中。1934 年 7 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回顾了陕甘边区根据地斗争情况，提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以华池(即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创造中心苏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扩建红军任务。

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红四十二师帮助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包家寨会议战略决策，在照金苏区及其周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斗争，多次粉碎了敌人对照金苏区及其周边地的“围剿”和“清剿”。在反“围剿”斗争中，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建立了几个县的革命政权，1934 年初，采用里应外合的战术，攻克了叛徒陈克敏盘踞的龙家寨。在此期间，红四十二师为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多次转战照金周边地区和第三路游击队并肩作战。

3 月初，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迅速进入照金地区，然后挥师同官、宜君，连续消灭了瑶曲、大石板、五里镇民团 100 余人。然后转向西北、涉过沮水，进抵店头，歼民团一部。经槐树庄、张村驿、黑水寺返回南梁。4 月 23 日，红四十二师又攻打同官县黄堡镇和梁家塬村，击毙敌营长范子畴，活捉区长梁子峰，打开地方粮仓，分救济粮给贫苦农民和灾民。4 月 26 日，又将旬邑县保安团百余人，围困在淳化县甘咀村沟边一个打麦场内，经激烈战斗，击毙敌连长，歼敌数十人。夏末，又在宜君偏桥伏击去肤施(延安)上任的国民党县长及其随从。在红四十二师的支持帮助下，第三路游击队自身的力量得到更大加强和发展。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的游击队已由最初的四五个发展十四五个游击支队，还有回民支队。总数已经超过 500 人。这年 4 月，建立富(郝)西、富(郝)甘、中宜 3 个县级革命委员会政权之后，陕甘边特委派金理科、杜宛、李尚勤、黄子文等分别到淳化、耀县、旬邑、宜君、中部等地宣传和组织群众，组建恢复农民协会、赤卫军、青年和妇女组织，团结、教育和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这些红色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持游击队，传递情报，打击民团。同时，照金苏区及其周边的耀县、淳化、旬邑、同官、宜君、富县、甘泉、正宁、中宁地区十几支游击队活动相当活跃，区、村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早在1934年春，陕甘边特委为了加强对淳化、耀县、旬邑交界地区的领导，派郭洪超等人率队建立了中共赤淳工委和赤淳县苏维埃政府。辖区分为东区和西反。东区包括淳化县的铁王、秦河、安子娃、南村、方里和耀县的照金、柳林、庙湾、香山等地。5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宜君县小石崖设立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代行政府职能，黄子文任办事处主任。7月，陕甘边区特委作出决议，建议“四十二师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照金苏区”，特委责成第三路游击队“于十月革命节前恢复革命委员会”。9月，陕甘边特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辖区基本上是原属照金苏区或照金苏区周边的耀县、旬邑、淳化、正宁、中部、宁县、富县、同官、宜君等县部分地区。至此，陕甘边区南区基本形成。

## 二、陕甘边区南区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为加强对第三路游击区的领导，全面恢复、发展和巩固照金苏区，创建新苏区，中共陕甘边特委于1934年9月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张邦英任书记，区委机关驻中部县小石崖，下辖中共耀县县委、赤淳工委、淳耀县委、新正县委、赤水县、新正县、永红县及富甘、富西、中宜等县党组织。1935年八九月，富西、富甘、中宜等县党组织划归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直接领导。陕甘边区南区党委下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永红等5个县委。

南区党委成立的同时，将第三路游击区办事处改为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黄子文任主席，先后下辖富西、富甘、赤淳、中宜、淳耀、赤水、新正、新宁、永红等县级政权组织。1935年8月，富西、富甘、中宜县革命委员会划归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直接领导。10 月，陕甘边区南区召开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秦善秀、张邦英当选为正副主席。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下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永红等县苏维埃政府。

1934 年 11 月，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改为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对外仍称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下辖中宜游击队、中宜独立营，淳耀第六支队，赤水第十二支队，正宁回民支队、正宁第五支队、第八支队，新正特务队，新正独立二营，宁县第一支队、第三支队等。

陕甘边区南区党政武装组织建立后，其机关由中部小石崖先后迁移到高窑子、正宁县三嘉原南邑村。

陕甘边区南区党政军武装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包括照金苏区在内而比照金苏区更大区域和范围，横跨陕甘两省边县地区，面积达 7000 多平方公里。

1935 年 12 月，陕甘边南区党、政、军组织撤销，陕甘边区南区改为关中特区。

### 三、陕甘边区南区所辖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在陕甘边区南区党政武装组织建立前后，南区所辖县党政武装组织也分别建立起来。这些县包括淳耀县、赤水县，永红县、新正县、新宁县等 5 县。在这 5 县中，淳耀县和新正两县党政武装组织建立较早，都是在 1935 年 8 月。淳耀县和赤水县党政武装组织是由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派张邦英、黄子文前去帮助建立的。

**淳耀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淳耀县是照金苏区的中心地区。这年 8 月，张邦英和黄子文在淳化县桃渠原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在原中共赤淳工委所辖东区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淳耀县委员会，郭存信任书记，隶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领导，下辖桃渠原区(一区)和小池区(二区)2 个区委计 8 个支部。1936 年 1 月，中共淳耀县委改属中共关

中特委领导。到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淳耀县委下辖 5 个区委计 31 个支部，有党员 720 名。

1935 年 10 月，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南区苏维埃政府在桃渠原召开淳化、耀县交界地区(原赤淳县东区)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姚殿森任主席，隶属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桃渠原、小池两个区公署计 11 个乡苏维埃政府。1936 年 1 月，淳耀县苏维埃政府改属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到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淳耀县苏维埃政府下辖 5 个区 31 个乡的区、乡苏维埃政府。

淳耀县武装组织主要有淳耀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和淳耀县保安大队、淳耀县警卫队等。这些武装力量在中共淳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上级军事组织领导下，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其间，一些武装被编入其他武装组织序列。

赤水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 年 11 月，张邦英、黄子文在旬邑县烽火台召开党员及工农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赤水县委员会(以原中共赤淳工委所辖西区党组织为基础)和赤水县苏维埃政府，周志宏、王振喜分别任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1936 年 1 月，中共赤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改属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到土地革命战争末期，中共赤水县委下辖 5 个区委计 22 个支部；赤水县苏维埃政府下辖 5 个区 22 个乡的区、乡苏维埃政府。

赤水县先后建立有 5 支武装组织，即：赤水第十二支队，1933 年 9 月建立，初有 30 多人枪，1936 年 5 月部分游击队员被编入关中红三团，1937 年 3 月编入县保安大队；赤水第十三支队，1935 年冬成立，有 50 多人枪，后被编入赤水县保安大队；赤水县保安大队，1937 年 3 月由第十二支队部分队员和第十三支队组成；赤水独立三营，1935 年 11 月组建，1936 年 5 月编入关中红三团；赤水县警卫队，1937 年 3 月组建。这些武装组织隶属中共赤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上级军事组织双重领导。

**永红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 年 10 月，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为扩大苏区，决定在旬邑县底庙区的基础上建立永红县，并授权中共底庙区委书记赵宏钧负责筹建永红县党政组织。10 月 16 日，赵宏钧在正宁县永和镇南坡头召开党员和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永红县委员会、永红县苏维埃政府，赵宏钧、梁文汉分别任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郭村、麻院、店子河 3 个党支部和 3 个乡苏维埃政府。1936 年 1 月，中共永红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改属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 5 个支部和 5 个乡苏维埃政府，有党员 90 多名。1937 年 4 月，随着永红县制撤销，中共永红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终止。

永红县武装组织有永红县保卫队。该队成立于 1935 年 10 月，初有 20 多名队员，隶属中共永红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上级军事组织双重领导。1936 年秋，永红县保卫队曾配合兄弟部队攻克国民党军固守的底庙城，并多次配合兄弟部队和正规部队作战，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1937 年 4 月，永红县保卫队随永红县制同时撤销。

**新正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 年 8 月，中共新正县委员会在旬邑县湫坡头峁子村成立，卢永财任县委书记，隶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领导，下辖甘肃正宁和陕西旬邑、邻县交界地区的 6 个区委计 36 个支部，有党员 160 多人。1936 年 1 月，中共新正县委改属中共关中特委领导。

1935 年 8 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隶属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领导。1936 年 1 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改为新正县苏维埃政府，左怀玉任主席，改属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 6 个区苏维埃政府。

新正县武装组织主要有新正第五支队、第八支队、新正县特务队、新正县武工队和新正独立二营等。其中，新正县武工队是在新正县特

务队的基础上建立的；新正独立二营于 1935 年冬以新正第五、第八支队为主组建，下辖两个连，有 250 多人，1936 年 7 月被编入关中特区司令部直属部队。新正县的武装力量隶属中共新正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特区司令部领导，主要活动于新正、新宁两县。

**新宁县党政武装组织的建立** 1935 年 11 月，中共新宁县委员会、县苏维埃政府于宁县九岷杨园子成立，焦怀兴任县委书记，张有鹏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属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1936 年 1 月改属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分别下辖九岷、金村、湘乐、平子 4 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

新宁县武装组织主要有：新宁第十八支队，1935 年 12 月由金村赤卫军改编；新宁第十九支队，1935 年 12 月建立，1936 年 1 月被编入新宁独立营(亦称关中独立一营)；新宁第二十支队，1935 年 12 月组建，1937 年 3 月被编入重建的新宁独立营；新宁第二十一支队，1935 年 12 月建立，1936 年 2 月并入第十八支队；新宁独立营，1936 年 1 月建立，5 月并入他部。1937 年 3 月重建，下辖 3 个连，共 200 多人。新宁县武装组织隶属中共新宁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特区司令部领导。新宁县的这些武装组织单独或相互配合作战，寻机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努力扩大、恢复和巩固关中苏区。

## 第六节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的建立及其活动

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党政武装组织建立之后，根据陕甘边军事

委员会和红四十二师党委指示精神，1934 年 12 月前后，从平子游击队抽调 100 多人，编为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三连，一些游击队和部分起义民团编为红三团第四连，使红三团壮大成为一支拥有 4 个连队建制的主力部队。随后，又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即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特务队和平子游击队为骨干，从正宁五支队、宁县三支队抽调部分人员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游击队为组建红军主力提供了充足的兵员。

陕甘边区南区党政武装组建起来之后，正是国民党军队一年前在南方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逼上长征路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在南方得逞之后，又开始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实施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从1934年10月起，先后纠集了陕、甘、宁、晋4省7个师、五六万人马军阀部队和部分地方保安团、民团，开始分区域进击，并与1935年4月部署完毕。敌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正宁、宁县地区，楔入陕甘地区革命根据地南梁与照金之间，伺机北进南梁，南击照金。

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往西北巡视工作的黄翰建议，1935年1月，陕甘边区特委派军委主席刘志丹、新任特委书记惠子俊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这时，陕北特委将陕北红军一、二、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

1935年2月5日，刘志丹在赤源县周家硷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制定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计划，其部署是：红军主力重点打击陕北之敌八十四师，红一团在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配合下，在关中的照金苏区、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正宁、宁县内开展游击战，牵制敌六十一师，打击保安团和民团。

1935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敌联保主任焦世凤、郭日午带队到南区照金镇西邻的赤水县马家山。淳耀县游击队六支队得到情报，配合红一团全歼该敌，当场击毙焦世凤、郭日午，当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编了几句顺口溜，称赞红一团和游带队：“三月二十五，黄风刮起土。红军六支队，消灭郭日午。”6月，新正七支队袭击底庙镇的保安团，游击队利用抓获的俘虏智开城门，冲入城内，全歼守敌36人。7月，敌六十一师一个营在湫头镇和化装过的七支队游击

队员集合一起，聚会训话。游击队员趁该营官兵疏于防备，突然举枪，向敌开火，死伤多人。敌四散逃窜，被俘 40 余人，缴获机枪、步枪 40 余支。同月，慑于红一团和游击队的打击，敌耀县民团和驻湫头六十一师侦察排各数十人，经游击队策反，举行起义，加入红一团和游击队。9 月，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指挥部第十支队和第十六支队在红一团配合下，联合攻打淳化县潘家城民团，全歼守敌，缴枪 30 余支。

红一团和游击队相互配合，四处出击，寻机歼敌，牵制了大量敌人，使其不敢贸然北上陕北，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陕北作战。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指战员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浴血奋战，在以刘志丹为主要领导人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指挥下，7 月间，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 6 座县城，使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党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北起神府，南达淳(化)耀(县)，西入陇东董子原腹地，东临黄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9 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9 月 18 日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并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了西北军委。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急调 10 个师，并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副之，向包括陕甘边、陕北苏区在内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按照上级指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主要任务是配合红一团和骑兵团在成榆大道两侧东击晋军，同时打击南线东北军。1935 年 12 月，红一团和南区独立营、淳耀九支队协同作战，在照金苏区的南端小丘伏击敌两个连，歼敌五六十人。同月，赤水和淳耀的第六、八、十二、十三支队共 300 余人，出泾阳县东西山庄，与敌保安团 800 余人遭遇。游击队灵活机动，先敌开火，将敌冲散，追击 15 公里，俘敌 8 人，

缴获长短枪 20 余支。12 月 13 日，淳耀县六支队和新正县七支队联合攻克旬邑县马栏镇，歼敌 10 余人，缴获步枪 10 余支。

11 月，红一团向在新正县永和镇、彬县北极地区的沟老头村、永乐镇一带连续出击，打击多股民团和保安团中队，歼敌数百，缴获枪枝数百支，子弹上万发。

红一团和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率队牵制敌人，打击保安团、民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策应了西北主力红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取得了慕家塬战斗和劳山战役的胜利以及直罗镇大捷，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陕北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红一团自组建以来，配合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参加了湫头、高窑、七界石、麻子掌、王寨子、七里铺、赵村、直罗镇、王郎坡等战斗，为照金苏区恢复和陕甘边区南区扩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 第十章 关中特区的形成与斗争

## 第一节 关中特区的形成

关中特区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初就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时称中共西北中央局)及时纠正陕北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批被关押的领导干部，挽救了西北的党、红军和苏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领导错误肃反的陕甘晋省委，重新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和党的组织机构。以甘泉洛河川下寺湾为界，把下寺湾以南西北苏区区域划为陕甘省；把下寺湾以北西北苏区区域划为陕西省。在新成立的陕甘省设立关中特区，在新成立的陕西省设立神府特区和三边特区。“三边”即陕西省北部的定边、安边和靖边三县。三边特区与甘肃、宁县、绥远三省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共中央重新划分两个省、3个特区区划，并设立新的领导机构，主要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领导，在地广人稀、民贫、兵员缺乏的西北苏区实行“发展中巩固”的战略方针，不断扩大苏区范围，解决红军兵员和红军军需供给问题，后来的红军东征便是其目的之一。

关中特区是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南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陕甘边区南区是在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扩大和发展南梁苏区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中特区基本包括陕甘边区南区时的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和永红五个县制。关中特区，并非是指西起宝鸡，东至潼关渭河两岸八百里秦川或关中平原，而是指关中平原以北的台塬丘陵与陕北高原过渡地带，包括今陕西咸阳、铜川、延安和甘肃东部几个县市区部分区域，通常人称“小关中”。关中特区，以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区域范围和经济发展状况等优势，具有双重战略意义。一是可以为红军提供更大更多的兵员和军需物资；二是为保卫中共中央、保卫中国革命大本营。把守好西北苏区的南大门。

## 第二节 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的成立与撤销

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都是在前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南区党政军组织基础上成立起来的。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使全党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派贾拓夫等从瓦窑堡来到陕甘边区南区区委所在地的新正县南邑村，在南区区委的基础上，经过改组调整，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贾拓夫任书记。贾拓夫上任前，陕甘边南区区委也曾称关中特委。不过，这个关中特委是为错误肃反而设立。取代张邦英南区区党委书记职务的鲁学曾(鲁贲)，主持南区错误肃反，肃杀之气甚嚣，错杀了包括原陕甘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南区区委组织部长杜宛等五六个重要干部，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南区区委工作受到很大影响，而这个关中特委实际上只存在了半个月时间左右。

和贾拓夫一起上任的还有特委组织部长唐洪澄，宣传部长张德生。军事部长兼关中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副司令员陈国栋。红军出发东征前，中央派习仲勋、张仲良前来关中特委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副主席约习仲勋和张仲良谈了话。周副主席向习、张二八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苏区面临的敌情和任务，特别是向二人目虽调关中特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同时交代了目前对敌斗争主垂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巩固陕甘苏区，配合中央红军东征，以实现党和红军在陕北、在西北地区的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

临行前习仲勋还和即将率队出发东征的刘志丹话别。刘志丹以同志加兄长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工作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

习仲勋这次赴任关中特区，其职务安排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是秦善秀。张仲良为关中特区独立三营政委。曾经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这次仅安排为关中特区苏维埃副主席，显然是职务以高就低。不过，遭受陕北错误肃反迫害的领导干部，被释放重新安排工作时，其职务基本上都是就低不就高，降职使用。

习仲勋到任后，在贾拓夫领导下，同特委成员一起传达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同时，纠正执行土地政策上的偏差。此前，在党内“左”倾错误影响下，错误肃反弄得关中苏区党和人民群众人心恐慌，赤白对立；在土地分配上，一些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没收了一些商人财物。关中特委对新正、赤水、淳耀、新宁几县部分地区土地调整工作刚刚开始。3月，国民党东北军乘中央红军东征之机，以11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特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仅一个月之内，关中5县几乎全被国民党军占领，仅有新宁县一个乡的平道川幸免。县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县党政武装组织成员分散隐蔽，无法开展工作。加之贾拓夫、江华、陈国栋、张仲良等党政军领导干部率关中红军主力红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委、关中苏维埃政府和关中司令部随之撤销。关中武装力量削弱，国民党在苏区内清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一些革命不坚定分子，一些人和少数游击队投敌叛变。关中革命处在十分困难时期。面对暂时失败与困难，如何善于退却，巧妙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是关中党政军组织面临的首要任务。这时，汪锋刚来关中特区不几天。他是去年12月初以毛泽东密使身份去西安与杨虎城谈判红军与十七路军合作抗日重大机密返回瓦窑堡。3月上旬由中共中央派来关中特区，担任特委白区工作部部长。汪锋到任不几天，白区工作部还未组建起来，纠偏工作正在进行期间，国民党东北军就入侵关中特区。

贾拓夫离开之前，关中特委决定由习仲勋、汪锋和组织部长张凤岐留在关中，成立中共关中工委，习仲勋任书记，继续原地坚持游击斗争，在军事上将关中特区划分为南北两个作战区域。5月，习仲勋也调任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工作，随军而征。汪锋和张凤岐来到淳耀县西边的赤水县花家洞建立了关中临时特委，恢复了关中特区司令部，汪锋任临时特委书记，关中司令部司令，副司令黄罗斌。这时，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县变为游击区，各县委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转入地下，但游击队武装仍然保存下来，进行斗争。

随着斗争形势越来越尖锐复杂，竟有个别游击队哗变，少数游击队员叛变投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被敌杀害。

关中临时特委处境十分困难，中央决定临时特委和游击队武装尽快撤离，可是汪锋他们被敌隔断，与中央失去联系，未能接到撤离通知。他们仍然率领赤水县、淳耀县未撤离的游击队员坚持敌后斗争，活动于沟壑台塬与密林之中。期间，促成国民党淳化县桃渠河联保主任、共产党员王克仁率桃渠河联保自卫队起义，临时特委将起义自卫队人员编为淳耀县第八游击支队，王克仁任支队长，投入反“清剿”斗争。

临时特委所活动的区域淳耀县、赤水县群众基础好，内部团结、士气不衰，一直坚持到8月下旬，汪锋才沿着子午岭、桥山山脉，出没于梢林沟壑，利用青纱帐掩护，跋涉三四百公里，于8月底或9月初返回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县城。临走前，他安排张凤岐在淳耀县桃渠河一带隐蔽留守下来，负责临时特委的工作。

### 第三节 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恢复与活动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派习仲勋、郭炳坤、张策等回关中工作，恢复中共关中特委。

习仲勋参加红军西征，先后担任陇东曲子、环县县委书记两个多

月时间，8月底或9月初返回保安。习仲勋返回关中之前，和汪锋一起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年谱》中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于9月15至17日在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县城炮楼山下石窑洞中举行，会期3天。会议召开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同时在冀东、华北等地扶持汉奸傀儡政权，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先后发生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国民党当局几乎无路可退，开始考虑大幅度地调整对日不抵抗政策，恢复与共产党的接触与谈判(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已在保安，随时准备出发南京)。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调整，中共中央也适时作出决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政策也相应地作了调整，由“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的方向上来。这次会议的主题主要是研究讨论和确定目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洛甫)作《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主题报告和会议结论。报告在分析了目前形势之后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配合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所主张的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应反对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方面上。对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应该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进攻。”“各党各派联合主要是国共配合。”“我们应赞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应宣布苏维埃成为他组成的一部分。”然而“要看到民主共和国只能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3天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着重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有关联蒋抗日的发言。

这次会议所讨论确定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与之前瓦窑堡会议确定党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是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前进的。

会议结束之后的9月下旬，张闻天在自己所住小窑洞与习仲勋进行了一次谈话，张闻天当面宣布调习仲勋回关中特区，重新担任党的特委书记，恢复特委机构和工作。张闻天还客气地叮咛习仲勋：“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与其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临行前，周恩来交代习仲勋一行：你们要路经的地区，敌人正在扫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要多加小心。

9月底前，习仲勋和郭炳坤、张策、陈学鼎、黄罗斌及牛汉三、贺建立、于建军、赵子修、贾生才等一行10余人一同出发，一路行军，夜行昼宿走山路、钻梢林、过关卡，途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敌人。有时一行人被敌人阻断，不得不彼此分散行动，隔日在约定地点会合。有时宿营山村造饭休息，突然有敌人前来，不得不丢下饭碗，钻入梢林躲避。

10月初，习仲勋一行到达关中特区赤水县的七界石，习仲勋与留守的前关中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张凤岐取得联系，并在赤水县的桐树庄石门关召开会议，交换情况。七界石和石门关，都属于照金苏区西部重镇，习仲勋再一次回到照金。张凤岐向习仲勋汇报了关中临时特委近半年的工作情况，张凤岐说：“由于东北军进攻边区，这里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形势紧张，生活艰苦，行走危险，但基层组织和游击队还是隐蔽坚持了下来。一些被破坏的基层组织，正在恢复。”习仲勋对张凤岐负责临时特委这段工作十分满意，同时介绍了红军西征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一起研究了重新恢复关中特区及其党政军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具体分工。新的中共关中特委由习仲勋、张凤岐、张策、郭炳坤、王仲华5人组成。书记习仲勋、秘书王仲华、组织部长张凤岐、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张策，郭炳坤负责军事，妇女部部长白国英、副部长郝明珠。陈学鼎因身体多病，随习仲勋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强调说：无论组织、宣传、统战工作都要围绕战争讲行。当时，关中特委工作分南线和北线，特委派张策到南线，张凤岐去北线。

重新恢复的中共关中特委隶属中共陕北特委。12月，陕甘省恢

复，关中特委重新划归隶属陕甘省委。

关中特委恢复之际，国民党东北军和陕西地方当局对关中苏区的进攻策略也有所变化，军事进剿和缓下来，但经济控制仍然很严，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以及游击队武装的破坏瓦解，仍然没有停止下来，民团保安团和土匪武装仍然在捣乱扰民。10月中旬，习仲勋在七界石主持召开有30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特委活动分子会议，研究讨论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战争问题，会议确定了四个方面的议题，并最终形成决议：

一、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

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等；

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游击区。

经过4个月左右的艰苦努力，关中特区对敌斗争有了很大的改观。首先是对民团、保甲的统战工作即有相当大的开展；其次是在军事斗争上有了新正县前马塬、淳耀县让牛村、赤水郭家掌等地战斗的胜利；三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区、村苏维埃政权有了相当大的恢复；四是泾河三区、淳耀小丘、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特区的大股土匪武装。

在军事打击和统战工作的双重作用下，敌人不得不采取死守据点，不敢出动骚扰害民了。于是，特委领导游击队、赤卫队和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对敌人据点士兵开展政治瓦解工作，扩大各县的游击队武装。

关中特委恢复的同时，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也重新恢复，关中特区所辖各县党政军组织也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可是处在照

金大山深处、距离西安仅 150 多公里路程的关中特委，10 多天后才始知这一重大消息。可喜的是，西安事变之前，关中苏区全部恢复，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武装普遍建立起来。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淳耀县的桃渠河，正副主席暂缺。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金道松。

1937 年 4 月，随着陕甘省委再次撤销，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霍维德、封正宝分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张仲良、习仲勋仍任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政委。9 月，关中特委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中特区司令部隶属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10 月，关中特区党政军组织分别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委、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关中特区下辖各县党政军组织改为关中分区下辖各县党政军组织。

关中特区直到关中分区下辖各县党政军组织基本保持了陕甘边区南区恢复后的各县党政军组织状况，变化不是很大。而变化较大的有两个：一是永红县，因区域小，关中特委于 1937 年 4 月间撤销永红县制，其所辖区域划归关中特区新正县六区。中共永红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终止，永红县武装组织保卫队同时撤销。二是 1937 年 1 月，经国共双方谈判，划定了陕甘宁边区与友区的界限，淳化县城和旬邑县城被划定为红军募补区。4 月，中共关中特委即在淳化县城和旬邑县城分别设立红军募补处，王伯栋为淳化县红军募补处负责人(7 月田润芝任主任)，薛何防(薛何爽、董丰)任旬邑县红军募补处(亦称三五八旅募补处)主任，分别隶属中共关中特委领导。淳化县红军募补处对内做党的工作，下辖 3 个党支部，主要活动于淳化县城和方里、润镇一带；旬邑县红军募补处对内代行中共旬邑县委职能，下辖两个区委 9 个支部，主要活动于旬邑县城及张洪、土桥地区。8 月，淳化县、旬邑县红军募补处分别改为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和旬邑县八路军办事处。

#### 第四节除掉雷天一、陈克敏

耀县反动民团首领雷天一是王泰吉率骑兵团耀县起义的主要破坏者之一。他首先反叛离去，致使抗日义勇军军心涣散，全军瓦解。义勇军战事失利，他却捞到大批武器弹药，与照金苏区武装对立，长期危害耀县一方。所以，习仲勋返回关中，在第一次主持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点名雷天一是必须打击的最反动的少数分子之一。陈克敏投机钻营，反复无常，参加革命，却叛逃而去。他带土匪武装袭击保卫队，致使习仲勋重伤；他两次给敌人带路袭击薛家寨，以至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被敌占领。他是杀害李妙斋等照金苏区一些重要领导人、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群众的主要凶手之一。可是雷天一、陈克敏却万万没有料想到，西安事变后，他俩却在同一天，栽倒在汪锋和许权中手里。

习仲勋和汪锋在保安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差不多在9月底之前，分别先后南下关中。习仲勋一行跋山涉水钻梢林，艰辛备尝，险恶相随；汪锋却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五、吴自力、潘汉年、电讯人员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以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往陕北谈判代表团回京复命的身份和名义，通过张学良，由东北军洛川驻军刘务荃师长安排汽车一路直送西安。这8人分别去三个方向，潘汉年去南京、上海与国民党谈判，叶剑英和其他几位都是去东北军搞统战工作的。汪锋则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中央军委人员身份，负责杨虎城十七路军特别是阎揆要特务二团党的工作，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恢复曾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一些党员组织关系，为许权中办理接转党的组织关系等。

汪锋在西安期间，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身份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就派汪锋前去驻渭南前线的特务二团向团长阎揆要(党员)传达党内指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杨虎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成立了个独立旅，编制两个团，一个独立营，隶属十七路军序列，2000余人，驻防蓝田县城。共产党员许权中任旅长，共产党员任耕三任副旅长，共产党员方仲如任政治处长。独立旅一团由

特务二团改编而成，团长是共产党员阎揆要；二团由特务一团改编而成，团长韩子芳。独立营由十七路军宋文梅特务营第四连扩编而成，共产党员李锦锋、王汝昭任正副营长。旅部和两个团、独立营有一批共产党员。一团还有中共团党委，独立营有党支部。周恩来副主席安排汪锋去独立旅负责全旅的党的工作，并经杨虎城任命，以独立旅少校参谋公开身份做掩护，开展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杨虎城部驻防渭河以北，独立旅驻防耀县县城。独立旅移防前夕，汪锋在西安向周副主席汇报给驻商洛的红七十四师安全送完冬装的问题，同时向周恩来请示说：“据我们掌握，从延安到西安再到蓝田，路途有两个卡子，一个是耀县，由雷天一民团把守；另一个是蓝田油房街，由秦颂臣民团把守。雷、秦二人均为顽固反共分子，对我们的来往人员十分不利，为了疏通这条交通线，我建议必须立即将这两个家伙搞掉。”周恩来一听疑问道：“他们都是杨虎城将军管辖的民团，搞掉好不好？”汪锋说：“如果现在不把他们搞掉，以后就不好办了。雷、秦并不都忠于杨将军。”周恩来听了汪锋的解释，叮咛说：“要以不影响大局为原则。秦颂臣目前影还不很大，可以暂时放一放，就别动他了，先解决雷天一。”

汪锋向周恩来告辞后，赶往灞桥，独立旅刚刚过了灞河，向耀县移动。汪锋赶上部队，过了渭河。途经高陵县后，汪锋和许权中、阎揆要、方仲如等商量好除掉雷天一的行动方案。

2月9日下午，独立旅全部进驻耀县县城，旅部驻西街小学。阎揆要团负责旅部安全和对雷天一民团的警戒；韩子芳团负责解除民团武装，查抄雷天一的住处；独立营负责警戒县城西街以北的半个县城，以防雷天一民团破坏。为此，许权中和汪锋吩咐方仲如到独立营营部，召集营长李锦锋、副营长王汝昭、一连连长李醒吾、副连长吴凤德作了精心布置。李锦锋营长说：“耀县不光有雷天一，还有个陈连升，是雷天一的分队长，在红军游击队于过，叛变后投降了雷天一。干了许多坏事，我们要一起收拾他。”这陈连升即陈克敏。方仲儒听后，

向汪锋和许权中作了汇报。汪、许同意。汪锋还说，我在照金时，就知道陈是个坏家伙。

独立旅参谋长韩忠麟与雷天一有过一段同学之谊，许权忠派韩忠麟以新到驻军旅长会见耀县当地军政官员，并举行春节联欢、宴请名义，邀请雷天一“入瓮”。2月10日上午，韩忠麟前往城内城隍庙雷天一住处“请”雷，说明来意，雷很高兴，寒暄一阵，便带了几个马弁随韩来到旅部。雷一行一进小学大门，马弁即被安排在另一处“休息”。雷由韩带往所谓的许旅长房间。雷走进房间四下一瞅，空无一人，只觉蹊跷不妙，即欲转身离去。就在这一瞬间，早已埋伏在房门后的枪手举枪射击，一声枪响，雷天一负伤跌倒，又爬起来欲跑，又是几枪，雷天一终于命归西天。早上10点左右，雷天一的尸体已经停放在林德巷一座小庙内。这一天，正好是1937年农历大年除夕。

就在雷天一毙命的同时，韩子芳团解除了雷天一民团武装。抄了雷天一家。也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李锦锋带独立营迅速赶到北大街西庵陈克敏住处。一进门，陈克敏发现来者不善，忙从枕下摸枪，前边的几个战士箭步跃上炕，用膝盖顶住陈的身子，枪口对准陈的头，厉声道：“不许动！”后边的战士们疾手取走陈枕下手枪。陈一看大势已去，孤身难支，反抗无用，乖乖让老婆打开柜子，交出8支长枪。从此，陈克敏走完了他罪恶的人生之路。

雷天一是耀县小王嘴人，生长在地主家庭，上过中学，毕业后闯荡江湖，奔走权贵，为人奸滑，善于投机钻营。1929年曾在耀县国民党党部任职，参加过陕西讨逆军甄寿珊部，任毕梅轩团

三营营长。1931年夏，甄寿珊部被杨虎城收编，改编为陕西省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在此期间，在第三营开展兵运工作的耀县籍共产党员张邦英向雷天一做工作，打算促其打起红旗走革命道路，雷却以“现在力量很小，为时太早，先借别人的窝，长自己的羽毛，等羽毛丰满时再说”婉言拒绝。但是，雷在表面上仍然装出同情革命的样子。他明知张邦英是共产党人，既不声张，也不追究加害。后来，张

邦英另有任务离开雷天一营，雷也未加挽留和纠缠。

1932 年秋末，马青苑部起内讧，雷天一失势，带七八个人枪和家眷潜回耀县家中，又被杨虎城驻军缴械，押往西安。时隔不久，雷天一又回耀县，当上了民团团长。1933 年 7 月 21 日，王泰吉率驻耀县骑兵团起义时，收缴了县城内保安团、民团武器，所部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雷天一借口时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的张邦英在其部做过兵运工作，张邦英向自己讲过打起红旗参加革命一事，只是那时羽毛未丰，现在想续前缘，参加民众抗日义勇军。雷天一还主动与张仲良、陈学鼎接近。雷天一终于骗取了王泰吉的信任，当上了民众抗日义勇军一个大队的大队长。然而，雷天一却临阵反叛，向陕西省当局告密，参加镇压义勇军的勾当。

除掉雷天一后，从查抄他的来往书信中发现，雷与西安事变中叛杨投蒋的冯钦哉过从甚密，有电报书信来往。西安事变爆玲后，雷对事变不满，对张杨的八项主张不屑一顾。耀县旅省同学回县组织各界救国会他不予理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雷天一暗通关节，攀冯(钦哉)拥蒋，冯钦哉以旅长之职作诱饵，令其扩充实力，率部“投顺中央”。诡计多端的雷天一，却万万没料想到，一心攀龙附凤，当个“大旅长”的美梦，竟被汪锋、许权中等共产党人刹那间彻底打破了，还搭上了个性命。除掉雷天一以后，独立旅又消灭了夏老么民团大部。咸榆大道上的这个“卡子”终于消除了。

## 第五节与友区划界谈判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两位将军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发动一场壮举，其历史意义在于逼迫蒋介石结束了十年内战；国共双方达成第二次合作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全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潮。张学良、杨虎城是民族英雄，共产党的朋友；东北军、西北军首先成为红军的友军。东北军、西北军驻地，也成为红军的友区。

自国共两党达成并发表合作抗日宣言之日起，共产党与国民党，红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也成为友党友军，双方占领区也互称为友区。可是，对于友党、友军、友区这些新名词、新概念，党内军内一些人不是一时一刻能从长期敌对的观念上转变过来的，从思想上对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意义的认识上还比较浅薄和模糊，有局限性，在实际行动上就会漫不经心、犹豫不决或执行不力。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关中特委也曾经历了这样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直到自觉坚决贯彻执行的过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电邀，从陕北、陇东南下，集结于陕西关中渭河以北的三原、泾阳、富平、耀县、彬县一带，红十五军团和红七十四师先后集结于咸阳、蓝田、商洛一带，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共同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对西安的进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6日，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全部撤离到渭河以北，中央军进驻西安以及西安以西地区。这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国民党中央军之间，必然在驻地和区域上相互为邻，如何处理好与友军、友区之间的关系，必须阐明区域界限，避免纷争。

2月9日，中共陕甘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了《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的根据。这个决定有如下内容：除关中各县由炎中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

为此，彭德怀司令员在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专门约见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和特委宣传、统战部部长张策，彭德怀提醒关中特委和游击队武装，要特别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服从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这个大局。

习仲勋回到特委，传达了彭德怀的指示，学习领会陕甘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的决定，和特委人员一起研究如何转好弯子，把以

往对国内敌人的阶级仇恨着重转变到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上来。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处理好与友区、友军之间的关系，贯彻执行好省委的决定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精神。特委研究决定重点做好苏区与友区的划界谈判；搞好与友区民团的关系；搞好与友区民众团体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的工作。

关于苏区与友区的划界谈判。当时关中苏区以东为子午岭，梢山密林，几乎没有什么人烟。子午岭以西及西南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大小不等的几块统战区域。关中特区所辖四个县，淳耀县占淳化县的五分之三和耀县的一大角，这是照金苏区和关中特区的中心地区；赤水县包括旬邑县、淳化县各一部分和彬县北区一小部分；新正县占甘肃正宁县五分之三；新宁县甘肃宁县五分之四。关中苏区部分区域是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友军自动撤离，苏区恢复的，但其行政机关还保留存在。

由于关中特委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了中央、省委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精神，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和平相处的原则，划界谈判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淳耀、赤水、新宁三县与友区的界限很快划定了，但是新正县与友区的划界谈判却遇到了麻烦，没有划清。特委书记习仲勋选派新宁县委郭廷藩为首席谈判代表，特委秘书长杨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正宁县县长朱门在正宁的山河镇进行谈判。驻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邓华作为评判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会谈在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避免矛盾纷争的大局下，终于谈判成功，界限划清。

区域划界之所以比较顺利，是会谈划界双方都以友好相处、共同联合抗日的大局为前提，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真正体现了全国各党、各派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心愿。

接近和争取民团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加之“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关门”政策。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共产党的武装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民团武装之间势不

两立，矛盾尖锐，结怨很深。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中，经过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保安团、民团武装中具有民族自尊心，愿意走上抗日之路大有人在。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赤水县土桥民团团总下令团丁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非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苏区。

为了以诚相待，做好民团工作，瓦解对方，关中特委曾做出以下规定：（一）停止让民团哗变的方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采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其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对友区群众的联系和工作。西安事变后，关中各县根据党的工作纲领，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是这些群众团体负责人不是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群众意愿的人，绝大多数为乡村中的联保主任、保甲长、豪绅等，抗日救国会徒有空名。关中特委没有盲目地去干涉或取消这些群众团体，而采取了借用其名行其实的策略：首先是利用这些空头组织的名义，组织起各行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把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搞得比较早、比较好的首先是淳化县。以淳化县为典型，推动了整个关中特区抗日群众救亡运动的开展；其次是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争取群众能够享受到一般的民生自由。随着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和组织力量的增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其三是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时，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他们赞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四是把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的抗日救国会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

体。其五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注意克服和纠正工作方法上的“左”的毛病，既要发动群众，又要顾及上层统一战线。其六是加强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工作，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关中特委还十分重视特区内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杂居地区。特委在这一地区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尊重回族兄弟的民族信仰与风俗生活习惯，主张和宣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族兄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3月下旬，关中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在新正县的胡家湾成立，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亲临成立大会，并发表了讲话，还带着关中特区剧团为回民抗日救国会的成立进行助兴演出。

关中特区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恰当处理与友党、友军、友区之间的关系上，具有相当高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理解得好，工作抓得细致，符合关中特区实际，针对性也很强。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政治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会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期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利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具有爱国抗日精神的国民党个别老县长从照金苏区、陕甘边区南区时期就与红军和游击队有过联系，关中特委和这些上层人士也建立了联系。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个别顽固的地主武装外，都与关中特委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有的还向关中特委提供情报、枪支和弹药。

这一时期，由于党的政策对头，特委的工作方法得当，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较好的落实，关中特区的抗日救国运动和特区的各项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显著。

1937年4月，中共陕甘省委再次撤销，中共关中特委改属西安事变期间新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在陕甘省委撤销之前，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即罗迈)于1937年1月上旬前来关中特委驻地淳耀县

的桃渠河，在关中特区视察工作近两个月，直到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之时，才离开关中特区。李维汉在离开关中特区一个月后，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长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出版的第13期《党的工作》刊物上。文章是对以习仲勋为首的关中特委，同时也是对创建照金苏区以来在关中这块土地上战斗不息的其他领导人和关中特委的评价和称誉。文中写到：“在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拣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张邦英同志等。”“关中从志丹等同志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了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是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现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的游击战争是模范的。”

# 第十一章 抗战时期的照金

## 第一节 关中分区的形成

关中分区是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照金苏区、南梁苏区时的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游击区、陕甘边区南区和关中特区逐渐演变、发展扩大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领导。10月，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关中分区地处桥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县和双龙中心区，分属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中部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为一北宽南窄、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南大门。

## 第二节 关中分区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1937年10月，关中分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50多名，代表700多名党员。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分区机关驻新正县马家堡(1941年迁到马栏镇)；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霍维德任专员；将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中共关中分委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关中专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县和淳化、旬邑八路军办事处。同月，关中特区工会改为关中分区工会，主任张如洲；关中特区青年救

国联合会改为关中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贺建山；中共关中特委妇女部改为关中分区妇联会，主任郝明珠。更名后的关中分区工、青、妇组织分别下辖各县相应机构。

1937 年底，关中分区所辖各县经过民主普选，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

### 第三节 关中分区的发展

1938 年 7 月，关中分区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 50 多名，代表党员 4000 多名。大会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并讨论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会后，分区各级党组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使统战关系遍及分区周边国统区国民党党政军机构和地方绅士、知识分子、商人、哥老会及其他社会组织。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 年 12 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0 年 5 月，国民党军陆续侵占了关中分区新正、赤水、新宁等部分地区。9 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警备一旅)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反摩擦斗争中，相继攻克了柳林、庙湾、瑶曲和马栏等地。10 月，关中分区专署将柳林、庙湾、瑶曲等新开辟的区域划分为关中分区东行政区，并设立党政军组织。同月，关中分区改属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领导。

1941 年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鉴于中共陕西省委已从国统区迁入关中分区，遂决定关中分委隶属陕西省委领导。5 月，关中分委改属新成立的中共西北中央局(1949 年 3 月改称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

1942 年 12 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改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

区司令部。同月，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张德生任书记，机关驻马栏镇，并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汪锋任部长，领导原中共陕西省委所辖国统区党的工作。

1943年3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将东行政区改为县制，成立了同(官)宜(君)耀(县)县党政机构。10月，同宜耀县撤销，其辖区划入淳耀县，淳耀县党政机关设庙湾。1944年初，在中部县成立了中共双龙镇中心区委，机关设在中部县双龙镇，直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先后下辖双龙镇、上畛子、槐树庄3个区，共9个乡(双龙镇、上畛子2个区在今黄陵县，槐树庄在今富县)。至此，关中地委共辖4个县委、1个中心区委、19个区委、157个支部、425个党小组，以及关中、陕南国统区的党组织，有党员2654名。

1944年初，由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中共关中地委基本上停止了与国统区中共组织的联系。直至下半年，关中地委才陆续派出干部到陕西国统区，审慎地恢复了中断联系的各县党组织和党员关系，为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从组织上、干部上作了准备。

## 第四节 关中分区所辖县党政军群组织

### 一、党的组织

1937年10月，中共关中特委改为中共关中分委后，原属中共关中特委领导的中共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隶属关中分委领导。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中共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3月，中共同宜耀县委成立，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10月，同宜耀县撤销，其辖区和工作人员并入淳耀县。

1937年8月，中共关中特委将旬邑、淳化县的红军募补处分别改为旬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对内代行各县委职能，薛和

昉、田润芝分别任主任，隶属关中特委领导。1938年3月，中共关中分委决定，在旬邑、淳化县八路军办事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中共旬邑、淳化县工作委员会，田润芝、杨植分别任工委书记。县工委对外仍称八路军办事处，隶属关中分委领导。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旬邑县城挑起武装冲突，中共旬邑县工委迁至新正县湫坡头，实行异地领导。1940年3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淳化事件，迫使八路军退出淳化县城，中共淳化县工委亦随军撤至淳耀县安社村，与中共淳耀县县委合并。11月，中共关中分委鉴于中共旬邑县工委及部分基层组织已经暴露，遂撤销了中共旬邑县工委，将其所属党组织分别划归中共新正县委、赤水县委领导。

1937年初，中共新正县四区区委将党的活动延伸到邻县国统区新民、曹家店一带。10月，中共新民地区小组成立，姚伯生任组长，有党员5名，归中共新正县四区区委领导。

## 二、政权组织

1937年9月至10月，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改为抗日民主政府，其中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与关中分区专署合署办公，直到1941年7月才分署办公。1939年初，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指示精神，各县将县代表大会改为县参议会，县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由县参议会选举产生。1月，新正、新宁县分别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县长。淳耀、赤水县也分别于3月和4月召开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陈学鼎、郭存信当选为淳耀县参议会议长和县长，康润民、王振喜当选为赤水县参议会议长和县长。1941年7月至8月，各县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经选举，李科、郭廷藩当选为新正县参议会正、副议长；杨伯伦、高庆荣当选为新宁县参议会正、副议长；任成玉、吴大鹏当选为赤水县参议会正、副议长；陈学鼎、师有存当选为淳耀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同时，各县参议会还选举产生了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代表。1942年5月，各县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

给各县的指示信》精神，对县参议会和县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使共产党、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县参议会和县政府组成人员中基本趋于“三三制”的原则。各县议会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1943年3月，同宜耀县政府成立，10月随县制撤销，并入淳耀县政府。

### 三、军事组织

1940年春，新正县关中回民支队成立，1942年4月，关中回民支队与新正县各区游击队整编为新正县保安大队，1946年11月，新正县保安大队被编入新正县独立营，这支武装主要活动在关中分区和陇东地区。1937年3月，新宁县独立营建立，共有200多人枪，1937年9月被编入关中分区二十一团；1938年5月，新宁县将各区游击队及自卫军整编为新宁县保安大队，1944年与月编入关中警一旅第三团，其主要活动在新宁县境内。1937年3月，赤水县保安大队建立，共有200多人枪，1945年8月编入关中分区保安纵队；赤水县警卫队成立于1938年10月，共40余人枪；赤水县游击队成立于1942年3月，共30余人枪，主要活动在南原、中嘴、马家山一带；赤水县武工队成立于1943年春，直至抗战胜利。淳耀县保安大队组建于1937年3月，共200多人枪，1943年10月随淳耀县与同宜耀县合并而改编；淳耀县民兵大队部成立于1941年12月，直至抗战胜利。

### 四、群众团体

1937年2月，赤水县工会、淳耀县工会和赤水县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7月，新宁县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成立。10月，中共赤水县委妇女部、淳耀县委妇女部分别更名为赤水县妇女联合会、淳耀县妇女联合会。1938年1月，新宁县工会成立。1939年8月，新正县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成立。1940年4月，新正县工会成立。1942年9月，根据中共关中分委指示，赤水县、淳耀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组织领导全县各界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和支前活动，直至1945年1月撤销。各县工、青、妇组织在党委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配合党政军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各项

工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应有贡献。

## 第五节 “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关中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要求，在分区及各县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建立了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政府，有效地推行了“三三制”政策，各级政权不断巩固和完善；开展了以整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建设运动，加强和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取得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民主政权。官是经过民主选举和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关中分区专署为边区政府派出机关，下有县、乡两级政权及县政府派出机关区公署。

抗战初期，为适应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关中分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资本家、富农、牧师、僧侣等的公民权，在赞成抗日的原则下，准许各党派、职业宗教、文化团体自由活动；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对已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给予同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和房屋，取消了对地主、富农经商的限制，并欢迎外地资本家来边区经商。之后，关中分区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上先后进行了三次民主普选工作。

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

《条例》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比例为乡代表会每居民20人选代表1人，区议会每50人选1人，县议会每200人选1人，边区议会每1800人选1人；各级选举须按当选人数，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议员。按照这些规定，关中分区各县进行了第一次民主普选，通过分别召开乡代表会和区、县两级议会，采取差额方式选举产生了有各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的同级抗日民主政府。7月，新正、新宁两县先后召开县议会，选举产生了新正、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组成人员。至年底，分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变为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春，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指示精神，关中分区各县撤销了区议会，将县议会和乡代表会改为县、乡参议会。

1941年下半年，按照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关中分区各县进行了“三三制”民主普选工作。这次普选，通过召开县、乡两级参议会，改选了县、乡两级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参加各级政权的领导工作，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经过选举，在县、乡政权内，共产党员在县议员中占50%，在县政府委员中占55%；在乡议员中占30%，在乡政府委员中占32%。这次选举，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县级政权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过大，不符合“三三制”的规定。1942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给各县的指示信中指出：“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由无党无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包括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按照这一指示，关中分区各县即召开县参议会，通过改选，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作了调整和补充，使“三三制”政府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名副其实。经过改选，新正县退出共产党员3人，被选非党人士5人，使其成分比例为共产党员占36%，接近于三分之一要求。淳耀县31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0人，无党派和其他人士21人；9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3人，中间分子2人，

进步分子和其他人士 4 人。赤水县 46 名议员中，共产党员 16 人，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 30 人。新宁、同宜耀县也都达到了“三三制”要求。分区各县“三三制”政策的贯彻落实，充实和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1945 年 8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训令》指出，边区政府根据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大会决议，决定于当年底完成乡、县、边区三级大普选。为更加发扬民主，加强乡村自治，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还决定改乡(市)参议会为乡(市)人民代表会。8 月底，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召开会议，部署安排了第三次普选工作。会后，关中分区各县经过试点、总结经验后，全面开展了普选工作。到 1946 年 1 月，分区各县乡级选举基本结束，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参议员。之后，各县陆续召开新一届参议会会议，选举出县政府委员和边区参议员。3 月下旬，各县参议会会议结束。这次民主普选，是在边区人民政治觉悟程度和民主生活习惯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以及抗战胜利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切实坚持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和“三三制”政策，使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和完善。

## 第六节 关中分区的经济建设

抗战期间的关中分区，按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普选、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在应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中，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战争”的号召，切实贯彻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和手工业与小型工商业等经济政策，发展了经济，解决了物质上的困难，并领导全区军民实行新的土地分配政策和减租减息，开始大生产运动，使全区经济向着丰衣足食的方向发展。

## 一、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初期，关中分区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区域：一类是已分配土地且实行了土地革命的区域；一类是未实行土地革命的区域。针对两类不同区域的实际，其工作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经过土地革命的区域，以土地分配是否彻底，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彻底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即已登记备案或插了牌子的地区，约占三分之一；第二类是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即虽经政府宣布了分地法令并派人进行了分地，但因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加之地广人稀，不能分完所有土地，只经群众会宣布谁种归谁。无人种的归公田，待以后移去群众再作调剂和分配的地区；第三类是西安事变前3年未收租子的地区，在内战时建立了政权，虽未分土地，但地主不敢来收租子，视同已分配土地的地区。针对这三类地区存在的种种土地纠纷与租佃关系，关中分区于1941年颁发了《关中调整土地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在土地分配过的地区，其基本政策是保护农民既得利益，对于地主亦设法使其有必需数量的土地耕种，以保障其生活；在土地分配不彻底的地区，其政策为保障农民既得利益，地权仍归农民所有，同时设法照顾地主的生活；在3年未收租子的地区，虽未明确宣布分配土地，但农民曾经过流血斗争，依法令地权确定为农民所有。

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关中分区采取减租减息的政府，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又实行交租交息，照顾地主的利益，并确保其地权。

减租减息分三个阶段实施：1942年前为第一阶段。关中分区下令对半减租。但因发动群众工作未能跟上，使减租政策没有落实，各县普遍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现象以及佃权无保障，甚至发生地主收回土地的问题。1943年至1944年为第二阶段。由于《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的颁布，推动了减租减息工作的开展。1944年，分区各县普遍开展了群众性减租运动，清算了减租法令颁布以来多收的租子，保障了佃权和减租法令的贯彻。同时，在分配土地不彻底的地

区，保障了农民的地权；在 3 年来收租子的地区，确定了地权属于农民所有。1945 年冬至 1946 年春为第三阶段。分区实行了以“查租保佃”为主的减租减息复查工作，各县对提出的所有地权问题和租佃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方式方法进行了处理。

关中分区通过实施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照顾了地主利益，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使逃离边区的一些地主返回家乡，一些开明绅士被选人各级参议会，为抗战做出贡献。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与发展工商业

1942 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关中分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关中分区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并规定党政机关每人种地 6 亩，学校每人 2 亩。在大生产运动中，领导干部模范带头，霍维德专员一马当先，不但感动了干部和群众，连国民党进步人士也赞扬他“痛关民生”；习仲勋书记及各县领导上山开荒，对群众鼓舞很大。到 1944 年，分区军民开垦荒地共 36.28 万亩。其中，分区机关垦耕 4558 亩，淳耀县机关垦耕 1654 亩，赤水县机关垦耕 1594 亩，新宁县机关垦耕 1792 亩，新正县机关垦耕 5875 亩；部队开荒 3.2 万亩；学校开荒 8000 亩。在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尤其是淳耀县和东行政区，都属于照金苏区时的中心区域或与中心区域紧紧相连，东行政区的绝大多数地域都在耀县。淳耀县和东行政区都为耀县西北部的贫瘠山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和经济封锁。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巩固老苏区和新解放区，淳耀县县委和东行政区区委，按照边区、分区党委部署带领党员、干部在加强组织和政权建设，精兵简政，紧缩开支，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大生产运动，县、区党政部门，工会、青年、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开荒种地，丰衣足食。淳耀县和东行政区办事处除开荒种地 1654 亩外，同时开展造林和养殖业等生产。在发展工业方面，分区建立了碳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

私营工业有各种规模不等的作坊、工厂等。纺织业方面，全分区有纺织妇女 1.21 万人，纺车 8522 架，年纺织的衣料可供给全区百分之六十三的人口穿用。私营商业日趋繁荣，仅柳林、长舌头、铁王、马栏、湫坡头等地就增加商业门店 58 处。1942 年 10 月，东行政区改为同(官)宜(君)耀(县)县后，除组织 800 余民兵劳武结合，开荒 1400 余亩，修埝地 270 余亩外，同时组织纺线车 1000 多架(辆)，纺线 1.87 万斤。还利用衣食村煤矿资源，由矿工联合会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为抗日作贡献。淳耀县组织驮骡队、担架队，组成各区民兵运输队。仅 1940 年，淳耀县征缴公粮达 2367 担(铜川市耀州区委史志办提供的数字)，向农民发放农贷 37 万元(边币)。经过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关中分区机关、部队、学校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公营、私营和合作社三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

1943 年，关中分区广泛开展了学习和争当劳动模范运动。在当年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分区首先表彰了劳动英雄李学义。之后，相继涌现出义仓英雄张清益、移民英雄冯云鹏、模范班子领头人石明德等。同年冬，关中分区召开大会，再次表彰奖励了一。批劳模，推动了全区劳模运动的深入开展。1944 年，关中分防 40 多名劳模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模表彰大会。当年底，全区评选出县级劳模 57 名，乡级劳模 213 名。其中，张清益创办义命的经验，推动了全边区和其他解放区义仓的开展，贾恒春创办的纺织合作社，是全边区纺织合作社的模范。雷庄、白原村、陈家楼子、段家堡子等村也因涌现出了张清益、石明德、贾恒春、殷生珍这些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而闻名边区乃至其他解放区。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劳模运动，提高了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二流子的改造，掀起了大生产热潮。

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关中分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取得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 三、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与合作社经济组织

1942 年以前，关中分区一些地方就有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1942 年，毛泽东《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的讲话发表后，分区的劳动互助组织走上蓬勃发展阶段。1943 年春，全区有劳动力 3.32 万人，参加变扎工的达 33%。1944 年春，又组织 72% 的全劳动力和 65% 的半劳动力参加了变扎工。农村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包头班子(又名唐将班)。班子有包头、领班、书班，分为专门卖工的、半变工的、半卖的、完全变工的；二是变工。几家临近亲朋在一起人工变人工，人工变牛工，相互交换，不卖工；三是搭种。条件相仿的几家在一块搭种、搭碾、搭锄等，不记工，也不还工；四是打锣鼓。谁家要开荒，备酒备饭，请人帮忙，不记工，也不还工。上述这些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实行劳动生产互助，解决了群众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增强了广大群众的省动热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毛泽东把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称为合作社，并提出合作社是边区在经济上组织群众最重要的形式。合作社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支援工农业生产、方便群众购销、活跃市场、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关中分区合作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 年至 1942 年为第一阶段。新正、赤水、新宁县和中心区都办起了合作社。其中赤水县还成立了工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新正、赤水县合作社开办有纺织厂和工厂。这一阶段的合作事业尚处于摸索阶段，多为官办的消费合作社；1942 年 12 月至 1944 年 6 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各县的合作社逐步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合作工作开始有了方针上的转变。合作社以发展生产为主，并进行必要的改革。如赤水县将各区合作社与纺织厂进行了合并，资金集中于县联社统一分配，并重新

整理股票，登记社员。新正县整顿了纺织厂，成立了运输队。新宁县运输队带动了该县运输事业的发展等；1944年7月至抗战胜利为第三阶段。各合作社在整顿中派人整理股金、补发股票、送红利。到1944年底，关中分区合作社发展到24个，社员1.38万人，股金2080万元(边币)，大大促进了关中分区经济的发展。

#### 四、开荒种地与安置难民

关中分区人口少，面积大，可开垦的荒地较多。由于战乱和天灾，特别是国民党蒋介石为阻止日军，在河南花园口黄河掘堤，洪水淹没大片沃野，千百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逃到陕西。加之后来又不断有难民迁来，淳耀县和同宜耀县辖区难民多达万余，几乎占了原居住人口的一半左右。难民纷纷拥来，关中分区一方面把开垦荒地、增产粮食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掀起了开荒的热潮。同时，千方百计地安置移难民，组织移难民开荒种地。仅1943年就安置移难、灾民4000户，1.2万多人。群众开荒11.39万亩(其中移民开荒3.78万亩)，办义仓39处，开义田896亩，增产粮食1.84万石；部队开荒3.2万亩，增产粮食3300余石；各级机关开荒1987亩，增产粮食433石。

1942年12月，关中分区专署制定了移难民暂行办法，成立了县区移难民管理委员会，划定了移民区，吸引大批移难民来边区谋生，对移难民住所问题，分区发动老户代为其修旧窑、打新窑或腾让窑洞、房子。对移难民的口粮问题，一是政府无息借贷；二是老户低利借给；三是发动移难民开荒，多开多借；四是劝募救济。移难民开公荒，谁开的归谁，并发给土地所有证，3年免交公粮；开私荒，移民有权使用土地，并发给土地使用证，3年免交地租。同时，分区还发给移难民农贷，解决农具、籽种等困难。广大移民经过开荒生产，生活很快得到改善。

1940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其中规定：“凡沦陷区或非沦陷区之难民或贫民，如愿入陕

甘宁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者，均得自行移人。”“得享受下列之优待：甲.得请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乙.得请求政府解决生产工具；丙.得免纳二年至五年土地税(或救国公粮)；丁.得酌量减少或免除义务劳动负担。”“享受和边区人民同等权利，有同等选举权被选举权，得参加一切法令的保护，有选择正当职业的自由权。”“各级政府对移民边区的难民和贫民不得强迫服兵役，强迫其他劳动服役，强迫交纳捐税。”“违者惩罚之。”“愿为人雇工者得请求政府介绍兼保证其不受雇主虐待。”

照金作为关中分区和淳耀县、同宜耀县的一部分，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积极推进“三三制”民主建设，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发展边区经济。淳耀县和同宜耀县政府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不但对常住的外来难民和贫民实行安置和优待，而且要求各区、乡对路过当地的难民也尽可能地给予帮助，使其安全过往。淳耀县和同宜耀县县委、政府，对 1774 户难民共 6500 余人进行了妥善安置，区、乡政府动员当地群众为其调解土地，解决种子和住房、生产、生活等困难的同时，领导和指导他们开荒种地，实行生产自救，使其生活得以保证。1942 年，淳耀县在照金师家道，集中安置了一批难民，并于当年年底建立了乡政府(群众称“难民乡”)。林忠保任乡长。实施“政治上给以影响，生活上给以帮助”的原则安置，使这些难民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感谢边区各级地方政府，使他们在边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抗战期间，难民自愿组织妇女做军装，组织民兵抬担架，运弹药，为边区建设和边区抗日救亡作出重要贡献。著名秦腔剧《血泪仇》就是反映当年边区安置优待难民和贫民情景的真实写照。

## 第七节反摩擦斗争

### 一、旬邑事件及摩擦与反摩擦斗争

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当时的形势，虽然接受国共合作和对日宣战，但始终没有放弃顽固的反共立场。1938 年下半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军队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开始进行严密的封锁和军事包围。在陕甘宁边区的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宜川、宜君、同官、耀县、淳化、旬邑，接甘肃的宁县、庆阳西峰镇、镇原，再入宁夏，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县城，北面与马鸿逵部防区相接，形成一条贯通三省长达千余里的碉堡封锁线，人们称其为“碉线”。进而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直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于 1939 年、1941 年和 1943 年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小摩擦一直没有中断过。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8 年年底至 1940 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 27 次，抢劫骚扰 457 次，暗杀、诱捕人员 295 人次。由于关中分区及毗邻的富(县)甘(泉)一带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和国际友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主要通道，因此而成为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地区，也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主要防区。在靠近关中分区的耀县、泾阳、三原、淳化、邻县、洛川、富县一线，国民党共部署了 4 个师和一个旅的兵力，直接威胁关中分区的安全。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另一位亲信、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委派到旬邑、淳化、富县的县长和保安队长，也都是些制造摩擦、寻衅滋事的“爪牙专家”，从而，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反封锁、反摩擦的前沿阵地。

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制造摩擦，关中保安司令部根据毛泽东主席“以斗争求团结”的处置原则，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 年 12 月 15 日，因河防吃紧和国民党的压迫，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岸边及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的伤残军人院(荣军学校)，奉命转移至关中分区新正县境内。转移途经旬邑县土桥镇时，被国民党邻县专员张明经和旬邑县长张中堂所指派的保安队包围袭击，遭受肆意凌辱殴打，致使八路军伤残荣誉军人处境相当困难。次日，国民党保安队将部分八路军荣誉伤残人员包围并强行扣压了路条。荣校在多方解决无果的情况下，伤残荣誉军人忍辱退回原防。12 月 18 日，国民党旬邑县政府又下令各保甲不准卖给八路军伤员蔬菜。

荣校因粮草断绝，遂于 1939 年 1 月 12 日奉命向土桥出发，又遭顽军包围，并将荣校派去谈判的人员扣留(后释放)。1 月 16 日，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旬邑、正宁、邠县、淳化等 5 县保安队 300 余人及壮丁队 500 余人先后集结于土桥。22 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与三原、泾阳的保安队也相继赶到土桥。在国民党邻县保安司令部郑伯庸的指挥下，以 2000 之众将荣校伤残人员重重包围，并鸣枪胁迫退出该地。为僻免暴徒对手无寸铁的伤残人员的无辜屠杀，八路军荣校伤残人员忍痛退至关中分区新正县看花宫一带。

1939 年 5 月 24 日，驻旬邑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采购员陈应通出外购物，被国民党旬邑县保安队杀害。5 月 25 日，荣校 20 多名代表前往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请愿惩凶，并要求保障安全。国民党旬邑县政府竟指使保安队向请愿人员扫射，9 人被惨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荣校请愿人员和八路军驻旬邑独立营被迫还击，激战七天七夜后占领了大半个县城。此时，国民党旬邑县政府又调来陕西省保安第六、第九两个团千余人围攻关中保安司令部独立一营，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八路军驻旬邑独立营和荣校请愿人员于 6 月 1 日奉命撤出旬邑县城。撤退中，17 名伤残军人又惨遭杀害，这一事件时称“旬邑事件”。事件发生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电蒋鼎文，谴责张明经、张中堂杀人掠地罪行。毛泽东主席在批发此电文时指出：“同时致电蒋介石和程潜(天水行营主任)，通电全国，要求社会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

1939 年 12 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胡宗南部在关中分区夺地掠城，并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企图蚕食关中分区。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分子发起武装进攻 64 起，抢劫骚扰 38 起，先后占领了淳化、旬邑县城及关中分区新正县四区、六区和赤水县的关庄、梁庄等地。

1940 年 3 月 31 日下午，驻旬邑职田镇国民党预备第三师第一营突然用大炮轰击关中分区党政机关所在地新正县马家堡。同时向新正

县四区看花宫一带进攻，关中分区部队将进扰国民党军击

退。5月8日，国民党陕西保安四支队郭相堂、李仰之、苟福堂部3个中队伙同国民党军预三师八团向关中分区新正县六区一、二乡进攻，当地民兵、自卫军奋起反击。5月19日，预三师以两个营的兵力会同国民党宁县保安队及壮丁队约千余人，侵占了新正县的西坡村一带。下午，国民党职田镇驻军又用迫击炮轰击马家堡，炸死炸伤群众6人。当晚，关中分区部队撤出马家堡。6月8日，郭相堂、李仰之率其两个中队侵占了关中分区赤水县井村。11日晨，国民党淳化县城驻军猛袭驻该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二营，战至12日晚，独立二营奉命撤出淳化县城。14日至17日，关中分区部队将郭相堂、李仰之部消灭。之后，国民党保二旅从马栏向刘家店一带袭扰，正宁县山河镇方面的国民党甘肃保安部队向新正一区袭扰，正面以国民党军预三师为主力向关中分区部队进攻。至7月底，马栏、庙湾、柳林一带的国民党保二旅均被关中分区部队击退。8月14日，关中分区部队消灭了占领新正县六区东牛堡的国民党保甲支队李树铭部。在此期间，共发生大小战斗90余次，国民党军先后侵占了新正县四、六两区及淳化县城，关中分区部队攻克了马栏、庙湾、柳林3个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子弹8000余发，俘敌248人。

在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关中分区部队先后进行了马栏、庙湾、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照金两个区，扩大了庙湾、柳林、瑶曲3个区，成立了关中分区东行政区；拔掉了国民党军10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大队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邻县保安大队长李仰之等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打通淳(化)旬(邑)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关中分区部队活动区域范围的企图。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虽然其重心在皖南，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摩擦有增无减。国民党胡宗南部企图先夺取关中分区，后直取延安，先后对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展开进攻。关中分区军民奋起抵抗，顽强战斗，接连

取得胜利，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奉命开赴关中分区。

文年生旅长率部首先在邻县以北义门石村、凤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及国民党地方保安队激战3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后又转战旬邑土桥镇和正宁县，将来犯之国民党军赶回原地，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1943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一方面在政治上大造反共舆论，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企图消灭中共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连续炮击关中辖地几十次。据此，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号召全区军民为保卫边区，坚决而有效地进行自卫战争。各地迅速组织游击队，整顿自卫军，加强盘查放哨，实行坚壁清野。同时，中共中央及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呼吁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和舆论的压力，遂令国民党停止大规模军事进攻。到7月，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 二、智取照金

1939年，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中，全国连续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袭击八路军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破坏以留守处为掩护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机关事件，如“博山惨案”、“平江惨案”、“溧县惨案”、“确山惨案”和阎锡山的“十二月事变”等。与此同时，陕西国统区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指示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为掩护的中共陕西省委从泾阳县云阳镇移驻到关中分区淳耀县的安社村。

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设在泾阳县云阳镇。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去陕北，留在陕南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原鄂陕、豫陕两特委于1935年9月9日在商县(今商州区)梁家坟会合，合并两特委，成立新的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同时合并鄂陕游击总部和豫陕游击师，组成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鄂豫陕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率红七十四师从陕南商洛地区先后移驻长安县大峪口、泾阳县云阳镇，1937年八九月，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序列奔赴抗日前线，特委随之撤销，特委机关和红七十四师未编入一一五师的，少数人员，组成一一五师留守处，掩护陕西省委开展工作。

1939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和一一五师留守处人员一同迁往关中分区安社村时，仅留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汪锋率省委警卫营(两个连)并配备电台留在云阳，主要是为了和正在中条山抗战前线的原杨虎城旧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中共工委及整个第四集团军中共组织联系比较方便等。

两三个月后，汪锋率警卫营也迁回安社村，与省委汇合。5月，为配合关中分区、关中警备司令部和警一旅向东线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开辟关中分区的耀县庙湾、柳林、瑶曲等新解放区，省委机关要北上，迁驻照金。这时，照金镇及其以北地区属于游击区，照金镇则由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张彦宁民团驻守。省委驻安社村时，张彦宁民团几次企图南下安社村袭击省委，但都因事前暴露未敢下手。省委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由汪锋率警卫营执行。汪锋首先想到的是“智取”，其智取方案获得省委同意后，汪锋指挥警卫营化装成国民党地方民团，选派两个人事先前往照金进行侦察。一位黄姓的侦察员是位老战士，化装成国民党军副官，持有一份公函，公函盖有另一民团公章和民团团长张庆生的私章。公章和私章都是汪锋让省委干部雷荣用肥皂刻制而成的。

“黄副官”和另一侦察员到达照金镇城门前，对守城哨兵言称：“这一带共产党、‘土八路’近日活动猖獗，我们要派人前来照金加强防务力量，需要马上晋见张彦宁团长，协商防务事宜。”守城哨兵一看公函，信以为真，二话没说，放“黄副官”一行人进城。这时，化装成民团的警卫营也到城下。

“黄副官”二人进城后，径直来到张彦宁住处，张准备会见时，

身边一位“先生”劝张说：“你先不要着急，这事很难说，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先去看看再说。”经这一提醒，张彦宁顺口便说：“行，你先去看看。”这位先生还是汪锋的蓝田同学，此时给张彦宁当“军师”。

这位先生先见过“黄副官”二人，然后再回报张彦宁，“黄副官”二人来到张彦宁面前。还未等张彦宁和“黄副官”开口，只见这位先生得意地在张彦宁面前逞能道：“不用说，一看‘黄副官’，就是咱们的人。”“黄副官”上前向张彦宁敬过礼，就在张彦宁客气让座之时，“黄副官”二人拔出手枪，活捉张彦宁和他的军师，发出信号。警卫营立即进城缴了民团的枪械，拿下照金镇，省委搬迁到这里。6月17日，独立一、二、三营与警备八团相互配合，一举歼灭照金西侧赤水县郭相堂、李仰之两股贯匪200余人，匪首李仰之当场被擒，在押解途中，将其处决。从此，照金周边安全有所好转。

### 三、爷台山反击战

1945年8月上旬，抗日战争胜利在即，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在关中分区淳耀县爷台山地区进行了一场漂亮的自卫反击作战，史称“爷台山反击战”。此战干净利落，彻底消灭了入侵之敌，一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制造摩擦，进而军事占领，妄图夺取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保安副司令胡宗南为加紧反共活动，将邻县、淳化、耀县、同官、洛川等地的反动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邻洛区动员指挥部，派反共死硬派人物梁干乔任专员兼指挥官，对付陕甘宁边区。梁干乔在其所辖区域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尤以兵训危害最甚。为了封锁边区，梁干乔建立了以镇、保为单位的地方武装，到处抓丁拉夫，致使淳化、旬邑、耀县等地的青壮年被抓的抓、逃的逃、躲的躲、藏的藏，长期不能归乡，田园荒芜，万户萧条。梁干乔为修筑碉堡线，在各地强征民夫，拆房砍树，每隔500米左右就修一座碉堡，日夜防守，严加盘查。

对于梁干乔的罪恶行径，广大老百姓及强迫来的穷苦士兵纷纷投书国民党陕西省政府。1945年5月19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绍周以“破坏行政，纵属殃民”等六条罪状为由撤了梁干乔的职，派亲信李静谋接任指挥官，这是国民党军政内部的派系之争。李静谋到任后，按照祝绍周的旨意，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不断寻衅滋事，先后发生了“淳化兵变”和“方里民意运动”两个事件。

李静谋先派亲信王凤高到陕西保安二团任副团长，伺机接替刘文华团长之职。后又派土匪出身的亲信吕石山接替了独立大队队长李承学(李承斌)的职务。并大搞“点名发饷”，对警戒的、出差的一律不予发给……这一连串的行径，引起了官兵的强烈不满。在保安二团团团长刘文华的组织下，其部下于6月26日晚袭击李静谋的指挥部，全歼其卫队、卫生队等140多人。之后，刘文华率部起义，毅然投奔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此事件时称“淳化兵变”。

刘文华部起义后，驻淳化方里镇的国民党陕西省保安三团团团长曾海蕃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顿生消灭对其威胁最大的国民党方里镇镇保武装之恶念，遂下令捉拿前任镇长张锡畴。张锡畴速与镇长宋增录商议，以催粮为名，立即将镇保武装拉到汉寨村，并派人与国民党陕西保安三团四连二排进步士兵余增贤取得联系，准备袭击曾海蕃团。7月5日晚，余增贤发动两个连又一个排的士兵起义，烧毁长达10余里封锁线上的40多座碉堡。7月14日下午，方里镇外围据点逐一被攻克，保安三团团部驻地方里镇也被镇保武装和起义士兵包围。曾海蕃于黄昏带残兵20余人仓皇逃往耀县。此事件时称“方里起义”，亦称“方里民意运动”。

淳化兵变和方里民意运动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歪曲事实，大造舆论，诬说“淳化兵变是共产党给撑腰的”、“共产党遂乘机侵占淳化、通润、方里等要地……欲向三原、同、耀，夺取西安”等等。并以此为借口，将河南前线、黄河防线及华阴、西安等地的部队星夜西调。至7月19日，已有11个师的兵力抵达关中分区边境，东起黄龙山，西至正宁县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气势汹汹，声言要“进攻

边区，杀尽共产党”。一时间，关中分区周围羽檄飞驰，战云密布。

为了制止国民党军向边区进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命今关中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保持高度警惕，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重点设防，以爷台山为主阵地，迟滞和消耗国民党军。关中分区保安部队、关中警卫队、警一旅三团和新四旅七七一团等受命迅速进入战斗位置，一面加紧构筑工事，一面派出巡逻分队警戒，密切注视国民党军的动向。同时，为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保卫关中制内战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犯关中，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把进攻关中的国民党军打出去，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指示还要求关中各地立即整顿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修筑工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关中分区迅速动员起有 1129 人组成的 56 个民兵游击小组和 37 人组成的 3 个爆破组等，严阵以待。7 月 19 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为了有效地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淳化县境内的爷台山为主阵地，令关中警备区部队进入战斗位置，做好反击敌人的准备。警一团在新宁县和新正县的西线防御，警二团在淳耀县的东线防御，警三团在南线的赤水县蒋家山、爷台山一线防御。警备区所属的赤水、淳耀两县保安大队 1000 多人也严阵以待。7 月 21 日拂晓，敌五十九师、骑二师在重炮团的掩护下，从东南方向对爷台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暂编十五师向旬邑土桥方向进攻，暂编五十二师向上下墙村方向进攻。防守爷台山的赤水县保安大队依托有利地形，奋勇抗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22 日，敌人以几个重炮团的火炮向爷台山前沿阵地实施炮火覆盖，大部分防御工事被毁。关中分区守军遂收缩防线，坚守爷台山主峰阵地，国民党军占领了爷台山以南 10 多个村庄。24 日，敌预备第三师又投入进攻，赤水保安大队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顽强抵抗，伤亡很大。随后，警三团一营三连奉命前去接防，恶战 3 日，连长王根发指挥全连始终坚守在阵地上。26 日，敌人又集中五十九师、预备第三师全部炮火，包括野炮、山炮和美式火炮，向三连阵地猛轰。27 日晚，在连续抗击敌人 7 天后，因敌我力量悬殊，三连及

防守爷台山阵地的其他部队奉命撤出战斗。爷台山及其以西宽 50 公里、纵深 10 公里地域内的 41 个村镇被国民党军占领。

爷台山阵地山高路隘，地势险要，是守备关中分区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国民党军队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咽喉要塞。敌人占领爷台山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已占领的阵地，大肆抢劫财物，拉夫抓丁，抢修工事，企图以爷台山为依托，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进攻。

爷台山战斗打响以后，朱德总司令等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撤回原防区，赔偿损失。但蒋介石、胡宗南对此置若罔闻，不但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调兵遣将，企图夺占关中分区，以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以暂编第五十师主力第三团坚守爷台山；以新编第五十二师、新编三十七师、第一六五师、第一师、第三师分别集结于富平、同官、耀县、三原、淳化、旬邑、正宁、宁县一线；另以第七师等部队为战役预备队。

为了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收复爷台山阵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汪锋为参谋长的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抽调新四旅、教导第一、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参加战斗。具体部署是：由新四旅 5 个营和警一旅三团一营担任主攻，由三五八旅担任助攻，教导第一、二旅集结于庙湾、转角一线，作为预备队，确保翼侧安全。警一旅三团二营、三营在石门关担任边区南线的正常守卫任务，警一旅一团、二团也在各自驻地防御。中共赤水、淳耀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战地工作团，由团长王振喜、副团长杨植等具体负责支前工作。淳耀县县委书记郭进亭、县长封正宝亲临前沿阵地，配合主力部队，安排支前工作，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运送伤病员、武器弹药及给养。照金、白瓜、柳林及关中分区各地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主动为前线部队烧茶烧水、送饭、送菜。民兵游击组、爆破组，配合部队不断袭击来犯之敌。8 月 7 日，部队开始向预定作战地域开进，8 日黄昏进入前沿阵地，23 时即从西、北两个方向向敌人全线发起总攻。为了给守敌以致命打击，部队首先集中炮火压制敌人。敌防守爷台山的是胡宗南暂编第五十九

师三团的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重机枪排。其中的四连因镇压甘南农民起义极其凶残而被称为“常胜连”。全连效仿希特勒的党卫军，每人佩徽章内侧都印有“党卫”二字，借以表明其死心踏地地为蒋介石卖命。新四旅因受地形限制，呈一路纵队向爷台山主峰炮楼发起冲击，敌人拼死抵抗，战士们一个挨一个倒下。警一旅三团一营同时向主峰炮楼附近的老庄子炮楼发起冲击，因突击排长康自成牺牲，全营在壕外受阻。战至9日4时，攻击仍无大的进展。临时指挥部调三五八旅一部到正面，并于10时再次向敌人发起冲击，经过反复冲杀，战至当日下午2时，全歼守敌。接着，各参战部队乘胜追击，至8月10日，整个战斗结束，收复了爷台山全部阵地，共歼守敌5个整编连和1个营部，毙、俘敌营长以下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9挺。

8月12日，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由杨尚昆带领美军观察组，到战地进行了调查。面对大量被遗弃的印有“U. S. A”字样的弹药箱、子弹壳和武器，美国观察组不得不承认是国民党发动的内战。8月14日，警一旅三团打扫战场，掩埋牺牲战友的遗体，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和庆祝胜利的军民联欢会。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主力部队新四旅、三五八旅、教导旅速返抗日前方。胡宗南急于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也大量撤兵。关中地区最大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遂告结束。

爷台山反击战发生在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县边区军民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自卫原则，在政治上充分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阴谋之后，在军事上又给进犯边区之国民党军队以坚决打击。这是被迫的自卫之战、正义之战。此战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增强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毛泽东主席对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动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

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能让国民党轻轻松松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

## 第八节隐蔽战线的斗争

### 一、反特情报战

抗战期间，关中分区处在陕甘宁边区的最南端，这片南北狭长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称她为“宝葫芦”，距离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西安不过百余公里路程，国民党称之为“囊形地带”。宝葫芦”如芒在背，刺得国民党当局很不舒服，又气又恼，随时欲以荡平占领而后快。除使出封锁、包围、军事进攻等强硬手段外，便是派遣大批特务、间谍、暗探进行渗透破坏，造谣煽动，蛊惑人心，窃取情报。国民党当局的各个系统、机构情报部门都千方百计地把间谍、特务触角伸向关中分区，包括中统、军统、复兴社，胡宗南第三十七集团军总部、第一、第八战区总部、西安行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等，都先后在关中分区周围设了情报站、点、网、线。中统在陕西境域共设立了6个情报专员，而在靠近关中分区的旬邑县就设立了4个。1940年1月下旬，关中分区书记习仲勋，曾给陕甘宁边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旬邑县国民党伪政府最近新设立了四个科(过去只有一个科)，各科的工作人员均有五六名之多，较过去增加两倍。据悉这些人是专事反共之特务人员。在职田、太峪镇、张洪镇分设的官盐店、官膏局、杂税局、民校里，安插的特务人员亦甚多，并实行具体的严密分工，多方进行破坏。有专门搜集材料，制造谣言，还有的是专门在边区内做‘点线’工作的。他们中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直接受县特务机关的领导……关中分区目前在对方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之中。”

就在这一年，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在全国各地将以前对共产党人的个别登报自首的办法发展成为数十人、数百人表明脱离共产

党及其军队、群众团体的“自首运动”，企图造成反共声势，搞垮共产党队伍。他们把重点放在中共各分局、省委、区、地、县各级高级干部身上。即所谓的“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把中共高级干部拉拢、收买、发展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情报人员，即所谓的“特情”。派去执行这一任务的特务人员，大多为共产党的叛徒或因其他原因脱离共产党对中共心怀不满的人员。而且规定各特务单位或特务个人发展1—2个合格的“特情”人员。这一“自首运动”如获成功，国民党就会兵不血刃地搞垮共产党，以消心腹之患。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特务间谍渗透活动，关中分区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特反特、防奸反奸措施与对策。1942年，关中分区保安科升格保安处，汪锋兼任处长，于桑任副处长，隶属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领导。而其中最高明的一手便是针锋相对，采取利用叛徒，变废为宝和拉出来、打进去等用间与反间的反特手段和策略。汪锋曾在关中分区南面的4个特务据点成功安插外助情报人员。征安“抢救运动”中被康生别有用心地颠倒是非，搅得一塌糊涂的所谓杨宏超“中统特务案”实际上是由习仲勋亲自指挥的关中分区最为成功的利用叛徒进行的一场反特情报案之一，很具有代表性。

杨宏超是旬邑县马栏前义阳村人，此时属关中分区新正县。他有个叔父叫杨宗耀，三十出头，胆识过人，时任新正县副参议长。杨宗耀又名杨科娃，1934年加入共产党，虽说不识字，但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习仲勋最为信任的干部之一。1932年，成立的陕甘游击队中有个叫张占英的支队长，是新正县三嘉原细嘴子村人，1938年叛变革命，加入国民党“中统”，后经习仲勋做工作，张占英愿意为关中分区提供情报，为革命做点事情。于是，张占英便成了共产党在“中统”的“内线”。关中分区也给张占英一些虚假情报，让他带回西安“中统”交差。关中分区为了满足张占英在边区发展“特情”的要求，以应付“中统”，就送了个“杨宗耀”这个人的姓名和在边区的任职。张占英带回“杨宗耀”这个“高级特情人员”的姓名向“中统”邀功，中统陕西省调统室给杨宗耀编号为“忠勇 0059”。

1940年10月的一天，张占英从国统区前来新正县三区六乡青村嘴联络点与杨宗耀接头。青村嘴是红白相接地带，三面临沟，只有三四户人家，北面有条路，约有一里之遥便到青村，沿途是一片庄稼地，路旁无人。在青村一个叫张恩娃的家中，张、杨二人第一次接头见面。张占英向杨宗耀带来了重要情报，其中包括敌保安团的驻地、人员、分布、装备、工事及其思想动态，还有经常活动的区域、范围、时间等内容。二人见面分手时，各自将鞋互换，情报就在鞋内。

见面结束，杨宗耀回到关中分区机关，向习仲勋书记当面汇报。习仲勋看了张占英的情报材料十分满意和高兴，这正是关中分区需要知道的。

习仲勋看到一旁憨态可掬、满脸堆笑的杨宗耀，“责备”说：“当初叫你干这个工作，你还不想干。你看收获大不大，这工作多么重要。有了这些情报，我们才能既知己又能知彼，掌握主动权。”杨宗耀想给习仲勋书记解释，话还没出口，只听习仲勋又说：“今后有啥大事情或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你就来找我。一般的事你就去找咱保安科的王占山科长。”

不几天，关中分区保安科捕获一个潜入分区的“中统”大特务。王占山叫杨宗耀把张占英叫回边区，终于配合保安科查清了这个大特务的底细。这个中统大特务哪里知道，关中分区在“中统”中有“内线”。

这一次，由杨宗耀陪同张占英见到习仲勋。张占英向习仲勋谈了些自己的实际情况。他说：“自己没文化，不识字，敌特的材料看不懂，听到的记不全，重要的情报就很难弄到，迫切需要一个有些文化的人作帮手。”

习仲勋便问：“你以前的材料是谁帮你写的？”张占英回答说：“旬邑野鸡红村有个小学教员叫杨宏超，马栏前义村人，给我帮忙不少。我也考验过他几次，他很可靠，不会出啥问题。我送来的情报材料就是他帮我写的。他不知道这些材料有啥用处，送给谁。”实际上，张

占英在策反利用杨宏超。

习仲勋听了张占英几句解释，觉得也有道理，符合实际，便说：“是呀，要想知道敌人的机密，搞到很有价值的情报，看不懂人家的文字东西怎么行。看懂了，听到了，如果能抄写下来更好。光凭脑子记忆是记不全的，有时还可能记错，不过你要的人，我们得商量一下，看是否有更合适的人选。”

和张占英谈话之后，习仲勋让杨宗耀先和杨宏超谈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征求意见。杨宏超是杨宗耀的亲侄儿，职业身份是小学教员，一年多前参加了旬邑县“抗敌后援会”工作，

“抗敌后援会”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起来的群众性抗日团体。杨宏超给张占英帮忙写“材料”，当然他不会去出卖张占英。

叔侄二人在家里相谈时，杨宏超一听叔父提及给张占英写材料之事，一时感到突然和诧异。就问叔父：“六大(陕西关中方言，“大”即父，“六大”，即六叔父)，你听谁说的？”杨宗耀一听侄儿疑问之中带着承认的口吻，心中便有了数，直来直去便道：“你不要问我是听谁说的，你先说有没有这回子事情？”杨宏超被抵到了墙角，不如实回答六大的问话看是不行了，只好照实说：“六大你看，世事这么乱，日本人在闹，国共也在闹，就像在扯锯，今天你来啦他走啦，明天他来啦你走啦。百姓穷成啥样子，娃们上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书我不想教了，干别的事又找不到，给张占英帮忙，写几个字有啥大不了的事。”杨宗耀一听侄儿给自己打圆腔，就直接挑明话题：“你给张占英写材料，就是给八路军搞情报，这是革命工作。”“搞革命，就要参加组织。”杨宏超一看叔父这么直截了当，对叔父的身份也明了了几分，就向叔父表明心迹：“我当然听六大的话，愿意参加组织搞革命。”

1941年3月，保安科王占山科长调走，中央社会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曲继先来关中，担任分区保安科外勤组负责人，负责打击敌特。

杨宗耀带着侄儿杨宏超还有张占英在曲继先的陪同下，来到习仲勋书记办公室，杨宏超向习表态说：“我叔是共产党，我不给他干事给谁干。”习仲勋接过话茬，高兴地说：“就是嘛！只要你愿意就好。不过这工作既有危险，一切言行都要谨慎小心，而日要随机应变，处处留神，保守机密，不得给任何人透漏一星半点。”

自这以后，张占英带杨宏超返回国统区，习仲勋还送给 3000 元法币活动经费。后来，杨宏超打进了“中统”，和张占英经常穿梭来往于白区与红区之间，搞到好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然后以探亲访友，料理家事等各种理由回边区送到关中分区，具体接头人便是叔父杨宗耀。

为了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杨宗耀也成为杨宏超、张占英在边区发展的高级特情人员。以后杨宏超、张占英来边区送情报，杨宗耀也将《新华日报》、《关中报》，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等“情报”让他们二人带给敌特机关。1941 年 10 月，“中统”还在《关中致西安电》一稿中自我夸耀道：“特工人员杨宗耀现任伪关中分区视察员。又兼该区工会副主任，所有的伪方本月情报皆因伊供给。”显得多么自豪和得意。

杨宏超还向敌特机关提供虚假情报，称自己发展了关中分区新正县县委书记李科为“中统”在边区的“高级情报”人员。杨宏超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后的“出色”工作受到西安“中统”机关的欣赏和信任，任命杨宏超为“专任调工”。从此以后，杨宏超为边区提供了更为高级的情报。

杨宏超在敌特系统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瑞昌和蒲又杰二人的身份，同为“中统”机关的专职特务，还搞到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和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了中统在边区南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杨宏超还机智地把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抄写下来，提供给关中分区。关中分区保安科接替曲继先负责外勤组的组长秦平，还根据杨宏超所提供的情报，编写整理出《中统陕室特特务一瞥》，上

报给中央社会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安瓜。

1940 年 10 月到 1943 年，张占英、杨宏超共搞回敌人的机密文件 50 余份，这些文件中，既有原件，也有抄件，而且大多数是经由杨宗耀之手交给关中分区。这些文件为边区反摩擦斗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40 年到 1942 年，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奇缺，杨宏超利用“中统专干”的特殊身份，为延安搞到不少急需的物资、器材、武器。杨宏超、杨宗耀叔侄也得到关中分区几次物质重奖，杨宏超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也因此和杨家叔侄到杨氏家族结下了战斗友谊，直至晚年。

可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杨宏超被康生一伙称为“双重间谍”，叫回边区，加以逮捕，作为典型，到处“示范”。杨宏超被逮捕的第二天，西安中统特务机关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派一个师长到旬邑县组织职田镇特务据点进行调查。西安方面还向重庆呈报，“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专员。”

杨宏超“中统特务案”，在延安“抢救运动”后期的甄别平反中也没有给作出正确结论，直到 1949 年 1 月，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保安处才对杨宏超加入“中统”的真相和来拢去脉作出组织结论。可是，到 1962 年，杨宏超“中统特务案”又成为打向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一块硬石头。这宗“中统特务案”的彻底平反则是到了 1981 年 4 月，前前后后拖了近 40 年时间。

## 二、柳林客栈

柳林是耀县县城以北 20 多公里处沮河西岸一个小镇，仅有 300 余户人家。此地因柳树茂密成林而故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南部的商业重镇，西边 10 公里处便是照金。处在照金苏区的东部边界线上。

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央社会部、陕甘宁边

区保安处、关中分区保安处和陕西省委在柳林镇建立了各种秘密据点，以不同的身份和形式秘密开展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前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柳林镇南通国统区西安，向北约 50 公里就是中共关中分区党委和陕西省委所在地新正县马栏镇，继续向北，通往延安，是横贯陕甘宁边区南北走向的一条交通要冲，也是日用品和土产山货的集散地，许多重要物资、器材、设备、人员、情报，从这里秘密通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国共双方在柳林对垒扎营。柳林镇所辖区域最南边，距耀县县城仅 10 余公里，国民党在这里搞碉堡群，筑成长线形的母碉、子碉群，贯以地沟，围以鹿砦等障碍物，在交通要道、险要关卡，设有盘查哨所。碉堡居高临下，火力相互支援，胡宗南先后调其嫡系部队八十师、一二三师、一六五师及杂牌军骑二师防守。

国民党当局以碉堡封锁，重兵把守的同时，在柳林还设有各种便衣特务组织约 40 多个，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情报工作。如西安绥靖公署特调组、宪兵司令部谍报组、国防部通讯组、保安司令部谍报组、三十七集团军谍报队、二区专署调查统计室、教育界特教组、党政军警联合检查站、渭北调查统计室、陇海铁路特别党部、邻洛区动员指挥部、保安旅团便衣队等。这些特务组织发展利用的对象，大都是些无恶不作的兵痞、流氓、土匪、地主、恶霸之流。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在柳林镇也设立了相应据点，以不同的身份和形式开展工作。其中有中央社会部对外情报联络站、延安保安处外勤组、关中保安处外勤组、淳耀县检查站，军队系统的有联防司令部驻柳林情报站、关中司令部侦查据点。另外还有中央农委驻柳林交通联络站、中共陕西工委驻柳林交通联络据点和情报联络站等。他们担负着国统区的情报搜集、联络、策反及对国统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和出进边区人员的接待工作，并对保安团进行统战作，利用保安团集体武装经商，向边区采购运送弹药、棉花、药品、通讯器材、钢铁、铜锡等急需物资。这些联络据点对外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的

以经商为名，有的开设客栈，有的冠以军事机构名称，有的以税务检查为名，还有中央到地方党、政、军、民、学、合作社、贸易公司设在柳林的生产基地，总之，身份形形色色，任务各有不同。由于柳林地域特殊，机构繁杂，经济繁荣，被人称誉为“小上海”。

在这种情况下，“柳林联合客栈”便应时而生，它是关中地委(此前为关中分委)在此建立的秘密据点，其前身是民生客栈(1940 年开设)，归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 年改为联合客栈，后归陕工委领导，张仲平担任客栈经理。1945 年夏，张仲平调任耀县工委主持工作，并将部分交通和情报联络工作转移到耀县工委，客栈继由邢子舟、刘永端负责。

柳林联合客栈以它特殊地理位置和工作条件，在这个红白交界的咽喉地带，以经商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柳林联合客栈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接送干部南下北上，还肩负着搜集传递情报，做国统区统战工作，利用统战关系和保安团集体武装经商，帮助根据地购买运送弹药、棉花、药品、食盐等紧缺物资和军需用品。客栈负责人多达 5 人，对外都以经商和接待过往客人为名，实际上任务各有不同。张仲平担任经理，副经理李甦生主管中央社会部驻柳林情报联络站工作，副经理徐晓东负责陕西西府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副经理陈效真负责商洛地区地下党交通联络工作，江平负责陕工委情报工作。他们虽然同住一个客栈，但共同遵守着党的工作纪律，各自不知对方的具体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他们才知道当时各人担任的工作任务。

1949 年陕西全省解放，柳林联合客栈也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对革命事业做出的特殊的、突出的、重要贡献永载史册。

### 三、地下交通线

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历经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前夕，中共陕西地下党，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全省范围内，开辟了纵横南

北东西的若干地下交通线(亦称红色交通线)，六七十个秘密联络点，这些交通线和联络点有时被敌人破坏，特别是1933年7月袁岳栋、杜衡叛变后，破坏更为严重。但是，有破坏，就有重新开辟和建立，始终生生不息，从不间断。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边区各项工作受阻，党中央为沟通与关中、西安、陕北乃至全国各地的联系，掌握敌情，关中分区先后在周边地区或与分区接壤地带的柳林、陈炉、冯家桥、新裕煤矿等地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两个联络点，八条地下交通线。一个地下交通站是新裕煤矿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孙英。两个联络点分别是冯家桥联络点，负责人冯明学。柳林联合客栈联络点，负责人先后有张仲平、邢子舟、刘永瑞。八条地下交通线：一是云阳(泾阳)洪水(富平)野狐坡(耀县)陈炉镇(同官)何家原(宜君)；二是柳林(耀县)老池(耀县)王堵村(耀县)冯家桥(耀县)；三是西安曹村(富平)同官边区交界处；四是固贤村(耀县)西原顺沟畔(耀县)庄里镇(富平)；五是文王山(耀县)武王山(耀县)韩古庄(耀县)黄堡镇(同官)冯家桥(耀县)惠家原(耀县)庄里镇(富平)；六是北大街大莲花池街7号(西安)东九府街58号(西安)黄堡镇史家原(同官)柳林、马栏；七是西安泥阳堡(耀县)照金薛家寨(耀县)；八是柳林南原过封锁线耀县坐火车南下西安。

在各个交通线上，先后在富平县洪水头、连村、庙沟堡、米家堡、赤兔坡、狼窝村、王家湾、庄子村、朱家堡、侯家堡，耀县申家河、鱼池村、陈家原、咀子村，同官县的陈炉镇、王益村，黄堡镇史家原等地建立了多处交通联络据点。联系据点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或者贫雇农，后来把据点扩大到一些统战对象家里。

这些地下交通站、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线与边区紧密配合，克服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护送大批干部南来北往，传递情报，接收转运物资，还有统战、策反等工作，有力地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特别是中原突围部队到达陕南后，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任质斌等安全通过交通线返回边区。汪锋通过交通线过关中到达陕南。作为秘密地下交通线，其交通

向导、行走路线、掩护据点至关重要，联络员的忠诚关系到全局安全，为此，关中分委、关中地委、陕工委对交通向导的选择十分重视，选择了一批忠于党、忠于人民，久经生死考验、机智勇敢、熟悉地理，了解国统区情况的，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联络员，如梁其昌、冯(封)如春(为了隐蔽，两个名字都曾使用)、孙肖明、冯明学、孙英、郇宝善、李积成、单志诚、李盾章、刘安等，他们不图名、不为利、不畏强敌、敢冒风险、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 第十二章

#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中分区

### 第一节关中分区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1945年8月，经过人民浴血奋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华民族也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国家，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种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维护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以假和谈作烟幕，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势力。在时局变化的紧要关头，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而进入了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全国解放战争的新时期。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战争准备，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集团调集30万大军，以进攻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所在地湖北省宣化店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依恃其掌握的全国行政权力，军队数量、武器精良等优势，企图速战速决，消灭全部人民武装力量。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武装自己”的口号。为了能够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

策，其目的是制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在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自卫作战不断赢得胜利。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至 1946 年年底，人民解放军在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积极防御方针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而在全国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

1947 年 3 月，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是陕甘宁边区，企图消灭和瓦解中共首脑机关和指挥中心。1947 年 2 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胡宗南 15 个旅，马鸿逵、马步芳 3 个整编师，邓宝珊一个军，共计 35 个旅、25 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进行“围剿”。而进攻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陕甘宁边区南端的关中分区。保卫关中分区就是保卫中共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是关中分区党和人民群众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光荣任务。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关中地委领导关中分区所辖的中共新正、新宁、赤水、淳耀 4 个县委和双龙镇中心区委，面对胡宗南军队的重兵包围攻击，依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及时发出《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号召解放区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以自卫战争保卫边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指示，恢复和发展国统区的中共组织，不断壮大国统区的中共力量；积极开展政治斗争，尽力争取和平民主；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解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 第二节解放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党政军群组织

中共关中地委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机关仍驻马栏镇。抗战胜利初期，关中地委主要以边区工作为主，而所辖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还没有完全从隐蔽状态下恢复起来。

1946年1月，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加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组织的工作，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汪锋，负责国统区党的工作。关中地委只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和双龙镇中心区委。

1947年春，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2月19日，中共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马栏失守。3月7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为新的关中地委，并在关中地委设立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专事国统区工作。合并后的中共关中地委先后驻高窑子、金盆、庙湾和宁县五亭子等地，直到8月24日关中分区驻地马栏收复，关中地委机关才迁回马栏。新的关中地委除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和双龙镇中心区委外，还领导国统区原中共陕西省工委所辖的中共组织。1949年4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电示中共关中地委：自4月4日起中共关中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地委。至此，关中分区完成了其12年的历史使命。

## 二、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抗战胜利后，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仍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关中分区驻地马栏，关中分区专署随部队进行游击战争，直到8月马栏收复后专署才迁回。1948年，随着关中分区游击战争的不断胜利，关中分区专署除领导新正、新宁、赤水、淳耀、中宜等6县区外，还领导国统区旬邑、三原等9县人民政权。1949年4月，关中分区专署改为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 三、关中军分区

1945年8月，警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军分区，先后隶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后，企图打通咸榆公路，封锁黄河，消灭中共主力于陕北，对关中分区进行反复“清剿”。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对敌作战，中共关中地委将关中国统区划分为西府、渭北、直属3个游击区，开

展游击战争，以摧毁胡宗南部在关中的军事力量，给胡宗南部以有力的牵制和打击。并将原由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的西府游击总队、渭北游击总队等改属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领导。9月，关中军分区决定成立了路东临时指挥所。1948年2月，路东临时指挥所改为路东游击总队。是年初，高锦纯奉命率领警备第一旅大部离开关中分区，关中军分区部队仅留一个警卫连和西府、渭北、路东3个游击总队。4月，西府游击总队划归中共西府地委、西府军分区领导。6月，路东游击总队改属中共黄龙地委、黄龙军分区领导。1949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将关中军分区改为三原军分区。

#### 四、关中分区青工妇组织

关中分区青年联合会于1946年6月成立，隶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联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于1948年7月成立，归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年团筹委会、西北局青委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年团组织。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原分区筹委会。关中分区工会、关中分区妇女联合会自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后一直开展工作，1949年4月分别改为西北总工会三原分区办事处、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三原分区办事处。

### 第三节 关中分区所辖县党政军群组织

#### 一、党的组织

中共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委自成立历经抗战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由于国民党军对关中分区的进攻，淳耀县党政机关于师家道突围后，县委工作中断。3月建立了中共淳耀县临时工委，5月恢复了中共淳耀县委。1949年2月，淳化县解放，中共赤水县委改为中共淳化县委，白天民任书记，县委共辖11个区委。3月，中共淳耀县委撤销，其所辖党组织分别划归中共淳化县委和中共耀县县委。4月，中共淳化县委改属中共三原地委领导。不久，原

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中共新正、新宁县委划归中共陇东地委领导，原新正县之马栏、阳坡头、底庙、湫坡头 4 个区委划归中共旬邑县委领导。

## 二、政权组织

1945 年秋，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更名为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人民政府。10 月，淳耀县召开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经纬、封正宝为县参议会议长和县人民政府县长。1949 年 3 月，淳耀县参议会、县人民政府随县建制撤销，其工作人员和所辖区乡政权分别划归淳化县和耀县。1946 年 1 月，新正、新宁县分别召开了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及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候补议员。2 月，赤水县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选举郭文学、王振喜为参议会议长和县人民政府县长。1949 年 2 月，赤水县人民政府改为淳化县人民政府。4 月，关中分区改为三原分区后不久，原属关中分区领导的新正、新宁且划归陇东分区，原属新正县之马栏、阳坡头、底庙和湫坡头 4 个区划归旬邑县管辖。

## 三、军事组织

新正县 1945 年 8 月建立的县保安大队，于翌年 11 月改为县独立营；1949 年 2 月将各区游击队组建为县警备队；1949 年初组建的县保安大队。新宁县 1946 年 6 月建立的县保安大队，于翌年 4 月改为县游击大队部；1946 年 7 月由 200 余名精干民兵组建了县独立营。赤水县抗战时期建立了 60 多人的县警卫队；1945 年 8 月建立了 80 多人的县游击队；1947 年 3 月由县、区游击队组建了 300 余人的县独立营，1948 年 8 月编入警一旅二团。淳耀县 1946 年 6 月组建了淳耀县游击大队部，1949 年 3 月随县制撤销后改编。

## 四、群团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新正、新宁两县均成立有县工会、县青年联合会(青年救国会)和妇女联合救国会等组织。赤水县青年抗日救国会、赤

水县妇女联合救国会成立于抗战时期，1947 年 1 月分别改为赤水县青年工作委员会、赤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 年 4 月，赤水县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分别改为淳化县青年委员会和淳化县妇女委员会。

## 第四节关中分区的保卫斗争

### 一、关中突围保存实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对关中分区不断发动武装进犯，进而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46 年夏，针对国民党军不断在关中分区边境增修碉堡，加强军事部署的态势，中共关中地委要求全区军民紧急行动起来，整训部队和民兵，开展游击战争，争取保卫关中自卫战争的胜利。关中专署机关、分区各县也先后举办爆破训练班，使广大干部群众掌握雷管、地雷、土雷和炸弹等爆破技术，实行全民皆兵。经过与敌斗争，打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分区军民从 1946 年 8 月至 1947 年 2 月上旬，毙伤俘敌 1700 余人，平毁碉堡 40 余座、封锁线 75 公里，收复了 30 多个村镇，解放边境群众 3 万多人。

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节节失利，被迫放弃了战略上的全面进攻，改为对解放区东西两翼，即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首先占领这两个解放区，然后调集兵力在华北同解放军主力决战。2 月 14 日，胡宗南在三原县召开了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从陕西、豫西、山西等地调集 8 个旅 5 万之敌到关中地区，并于 2 月 18 日分五路对关中分区发起突然进攻。具体部署是以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为总指挥，率整编一六五师从正面(北线)由宜君之焦平镇经凤凰山，沿杨家店子向关中分区的驻地马栏镇突进；西线由廖昂指挥，率整编七十六师 3 个整编旅由正宁县之山河镇沿山梁向东疾进；东线由钟松指挥，率整编三十六师 3 个旅由宜君之建庄沿山梁向西突击；企图从关中分区后方最窄处子午岭之雕灵关

为合拢点，截断解放军退路，然后四面围攻，占领“囊形地带”。

在敌人数倍于己的情况下，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决定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迅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向陕北的黄陵(1944年改中部县为黄陵县)、富县转移，以保存力量，待机歼敌。并以警一旅三团在照金地区及其附近杨家店子、庙湾、衣食村一线阻击北进之敌，关中分区独立营与警三旅七团在阳坡头阻击西线进攻之敌，新四旅在石底子以北地区阻击东线之敌，以掩护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转移。

2月17日晚，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撤防马栏，18日拂晓，分区机关和警二团在阻击部队的掩护下，经石底子、转角、雕灵关安全转移至黄陵县上畛子以及富县之槐树庄地区。正准备在衣食村(杨家店子正南方)一线抗击进犯凤凰山之敌的警三团，于2月17日午后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二营归关中分区南线指挥部指挥，其余部队于2月18日拂晓前越过雕灵关。团长葛海洲、政委曹光之遂于黄昏将部队撤离阵地，经一夜急行军到马栏上川五沟口时，得知分区机关和部队已安全撤离，于是率部向北边的雕灵关方向转移，拟经北山绕过雕灵关突出合围圈。当部队疾行30余里，登上子午岭时，发现东西对进之敌已在雕灵关合拢，山岭上燃起一堆堆篝火，背后的马栏河川里枪声大作。此时天将破晓，在这危急关头，团长、政委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在沟壑密林中隐蔽。夜里，在当地回民游击支队的引导下，从敌人合围圈的空隙中脱离险境。10天以后，二营也在群众帮助和游击支队的配合下突围出来，与团部在上畛子地区会合。至此，胡宗南扎“囊”占领关中地区的阴谋破产。

主力部队撤走后，南线指挥部留在赤水、淳耀地区，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转战月余，共歼敌300余人。

关中突围的胜利，掩护了关中分区党政军机关的安全转移，保存了有生力量，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虽然暂时失去了关中分

区部分地区，但却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使其因占据了一些空城和据点而背上包袱，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主力作战。

## 二、七战七捷收复失地

国民党主力部队合围关中分区失败后，1947年2月28日，廖昂指挥合围关中分区的西线主力部队开始进犯陇东分区；刘戡、钟松指挥的东线主力部队大部调至洛川至宜川一线。3月11日，胡宗南亲自到洛川进行作战部署，拟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7个旅为右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为左路，向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大举进犯。

针对关中敌人相对减少有利时机，联防军司令部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决定由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率警一旅三团、二团和警三旅五团南下关中，先收复关中分区失地，然后以关中分区为依托，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同时决定由警一旅三团一、三营(二营当时在宜君没有归建)共600余人组织先遣队，任命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为先遣队指挥，关中地委副书记杨伯伦为先遣队政委，主要任务是会合在关中分区的南线指挥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恢复地方政权，配合保卫延安的主力部队作战。

第一捷，收复庙湾。3月16日，即敌人大举进犯延安的第三天，收复关中分区战役正式打响。先遣队从旅部驻地黄陵县上畛子出发，从敌四十八旅驻地正宁县山河镇西侧偷越封锁线，经湫头塬、三嘉塬继续南下至阳坡头，再向东南前进到赤水县中嘴，越过摩天岭抵达照金附近。沿途到处是敌人的正规军和据点，先遣队只好白天隐蔽，晚间行军。最后经侦察得知，占据淳耀县重镇柳林和庙湾是还乡团和保安队驻守，兵力不强。于是先遣队决定先打庙湾，再取柳林。3月20日晚，先遣队向庙湾之敌发起突然攻击。敌保卫队一个连在先遣队猛攻下惊慌失措，放弃据点向耀县逃去。庙湾即被收复。

第二捷，攻克柳林镇。3月21日，先遣队南下急行军20余公里，中午到达柳林后，突然向柳林外围之敌发起进攻。防守柳林的还乡团

见“大军”压境，抵抗一阵后，便向墓坳塬方向仓皇撤退。先遣队乘势攻入镇内，敌大部被歼，少数逃窜，柳林即告收复。

第三捷，高尔塬遭遇战。柳林战斗结束后，先遣队及时南下，于当晚宿营于柴场子、白林、杨塬西村一线。3月22日凌晨，由耀县增援柳林之敌八十三旅2000余人追踪而来。先遣队迅速向西转移，下午2时，部队经高山槐撤向高尔塬时，迎面与敌陕保四团300余人遭遇。高尔塬右为石山，是部队西进的必经之路。在三面受敌的紧急情况下，指挥员当机立断，急令配合作战的南线指挥部三营九连占领高地，阻击侧后之敌八十三旅，主力部队迎头痛击正面之敌。以先遣队三营九连向南抗敌，一营和七连从正面展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连克3个山头阵地后，敌人便溃不成军。除100余残敌潜逃外，其余全部被俘、被歼。八十三旅也被击退。

第四捷，铁王镇攻坚。1947年3月23日，先遣队西行70余里到达桃曲河，准备在此宿营。随后接到赤水县政府报告：敌陕保七团一营当日侵占照金西边的铁王镇，企图建立据点和政权。先遣队当即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将其消灭。遂令部队午夜出发，到达铁王时，南线指挥部一个连夺取街西碉堡，堵敌西逃；一个连向南警戒，一个连向通润方向警戒，防敌增援；先遣队以警三团二营为主攻，第一步夺取城墙，而后配合该团一营及南线指挥部消灭街内之敌。战斗打响后，先遣队和南线指挥部同时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不到半个小时，警三团三营九连首先从北边冲入镇内土围子，敌人一个重机枪连机枪都未来得及架就全部被俘，城墙被九连控制。警三团三营七连和南线指挥部也顺利拿下镇东、西碉堡。面对解放军的突然袭击，敌人一边拼死抵抗，一边向镇北巷突围，被警三团一营堵回，遂又掉头经桥上向西突围，遭到南线指挥部的迎头痛击。刘懋功、葛海洲指挥警三团一、三两营乘机向敌后和两侧猛插，将敌分割包围，激战两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包括敌淳化县两个保安队在内，共毙伤敌人80余人，俘虏500余人。这次战斗是先遣队南下关中之后打的较大的一个胜仗，粉碎了敌人在这里建立据点和政权的企图，震慑了占

据赤水地区的敌军。照金地区及其周围的马家山、晨，由耀县增援柳林之敌八十三旅 2000 余人追踪而来。先遣队迅速向西转移，下午 2 时，部队经高山槐撤向高尔塬时，迎面与敌陕保四团 300 余人遭遇。高尔塬右为石山，是部队西进的必经之路。在三面受敌的紧急情况下，指挥员当机立断，急令配合作战的南线指挥部三营九连占领高地，阻击侧后之敌八十三旅。主力部队迎头痛击正面之敌。以先遣队三营九连向南抗敌，一营和七连从正面展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连克 3 个山头阵地后，敌人便溃不成军。除 100 余残敌潜逃外，其余全部被俘、被歼。八十三旅也被击退。

第四捷，铁王镇攻坚。1947 年 3 月 23 日，先遣队西行 70 余里到达桃曲河，准备在此宿营。随后接到赤水县政府报告：敌陕保七团一营当日侵占照金西边的铁王镇，企图建立据点和政权。先遣队当即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将其消灭。遂令部队午夜出发，到达铁王时，南线指挥部一个连夺取街西碉堡，堵敌西逃；一个连向南警戒，一个连向通润方向警戒，防敌增援；先遣队以警三团二营为主攻，第一步夺取城墙，而后配合该团一营及南线指挥部消灭街内之敌。战斗打响后，先遣队和南线指挥部同时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不到半个小时，警三团三营九连首先从北边冲入镇内土围子，敌人一个重机枪连机枪都未来得及架就全部被俘，城墙被九连控制。警三团三营七连和南线指挥部也顺利拿下镇东、西碉堡。面对解放军的突然袭击，敌人一边拼死抵抗，一边向镇北巷突围，被警三团一营堵回，遂又掉头经桥上向西突围，遭到南线指挥部的迎头痛击。刘懋功、葛海洲指挥警三团一、三两营乘机向敌后和两侧猛插，将敌分割包围，激战两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包括敌淳化县两个保安队在内，共毙伤敌人 80 余人，俘虏 500 余人。这次战斗是先遣队南下关中之后打的较大的一个胜仗，粉碎了敌人在这里建立据点和政权的企图，震慑了占据赤水地区的敌军。照金地区及其周围的马家山、蒋家山、十里塬、官庄、土桥等其他据点的敌人，为了逃避被歼的命运，纷纷逃往别处，赤水全县遂被收复。战后，联防军司令的命运旅参谋长刘懋功、警三团团长葛海洲和警三团通报嘉奖。

第五捷，智取细嘴子。铁王战斗后，先遣队正准备横扫封锁线残敌，扩大战果，即接到高锦纯旅长转来的彭总、贺总急电：由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统一指挥警三旅五团、骑六师和警一旅作为游击兵团南下关中作战。令先遣队急速北上，拔除沿途据点，打通主力部队南下关中的通道。接到命令后，刘懋功、杨伯伦率部北上进入正宁县，再经石门关进抵职田镇北长舌头塬后掌村，并在此研究决定先拿下位于正宁县三嘉塬的细嘴子据点。该据点是联防军主力部队南下的必经之路，位于三嘉塬伸出的狭长地带，鞍部顶端凸起的山嘴上，其东、西、南三面都是悬崖绝壁，仅东北面有一条数米宽的小道可以进出。敌人在接近碉堡的最窄处挖了一条深宽各一丈的横断壕沟，人员进出用吊桥接送。盘踞在这里的是近百名还乡团匪徒组成的保安团队，他们在外号叫“活阎王”，的团总带领下，奸淫掠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为了长期侵占，负隅顽抗，他们还修筑了子母碉堡群，火力可以相互支援。对此，先遣队令警三团副团长李荣芝带一营担任主攻，令三营预伏在后掌村至神崖沟方向，警戒和抗击职田镇可能来援之敌。3月28日，警三团对细嘴子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部队只能进行枪战、炮战，无法接近。刘懋功果断命令部队，一边同敌人进行火力战，一边用挖对壕的办法，一步步接近敌人据点。第三日，对壕作业逼近敌人碉堡，敌人开始动摇，遂派人乘夜送信给细嘴子以北的湫头据点，请求支援，被截获。旅、团首长将计就计，令一营三连连长贾德全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营长，全连换成国民党军服，从湫头方向一路鸣枪打炮，“气势汹汹”而来。周围据点的一、二连连放一阵空枪，佯装向两侧退却，在西坡子西边布下“口袋阵”。贾德全利用敌地方部队怕正规部队的弱点，指挥三连明火执仗地走向碉堡，并命令出来迎接的敌队长回去带人一起追击共军。当敌人冲出据点进入“口袋阵”后，贾德全一枪把敌队长击毙，并迅速带领全连从敌后面包抄上去，一、二连从两面夹击。96个匪徒无一漏网，其中90人被击毙，6人被俘虏。

第六捷，固守细嘴子。智取细嘴子战斗刚一结束，驻旬邑职田镇之敌正规军5个连向先遣队发起报复性反扑。旅、团首长令三营一个

连占领长舌头、后掌村地区，令新正县独立营占领雷庄至后掌村之间地区，联合从正面抗击敌人；令一营和三营另外一个连从敌人侧后迂回攻击。敌一部被歼，其余狼狈逃窜。新正县独立营营长高步云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细嘴子战斗的胜利，给职田镇窜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致使驻守在附近据点的敌人闻之惊恐，驻湫坡头之敌正规军遂弃城向旬邑县城逃跑，驻山河塬上之敌也退到了山河镇内，先遣队圆满完成了保障主力部队南下关中的任务。

第七捷，小塬子歼敌美械营。1947年4月2日，先遣队与南下的主力部队会师，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警一旅旅长高锦纯(关中地委书记兼政委)率旅部、警二团、警三团二营及警三旅五团和关中地委机关重新回到了阳坡头西坡村。当日，南线指挥部报告：有四五百敌人正在照金搜山清剿。王世泰随即决定由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旅政治部主任左爱率警三团和警二团南下迎敌，同时南线指挥部和两个营也归其指挥。4月4日，敌500余人从石门关沿戴家山梁向照金一带行进。刘懋功、左爱、葛海洲等旅团长首先研究决定：警三团二营进至小塬子、马曲一线，控制山梁，堵截敌人，防其沿河川经连家河向旬邑逃窜；警三团一营和团炮兵连后置于二营左侧，并肩占领小塬子至郭家掌一线，打击敌侧背，防敌登塬向职田方向逃窜；警卫团三营和警二团进至七界石前梁山头，防敌向七界石方向窜犯，待敌通过后，断敌退路。

敌军是国民党正规军八十三旅二四八团三营，共600余人，是全套的美式装备。他们仗着人多，武器装备精良，以为这一带没有解放军正规军，只有游击队，所以大摇大摆地行进，丝毫没有戒备。当敌人先头部队进至小塬子村边时，二营六连抢先占领该村南塬畔有利地形，向敌人开火。敌营长未完全意识到自己已进了伏击圈，只当是游击队的袭击骚扰，就指挥全营向小塬子高地发起攻击。六连指战员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败下阵来，又反复组织冲锋。四连、五连占领有利地形，配合六连打退了敌人进攻，激战1个多小时，敌人也未能接近小塬子一步，方知碰上解放军的正规军，并已经

陷入了埋伏圈。在退路被截断的情况下，敌军孤注一掷，集中火力，妄图打开一个缺口突围。同时又用一个连的兵力向小塬子左翼包抄，企图分散三营的兵力。因敌我兵力火力相差悬殊，六连阵地逐步被敌人突破，指导员王良牺牲，崂脸被敌人占领，敌人嚎叫着向塬畔冲来。在这危机关头，三团副团长李荣芝率四连堵住了敌人，一营也及时赶到，并猛攻敌人右翼。团长葛海洲指挥炮兵连从两个方向对杜梨树附近的敌指挥所炮轰，敌营长被当场炸死，副营长被炸成重伤。紧接着又把炮火转向敌群。在炮火打击下，敌失去指挥，乱了阵脚。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警三团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装备精良的美械营。除十几个敌人漏网之外，共毙伤敌人100余人，俘虏5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2门，六。迫击炮9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7挺，战防枪3挺，六0火箭筒2具，司登式冲锋枪、步枪300余支。

小塬子战斗是收复关中过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给占领关中地区的敌人以决定性打击。战后，联防军司令部给刘懋功记大功一次，给警三团记大功一次。建国后，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把小塬子战斗作为典型战例编入《步兵团战例选编》，向全军作了介绍。

在收复关中失地作战中，警一旅从1947年3月20日打庙湾第一仗开始，到4月4日小塬子大捷为止，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转战250余公里，七战七捷，歼敌2000余人。残存据点之敌闻风逃遁，企图长期控制关中分区政治、军事中心马栏镇之敌陕保六团也弃地逃跑，敌整团整营的正规军再也未敢轻举进犯。至此，关中分区的淳耀、赤水、新宁、新正4县全部收复，分区党政机关恢复正常。收复关中失地比原计划时间缩短了一半，它与西北野战军主力进行的青化砭、羊马河之战遥相呼应，极大地增强了关中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 三、破袭成榆公路牵制胡马

收复关中以后，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保卫延安，根据彭总“破坏咸

榆公路，切断胡宗南集团在陕北的后方供应线”的指示，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令警二团作为机动部队留在关中分区，协同关中分区独立营和游击队，主要对付西峰、宁县、正宁和旬邑、淳化、耀县方向之敌新一旅、四十八旅和整编第十师，保卫和巩固关中分区。西府纵队和渭北纵队分别在永寿、三原方向活动。警一旅旅部及其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则在王世泰的指挥下，向关中外围出击，破坏咸榆公路及其附近要点，在敌后牵制敌人。

**智取隆坊切断公路** 1947年4月下旬，警三团从正宁县之秦曲塬出发，经刘家店子、双柳树，于第四天到达黄陵县西北之店头镇(七里镇)。根据王世泰的命令，由刘懋功率警三团一、二营攻取隆坊镇；由警一旅副政委牛书申率警三团三营到黄陵县城以南执行破路任务。隆坊镇属黄陵县，位于县城以北15公里的咸榆公路附近，驻有敌人的一个保安中队，城高壕深，易守难攻。经过仔细研究敌情、地形，刘懋功、葛海洲决定采用智取细嘴子的办法，命二营包围隆坊镇以北的普乐寺，制造黄陵县城之敌北上曾援路经隆坊之假象。命一营化装进行智取。23日，一营化装成敌三十六师独立三团，并准备了一份伪公文，只见全营干部战士一身小塬子战斗中刚缴获的国民党美式军服，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卡宾枪，佯装由店头追剿游击队，沿咸榆公路大摇大摆地向隆坊镇开去。当部队到达隆坊镇城南门时，敌守门哨兵见是其正规军，未敢开枪，却拦住了部队去路，进行盘问，三连连长贾德全回答得干脆利落。敌带哨的小头目仍不让进，贾德全一边骂骂咧咧，虚张声势，一边掏出伪公文。敌哨兵果然被蒙住，恭恭敬敬地打开了城门。战士们顺势下了敌哨兵的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城内。没费一枪一弹，将敌保安中队以及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到隆坊的巡视员、镇公所职员共100余人全部俘虏。

与此同时，牛书申率三营南下至黄陵县城西南的王家沟、仙马集一带。在群众的帮助下，炸坏了宜君至黄陵之间的偏桥镇桥梁和涵洞，挖断路基，将黄陵以南至宜君之间约30公里的咸榆公路彻底破坏，使敌人的后勤运输线陷入了瘫痪。

4月28日，警三旅五团在焦坪全歼夏玉山反动民团102人(毙20人，俘80人)，为当地人民彻底铲除了为非作歹多年的祸害。

**击溃敌骑兵攻克耀县县城** 智取隆坊，消灭夏玉山民团以后，王世泰率警一旅三团和警三旅五团改变了准备攻取黄陵、宜君的计划，决定南下夺取敌人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耀县县城。1947年5月3日，警三团和警五团进入耀县境内时，敌驻铜川(1946年由同官更名)骑兵第一旅约1个团经耀县向其西北的王家砭、上安村一带进犯。当警三团从文王山、武王山中间秘密南下时，与进至柳林南下的敌骑兵在阿姑社村附近遭遇。刘懋功、葛海洲迅速命令一营占领阿姑社村附近有利地形，击退敌骑兵数次冲击，一营营长庞希贤英勇牺牲，三连连长贾德全代理营长指挥战斗。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之际，三营从塬上向敌人翼侧猛冲下来，一营随即从正面向敌人发起反冲击，将敌人击退。共毙伤敌100余人，缴获战马近百匹。

敌骑兵被击溃，为攻克耀县县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耀县县城是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后勤补给基地，敌陕西保安七团和八十三旅辎重营等2000余人驻守。城防工事坚固，外围东西两侧有河，在城门楼和城内的制高点钟鼓楼上都设置有火力点，城内有多处暗堡。县城南北有分别通向西安和铜川的铁路，一旦战斗打响，驻铜川的敌骑兵旅和驻渭北国民党军可随时支援耀县。为保证攻取耀县县城的成功，王世泰决定采用突袭战术，速战速决。由警三团三营配合警五团主攻耀县县城；警三团一、二营在咸榆公路上泥沟子一带构筑工事，阻击铜川方向可能来援之敌；渭北纵队在耀县县城东南破坏公路，以阻击西安、富平方向之敌援军；西府纵队部署在耀县县城西南，防止西边的小丘和南边的三原之敌，把敌人增援的来路全部截断，造成在耀县县城“关门打狗”的态势。同时命警一旅侦察分队炸毁了金锁关至铜川间的公路桥梁和涵洞，然后虚张声势，作出佯攻铜川的假象；关中分区南线指挥部防守阿姑社村一带，保障后方交通。5月5日凌晨，警三旅五团和警一旅三团三营从耀县东北角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敌人在睡梦中被惊醒，仓促应战，敌耀县专员兼保安司令阎崇师

少将被警五团活捉。而后攻城部队与敌人展开巷战，至傍晚，警五团相继攻入敌保安团团部、八十三旅辎重营营部、县政府及钟鼓楼制高点；警三团三营相继占领了耀县火车站和县城东边的药王山制高点；警三团、一营也胜利完成了阻击铜川之敌的任务。

奇袭耀县县城，共歼敌 1500 余人，其中警三团俘敌 2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70 余挺，步枪 1500 余支，以及包括武器、弹药、被服、布匹、药品、现金在内的大批物资器材。此次战斗，是警一旅首次攻克关中地区铁路沿线上的县城，使敌人的后方补给线一度中断，胡宗南集团大为震惊。这次战斗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陕北三战三捷之蟠龙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参战部队和关中军民的士气。战后，彭总给警一旅通令嘉奖。

强攻小丘轻取旬邑耀县大捷后，部队第二次出击渭北，计划攻取三原、富平和白水 3 座县城，然后取道宜君、黄陵之间返回马栏。王世泰决定首先拔掉横在前进道路上的小丘据点。这一据点是敌人窜扰边区的重要据点，位于耀县以西 15 公里处，守敌是国民党陕西保安四团的一个中队 80 余人，战斗力较强，队长高彦龙是个作恶多端的反共惯匪。警一旅三团奉命偷袭小丘，团长葛海洲决定由一营一个连进至香坡、南石头，三营进至龙石镇，随时准备击退从柳林或耀县增援之敌；由二营担任主攻小丘。1947 年 5 月 13 日下半夜，部队由淳化方里镇出发，经 10 多公里的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前各营到达了指定位置，二营四连突击队则悄悄抵至小丘城外一敌分队长所驻的院子。此时，一名战士慌忙地投出一颗手榴弹，城内外敌人顿时被爆炸声惊醒。部队偷袭不成，遂改为强攻。因敌人平时已有准备，突击队冲击到城墙下，就陷入敌人埋伏的炸弹网内，造成十几名突击队员伤亡，其余队员被迫退守到城墙下面的一处房子内，待机出击。三营五连配合四连迅速从南面向敌人发起攻击，但因地形开阔，敌人火力密集，猛冲数次，均未成功，战斗呈现出胶着状态。参谋长刘懋功及时赶到，即令停止进攻，并与葛海洲团长一起重新调整了兵力、火力：主攻方向由城南改到城东北角，由三连担任突击队，从正面突击；五

连由南向北，四连由东向西，两面夹击。下午，部队向敌人重新发起攻击，全团的六0火箭筒、迫击炮、战防枪对准城东北角的碉堡和寨墙猛烈轰击，三连在炮火的掩护下，乘机登上城墙，敌人在慌乱中组织反扑，四连迅速从三连左侧赶了下来，巩固了三连阵地，五连也飞快地攻至城下，敌即刻土崩瓦解。包括高彦龙在内的80多名守敌被歼，其余被俘。

拔除小丘据点以后，部队得知西北野战军主力将向陇东进军。警一旅和警三旅奉命改变了出击渭北的计划，向关中分区西部、新宁、新正一带进发，以配合野战军主力同胡、马军的作战行动。5月21日，王世泰、高锦纯、刘懋功等领导率警一旅旅部和警三团会合警二团到达旬邑县东北部的崔家河，拟夺取旬邑县城。守城的是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和县政府保警队，其中自卫大队长马志超是地下党员。遂通知马志超率部起义，配合攻城。22日，警三团奉命包围了旬邑县城。其部署是三营在城南门担任主攻；一营在城东门担任助攻；三营在城北设防，切断敌人退路；警二团向西警戒。当夜，马志超率部起义，把全大队200余人调至城外西堡子。攻城信号发出后，马志超打开县城南门，部队迅速攻入城内。城西北角的敌保警队负隅顽抗，全团炮火向其猛烈轰击，敌立刻缴械投降，旬邑县城第二次回到人民手中。战后，新华社通讯社播发了马志超率部起义的消息，200多名起义官兵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中纵队旬邑支队，马志超任支队长兼旬邑政务委员会主任。

九岷塬雕灵关警一旅警三旅扫清了关中分区境内之敌，破坏了咸榆公路，又连克耀县、旬邑数城镇，使胡宗南集团的后方补给线受到了很大威胁。7月中旬，根据中央通报，胡宗南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8个师的兵力，企图合围关中分区，然后北上陇东，配合宁马同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上级命令部队日夜兼程突出合围圈，警一旅旅部和二团、三团随即经正宁翻越子午岭，转移至陇东环县，跳出合围圈。

1947年8月初，进犯关中分区的刘戡部因北上榆林作战，警一

旅、警三旅和骑六师在王世泰率领下，趁机分路返回关中。8月14日晚，当警一旅到达正宁县杨家塬子、五顷塬，警三旅、骑六师到达九岷塬附近的盘克塬。王世泰命警一旅二团、三团速返九岷塬，与警三旅、骑六师一起消灭这股敌人。15日拂晓，刘懋功带警一旅到达西洼村，执行诱敌而消灭之任务。根据王世泰的命令，警一旅三团在西洼村向北面方向正南抗击敌人，骑六师和警一旅二团在警三团的东北方向的槐庄子抗击敌人，警三旅五团在警三团的西面九岷塬抗击敌人。警三团和警五团由王世泰亲自指挥，骑六师(只有一个团)和警二团由刘懋功指挥。

15日上午10时，在部队还没有完全部署好的情况下，敌人便发起了进攻。只见成千上万的敌人首先扑向警三团阵地，其兵力远不止一个团。原来敌情侦察不准，以为敌骑兵团只不过是一支先头部队，其实紧跟其后的是国民党第八十二师师长马继援(青马)率领的骑八旅、一〇〇旅、独立骑五团及4个独立营共8个团的兵力。而解放军实际只有4个团，与敌之比为1:6，且关中地委机关和警一旅、警三旅后勤辎重都跟着部队。在无法摆脱敌人的情况下，王世泰果断改变作战计划，令警三团、警五团坚决阻击敌人，掩护骑六师、警二团和地委机关、后勤辎重部队迅速转移。冲击敌人嗷嗷狂叫，枪炮齐鸣，警三团奋起抗击并将敌击退。敌人督战队舞刀挥枪驱赶士兵，一次又一次地猛扑，警三团拼死苦战。三营在军条庙梁坚守10个小时，在前沿阵地上的3个排遭到很大的伤亡；在三营左侧岷险防守的二营五连“穆光成排”全排壮烈牺牲，敌人也死伤惨重。此间，警五团擅自撤离阵地，使警三团的左翼完全暴露给敌人，但该团始终坚守在阵地上。骑六师和警二团在警三团的掩护下，边打边撤，同地委机关和辎重部队迅速向东转移。直至下午4至5时，警三团才撤出战斗，但警一旅旅直机关和后勤辎重部队在转移过程中遭敌袭击，部分人员被冲散。

16日早晨，王世泰率部到达黄陵县上畛子地区。上午10时，敌骑兵尾追而来。刘懋功一边率警二团阻击敌人，一边令警五团迅速向

王世泰靠拢，并一同向关中南部转移。警二团四连奉命抢占上畛子西北的北梁骆驼项，以控制山梁两侧的通道。连长陈汝义带领全连连续阻击敌人4个小时，直至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因敌我双方争夺激烈，全连90人，只有17人撤出阵地。下午，敌主力部队又在正宁县北之万家梁(今属旬邑县)追上警三团(敌一部向北追击警五团)，团长葛海洲率领二营顽强阻击敌人，直至天黑掩护指挥机关和后勤辎重部队安全转移。这时，全营仅剩下百余人。

16日晚，鉴于险恶的敌情，王世泰决定部队分头行动。由高锦纯旅长带警一旅旅部和骑六师向东面的建庄(在今黄陵县西南)方向转移；警三团和警三旅旅部由王世泰、牛书申率领，向西面的正宁县东北方向转移。

17日早，当王世泰、牛书申率警三团和警三旅旅部西撤至雕灵关时，被敌骑兵追上。此时，部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和行军，粒米未进，弹药无几，损失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在此情况下，团长葛海洲、政委曹光之坚决执行命令，由二营、三营在正面抗击敌人，一营由葛海洲亲自率领向北边打边退，将敌人引开，以掩护指挥机关和辎重部队迅速撤退。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骑兵轮番冲击。警三团不惜任何代价拼死抵抗，誓与阵地共存亡，战斗极为惨烈。下午4时，一营被敌人冲散，二营被敌打乱建制，指战员们便各自为战。天黑时，敌人因伤亡惨重，被迫停止了进攻，指挥机关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安全转移。

18日，警一旅根据王世泰“返回关中”的命令，刘懋功率警二团到达雕灵关，然后，经马栏川南下，翻越郭家掌到达七界石，并在此与牛书申副政委及收拢后的警三团汇合。19日，警二团、警三团与高锦纯旅长及旅直机关和辎重部队在旬邑县甘草坪汇合，然后到赤水县土桥镇地区休整，补充兵员。

九岷塬、雕灵关阻击战连续打了3天2夜，共击毙敌正副旅长各1人，团长2人，歼敌1700余人，俘2000余人；警一旅也付出了重

大伤亡、丢失两门山炮和一些装备。从总体上讲，这是一次失利的战斗，主要原因是情报不准，敌情判断和作战指挥有误，部队仓促应战等造成的。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1947年8月20日，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在米脂县沙家店地区被西北野战军主力围歼，史称“沙家店战役”。至此，胡宗南在陕北既要对付彭总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又要兼顾抵御南渡黄河的陈谢兵团，兵力已捉襟见肘。胡宗南在黄河以西、延安以南的黄龙山地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驻守。此时，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彭总瞅准敌人的部署弱点，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决定开辟黄龙山根据地，分兵内、外线配合作战。9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六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由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阎冬季才到任，此前王世泰兼任政委)。从此，这几支部队由地方部队主力升格为野战兵团主力之一，并由旬邑地区向外线黄龙山地区进发，以策应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内线陕北的作战行动。

几支主力部队离开关中分区之后，国民党军暂二旅、新九旅和一三五旅四。四团、保七团、保三团及“青马”一部接踵而来，对关中分区新正、赤水、淳耀县和马栏进行“清剿”。在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出击白水时，警一旅、警三旅、关中分区游击队和民兵配合西野四处行动，处处设伏，追敌退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12月，国民党军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配合暂二旅、新九旅和保七团、保三团等，以奔袭、夜袭等战术，对关中分区再次进行“清剿”。警一旅、警三旅、关中分区游击队和民兵紧跟背后和两侧，予以尾击和侧击，全歼了国民党邻县自卫营和礼泉县保警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在历时10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警一旅、警三旅及关中分

区游击队和民兵共歼敌 4300 余名。同时，关中分区所辖地域扩大了将近一倍，人口由 12 万人增加到 17 万人，武装力量扩大了三分之二，关中分区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和武装进犯中不断发展壮大。

## 第五节减租减息支援新解放区和支前

1947 年冬到 1948 年初，人民解放军进行冬季整训和大练兵。

1948 年 3 月至 1949 年 11 月，西北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宜瓦战役、西府战役、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取得了转入外线作战的节节胜利，歼灭了胡宗南部大部有生力量。这一年，关中分区根据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采取减租查租，清算斗争和征购土地给农民，以及抽补调剂等方式，逐步帮助农民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946 年冬，关中分区开展了减租复查和保佃清算斗争，发动地主献地。新正、新宁县在炮火中开展归地、查地、清算和献地斗争，将 6 万多亩土地分给农民。但由于减租、清算中发动群众不够，使一些地区的地主、富农还保留较多较好的土地，与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悬殊过大。1947 年 10 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关中分区在基本区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土地工作以发放土地证、确定地权为中心。1948 年春，在土改工作中曾发生过“左”的偏差，后根据中共西北中央局指示，老区土改不再搞土地平分，而是以抽补调剂、确定地权为主。当年 9 月后，老区农民差不多都得到了平均的土地。此后，关中分区改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使广大农民普遍得到数量、质量大体平均的土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其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1948 年冬，中共关中地委为使土改工作进行顺利，在老解放区普遍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在新解放区开展了“三反三建”（即反特、反霸、反贪污，建党、建政、建团）工作。经过整党运动和“三反三建”工作，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了很大进步，为土改工作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关中分区党政军民担负着配合主力解放大关中的光荣使命。中共关中地委在各县解放前夕就把干部配备起来，并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参战，摧毁国民党保甲组织，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清匪反霸，开展支前等工作。1947年9月，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出击渭北，关中地委根据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指示，选派200名干部去新区工作。谢华等一部分陕南干部回商洛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武装力量，迎接主力部队进入商洛山区。随后又抽调30多名党政军干部，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加强东府和渭北工作。1949年二三月间，为配合第一野战军在渭、洛、泾河沿线发动春季攻势，迎接东路地区的解放，关中地委指示东路工委为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四县配齐了干部。1949年三四月间，在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陕西解放区日益扩大，渭北和西府各县解放在即。为满足新解放区的干部需求，关中地委抽调分区各县以及各工委一批党员干部，经过短期培训，派往新区开展工作。同时，关中地委还为全区各级党、政、军、民、学、财等部门配备了副职，用正职带副职的办法培养干部，以便随时派往新区，加强新区工作。

在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关中国统区、抽派干部支援新区工作的同时，关中分区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在分区及各县均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全分区人民不遗余力地支援人民解放军。据不完全统计，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间，关中分区三次征兵4580名，做军鞋13.8万双，出动担架4275副，运输牲口3427头(匹)，参加人员1.2万人。在支前工作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支前模范和先进典型。1947年3月的西华池战斗中，新宁县男人抬担架、搞运输，妇女磨面、烙干粮，为部队提供担架840副，运输牲口1200头(匹)；供给面粉2.2万斤，小米1.6万斤，干粮近万斤，做军鞋1200gX。全县组织2000多名干部群众为部队修筑工事，运送伤病员，输送弹药。新宁县的支前工作受到关中地委的奖励。1949年初，新正县组成350多人，担架77副，驮畜40多匹的支前大队跟随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军三师转战西安、兰州、青海等地，圆满完成作战任务，荣获“奋勇前进、积极支援”锦旗一面，并受到奖励。

10 个月的自卫反击作战，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带领全分区人民群众，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自卫作战的胜利，在动员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贡献。

## 第六节 关中分区党政军组织完成历史使命

1948 年 9 月 21 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六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阎冬季到任)，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六师由地方部队主力升格为野战兵团主力之一，警一旅改编为四军第十师，警三旅改编为第十一师，骑兵师和警四旅改编为第十二师。

1949 年 2 月初，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旬，为了打乱胡宗南集团的战略退却计划，第一野战军决定发动春季攻势，彭德怀司令员去西柏坡参加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和解放太原，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指挥各军向敌人发起进攻。四军向铜川、耀县、淳化出击，吸引敌主力西顾，然后集中其他 4 个军围歼蒲城守敌。步十师奉命配合步十一师进攻铜川之敌三十三师(对内称二十师)，得手后再歼耀县、淳化之敌。

1949 年 2 月 19 日，第十师和第十一师解放了铜川县的石柱塬和文明塬地区，交淳耀县接管，县政府随即在此设立了石柱、文明两个区公署，依次编为淳耀县第七、八区。至此，中共淳耀县委和淳耀县政府下辖 8 个区委和公署、38 个乡党支部和 41 个乡政府，全县有党员 757 名。县委机关驻庙湾。

2 月 20 日晚，十师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耀县进攻。21 日晨，敌驻耀县之六十九军和刚逃到耀县的三十三师、十四师四十团闻风而逃，十师随即占领耀县。

1949 年 2 月 20 日，耀县全境解放。张仲平、封正宝于 22 日先后率县委和县政府部分干部进县城接管工作，在县政府办公室召开会

议，研究决定分东、南、西、北和富平的洪水等5个工作组下乡宣传政策，安定民心，接管乡公所，建立临时政权，动员学校开学上课。3月初，新解放区乡级政权普遍建立，中共耀县执委会、耀县县政府随即建立了东、南、西、北城乡5个区委和公署。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便于行政管理，对区划做了调整。3月7日，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撤销淳耀县建制，辖区原耀县部分并入耀县，原淳耀县县委和淳耀县县政府先后向中共耀县执委会和耀县县政府移交了手续。淳耀县游击大队部亦同时撤销，其所属3个中队及武器装备均按原建制移交耀县游击大队部。

解放耀县后，23日，第一野战军向富平、淳化国民党军发起攻势，四军十师经过4个小时的急行军，于当日11时到达淳化县城时，发现敌人正准备逃跑，随即截断敌退路。向敌侧后发起冲击，将敌人压至沟底，并快速完成了对敌人的分割包围。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敌人，包括国民党淳化县县长谭亚东在内，共毙伤俘敌519人，缴获轻重机枪27挺，六0迫击炮6门。

24日，淳化解放，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将中共赤水县委改为淳化县委，白天民任书记，隶属于关中地委领导，机关迁回淳化县城。

胡宗南在铜川、耀县、淳化等地连遭重创以后，不甘心失败，复纠合青马向关中平原咸阳、西安窜犯。3月5日，敌集中其主力部队11个师于泾阳、三原地区，全线逼近。10日，其五十二师已占领三原北部的马额镇一带；青马八十二军3个师及一二九军1个团在胡宗南五十七军的配合下，占领了淳化、耀县县城和通润、凤凰山、铁王等地。两县党政军机关随即撤出县城。

3月10日晚，四军十师奉命背靠柳林监视耀县方向之敌，掩护军直和友邻部队向耀县以北转移休整。师首长遂令二十八团集结于南村、北村和空头地区，向淳化方向警戒；二十九团1个营留守稠桑、麻子村，向耀县、马额镇方向警戒，主力集结于道东村，向项牛村方向警戒；三十团集结于高山槐、柴厂子一线，向铁王镇方向警戒。

11 日下午，敌骑兵迂回侧击十师墓坳塬以东左翼阵地，项牛村正面之敌乘十师二十九团一、三营交替转移的空隙，突破了阵地。十师二十八团三营和二十九团百余人迅速占领北墓坳塬以北高地，连续两次对敌发起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激战中，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张兴发指挥全连对敌指挥所实施猛烈轰击，马步芳之得意骁将、敌二四八师少将师长兼骑兵纵队指挥官马德胜被当场击毙，其参谋长也被炸成重伤，部队顿时失去指挥，仓惶溃退。师首长即令部队全线出击，二十八团三营、二营猛追敌人，将墓坳塬以南阵地全部夺回；南村之敌与我二十八团对峙，在二十八团一连和三十团三连的猛烈反击下，狼狈溃退，二十八团乘胜追击，将敌 3 个连全部压至沟底，大部被歼灭，小部逃窜。当时 7 时，战斗即告结束。

墓坳塬之战，是四军首次给青海马步芳集团以沉重打击。在敌两倍于己的情况下，共毙伤敌人 1080 名，毙伤俘敌战马 500 多匹，救出三原县被俘人员 15 名。战后，胡宗南为收买人心和收拾残局，在西安为马德胜举行了追悼会，并奉蒋介石之命，追授其上将军衔，国民党政府还将耀县改为德胜县，以表其“悲痛”与“怀念”。二十九团二连受到了军首长的通令嘉奖，号召全军向他们学习，其党支部也被命名为“刘福光支部”。彭总在礼泉县城对十师伤愈归队的干部讲：“在墓坳塬你们打得好！打了个大胜仗！打死了他们的师长！”

这一仗胜利，丢失暂短时间的耀县、淳化、铜川等县城失而复得。

1949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关中地委：从 4 月 4 日起，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三原地方委员会。5 月 20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决定将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为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此前，中共中央西北局、解放军西北军区将关中军分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三原军分区。至此，历时 12 年的关中分区党政军组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第十三章

#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方面创造的宝贵经验为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贡献之一——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地区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红色武装割据理论。**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先后在陕西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等大小 70 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但都因没有牢固地掌握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形成红色割据，建立红色政权而以失败告终。1931 年 9 月，刘志丹等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倒水湾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这是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结前面历次起义、兵变失败的教训之后的一个创举。他们认为，党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使其发展壮大，才不至于像历次起义、兵变中那样很快被国民党军强势扑灭，才可能有机会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南梁游击队”是西北地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刘志丹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觉实践毛泽东红色武装割据理论的起步和开端。

1932 年 2 月 20 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刘志丹、谢子长等率领的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照金，包围缴械了正在耍社火的耀县民团一部，趁机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为人民办事的队伍”等革命道理，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

“打土豪，分田地”。教育被俘的团丁不要作恶，欺压百姓，要做好人，随后将他们全部释放。红军来到照金的消息很快传开，群众对红军有了初步认识，对革命道理有了初步了解。此后，陕甘游击队多次来到照金、香山、芋园等地活动，召开群众大会，讲解革命道理。通过多次活动，宣传教育了群众，也使得刘志丹、谢子长等看到了照金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为之后在这里创建根据地打下了伏笔。

1932年9月，刘志丹与来到照金开展革命活动的习仲勋在照金杨柳坪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在充分总结历次起义之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建立根据地，而且必须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他们认为，“陕甘地区先后举行的大小70多次起义和兵变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这次会面，进一步坚定了刘志丹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创建根据地，实践毛泽东红色武装割据理论的信念。

基于这种思想，受刘志丹同志的委派，1932年秋，习仲勋、李妙斋来到了照金芋园一带深入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开始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活动。之后，随着同年9月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坟滩一举全歼同富耀(同官、富平、耀县)三县民团300多人等诸多军事斗争的胜利，随着照金芋园、高山槐一带群众的充分发动，也随着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官君转角村(现归旬邑县管辖)的成立以及在军事斗争中的节节胜利，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条件逐渐成熟。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余理科任特委书记，委员习仲勋(兼特委军委书记)、李妙斋、师克寿。同年6月，金里科调回省委，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增选张秀山为特委委员。4月5日，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岳家山召开，

选举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等职能部门，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再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在基层政权建设上，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边区革委会发动并领导群众按照中央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塬、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委会，选举产生了一批有觉悟、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至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成功。其中心区域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迄断头川、王家沟，南至老牛坡、桃渠塬，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四县边界，约有 9 个区乡，总面积约为 2000 平方公里。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虽然因为杜衡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曾出现过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遭受过全军覆没只有部分骨干人员返回的厄运，但随着渭北游击队北上照金、耀县起义后王泰吉抗日民众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三支武装力量陆续来到照金，革命力量又得到了及时补充。也随着陈家坡会议的召开，三支武装力量得到整合，统一了认识，坚持了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方向，恢复了红军主力，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制订了不打大仗，集中优势兵力，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创了新的革命局面。虽然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薛家寨曾因叛徒引路一度失陷，革命志士周冬至等惨遭杀害，但跳出重围的红军主力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而是在更广泛的地区开展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且，随着包家寨会议的召开，成立了红四十二师，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即今天的子长县为中心；第二路以甘肃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心转移到了甘肃南梁。随着第三路游击队革命活动的深入开展，照金苏区又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虽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照金的时间很短暂，但这块红色的土地，革命高潮迭起，至新中国成立，始终保持着一片明朗的天。

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在这一地区，用自己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所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这就是必须建立根据地，而且必须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并以她为依托，来完成土地革命和创建红军的历史任务，达到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目的。

**贡献之二——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实践为后来整个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政策制订提供了依据和经验。**

土地历来是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要更好地开展军事斗争，建立政权组织，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不解决好土地问题是不行的。只有解決好了土地问题，才能贏得广大贫苦大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的理解和支持，才能为更好地开展军事斗争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红色政权才更有号召力和感召力，从而才能最终贏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习仲勋、李妙斋等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深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结合照金地区绝大多数土地被少数几家地主和寺院占有，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倍受地主奴役和盘剥的现状，根据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深入乡村，和基层干部一起组织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分配的意义和政策。没收地主、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然后采取上级指导，乡村革委会与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共同负责的办法，确定分配对象，统计户数人数，研究分配方案，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分配的原则是：贫雇农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采取两种形式进行分配：一是谁种归谁，确认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不再向地主交纳佃租。二是由贫农、雇农代表统一丈量全部没收的土地，测定每块地的标准、等级，然后，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标准分配。在分配土地的同时，陕甘边革委会还宣布，废除地主强加给农民的佃租、欠债和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

由于农民得到了世代渴望的土地，被从苛捐杂税与租债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因而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红军部队。也使他们从事实上认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之间的根本区别：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而国民党反动派只是为少数的剥削阶级服务的。正因为如此，在照金地区出现了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感人局面。在土改期间，先后有 30 多名优秀青年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青年男女参加了游击队。人民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动，男人们不分昼夜地为部队运粮送草、修建工事、打造堞墙，妇女们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面粉、做饭洗衣，军民之间建立了十分融洽的鱼水关系。

正因为有照金时期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也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调整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提供了依据，积累了经验。出台了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这些土地政策的制订、调整，不但有利于发展边区经济，壮大根据地建设，同时，也为赢得民族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贡献之三——在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得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李妙斋等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陕甘地区大小

70 多次起义、兵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建设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及时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尤其是红二十六军南下受挫之后，他们敢于面对挫折，敢于面对错误和问题，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纠正了错误，恢复重建了红二十六军，挽救了危局，制订了正确的行动路线。在照金一时失陷的情况下，他们又一次表现出了不屈不挠，勇于探索，在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良好品格，在深刻总结照金时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了把根据地中心转到甘肃南梁地区、建立三路游击区、扩大陕甘边根据地

的规模的决定，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壮大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为他们身上的这些美好品德的存在，才使得陕甘边革命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形成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才使得西北地区革命形势始终处于上升和发展的状态，才有可能使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发现这块红色的土地并将其确定为长征的落脚点，才有机会使这块红色的土地成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出发点。这一历史史实正如习仲勋回忆的那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 **贡献之四——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骨干**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初始到重心转往南梁，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在这里为中国革命聚集、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除根据地与红军卓越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李妙斋等以外，还聚集和涌现出了高岗、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王世泰、张策、张仲良、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蔡子伟、王兆相等一大批领导干部，照金人物目前可考得姓名的就有 298 人。他们除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能动作用外，还为陕北根据地的开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委派骨干，组织地方武装，促进了陕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为陕北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933 年初，刘志丹指示

强世清回陕北(保安、安定)开展武装斗争，先后惩处恶霸地主 薛应九、黄土奎等，拉起 T60 余人的革命游击队。同年 4 月，改 编成中

国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强世清，政治委员李成荣，李成荣战斗牺牲后，刘志丹委派杨重远担任政治委员，杨重远牺牲后，又派魏武接任。1933年8月，习仲勋派红二团南下失败只身回照金的王兆相回陕北特委。马文瑞让王兆相组织神府地区游击队，同年10月，王兆相拉起了以“特务队”起步的武装组织并担任政委，不久，特务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王兆相任队长。二是委派军事技术骨干人才支持武装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和各地游击队的壮大，武器弹药、枪支修理的需要量愈来愈大。像神木的王保山、吴堡的杨琪、瓦窑堡一带的强世清(等游击队)庆阳的二路游击队、坪子游击队等，也都常带着游击队来照金，既要补充武器弹药，又要修理枪械。”照金都给予了他们最大限度的支持。除给他们物资上的补给之外，还为他们派去了枪械修理和制造方面的技术人才。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持了陕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为创建陕北根据地做出了特殊贡献。三是在陕北根据地的开辟过程中也给予了他们以兵力支援，协助、策应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活动。较大的一次策应活动是在粉碎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对陕北根据地的疯狂“围剿”时期。谢子长率部南下陕甘边(南梁)以取得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帮助和支持，红二十六军果断伸出援手，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随谢子长转战陕北。经过安定县武家塔、绥德县张家圪台、清涧县河口镇、衡山县董家寺等战斗，在一个月时间里，拔掉国民党据点3个，击毙国民党军200人、俘100人，缴获枪支160余支。由于我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威慑国民党军不断哗变，削弱了其军事力量，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围剿”。

总之，照金时期所聚集、培养的这些人，不仅保障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和健康发展，也为创建陕北根据地、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遍布于党、政、军各个方面，发挥着骨干作用。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经受了战火洗礼之后，幸运地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终生。

贡献之五——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创造的照金精神汇入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延安精神的重要起源。

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艰苦岁月中，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革命先辈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边区干部群众在战争年代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熔铸成了照金精神。它是照金革命的灵魂，是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因为以照金为起点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它的整体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央落脚陕北后的历史洪流，也因延安精神是在中央落脚陕北这一时期形成的，所以，以照金为起点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创造的照金精神，理所当然地汇入了后来形成的延安革命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

照金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定信念、不断探索的精神。无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还是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巩固以至重心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是革命形势顺利、喜人还是处于低潮甚或是极其艰难的背景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坚定异常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未动摇。他们总是在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夺取革命胜利的新路子。他们受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启发，结合西北地区的具体实际，不断探索，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地创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使其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并将根据地与相邻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是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领导人坚持从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一时期，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主席习仲勋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

命，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前线，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三是坚韧不拔、顾全大局的拼搏精神。照金革命根据地多次受到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等领导多次受到错误的排挤和打击，根据地和红军几遭严重损失。但是他们坚持真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坚持和维护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地对“左”倾错误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使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并“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四是忠诚于党、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为其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们之中，不乏优裕的家庭环境，一些还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和广大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毅然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不慕荣华富贵、不求高官厚禄，不羨金钱地位，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舍生忘死，不顾一切，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表现出了对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极度忠诚。

历史虽已翻过了无数章节，时代也在不断地飞速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走过了 90 多年的漫长岁月，渡过了无数急流险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辉煌成就。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应从历史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应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力求把我们今天的各项事业做得更好更精彩，昂首走向更为辉煌的明天。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贡献不会磨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造的照金精神永放光芒！

为照金革命根据地建设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永垂不朽！

# 《照金革命史》大事记

## (1931—1949)

### 1931 年

春张邦英在 1931 年 2 月前后，当部队开到甘肃时，介绍一块当兵的同乡杨再泉、张仲良先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月张仲良、杨再泉返回耀县开展党的活动，张仲良又发展陈学鼎入党并与从天津返回的共产党员刘林圃接上关系，在杨家河杨再泉家主持成立了耀县历史上第一个中共耀县支部，张仲良任支部书记，有 5 名党员。

10 月下旬阎红彦率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

12 月中共耀县支部按照中共三原武字区委的指示，改支部为特支。张仲良仍任特支书记，杨再泉、宋子岐、刘林圃分管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 1932 年

1 月初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宣布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

2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

2 月 13 日陕甘游击队攻克旬邑县职田镇。

2 月 15 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毙伤俘

敌 500 余人，缴枪 150 多支。

2 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奇袭焦家坪民团获胜，缴枪 70 多支，后西进陇东。

3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要求游击队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西游击，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3 月 22 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陕甘边第一个革命政权——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成立。

4 月上旬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高维翰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

4 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照金，偷袭照金成功，全歼照金民团。转而消灭了瑶曲民团和驻焦家坪国民党军一个连队，击退了富平、同官、耀县民团。

4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将游击队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五两个支队，并独立活动。

4 月 20 日中央根据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

4 月 21 日陕甘游击队奇袭旬邑县城，全歼守敌 300 余人。

4 月耀县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抗债、抗租”的斗争进入高潮。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仲良等在群众中秘密宣传、联络、组织，用鸡毛信的办法集中西塬小土丘一带数千名农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交农”围城斗争，火烧耀县西城门，迫使国民党县长李建堂接受“减免粮税、停建东营”的条件，取得了“交农”斗争的胜利。

5 月 特支书记张仲良因领导“交农”斗争，被耀县当局逮捕，经党组织营救，40 多天后获释。

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便于统一指挥，决定恢复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高维翰为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

5月15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夜袭宜君县马栏镇(今旬邑县)，一举歼灭井岳秀八十六师两个连及民团，缴获长短枪200余支。

5月17日红军陕甘游击队继续北上，先后于凤凰山、五里镇、焦家坪连打三个胜仗，歼敌500余人，缴枪500余支，然后转战于中部、宜君、富县、洛川地区。

6月1日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建议》指出“创建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是陕西全党的一个中心任务”。

6月26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六省代表会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7月中共三原县委恢复，耀县特支归属三原县委领导。不久，中共耀县特支改为中共耀县区委。

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建立红二十六军，先成立一个团。

9月习仲勋到达照金，在杨柳坪与刘志丹首次见面。

秋陕甘游击队派习仲勋、李妙斋到达照金，在芋园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黄子文率渭北游击队上照金，在高山槐、胡家巷一带发动群众，成立农民联合会等组织。

9月初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部警备97、98团从正宁、宁县等地自西向东进攻，井岳秀八十六师五五一团由同官向西北步步逼近。富平、耀县、同官民团由耀县向西进攻，企图“围剿”陕甘游击队于照金。

9月12日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坟滩、寺坪歼灭进剿的富平、同官、耀县民团一部，活捉富同耀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党谢芳和小坵民团团长柴志发，击毙耀县保安团团长马希哲和连长康德润，缴获长短枪300余支。

9月中旬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被敌杀害。三支队特务队即由习仲勋从照金带到武字区，被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又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主要在富平、耀县边界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对红二十六军的编制、任务、战略战术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10月8日张仲良、张邦英到三原武字区长坳堡参加了渭北各县联席会议。讨论了10月6日省委作出的《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

10月芋园农民游击队建立，邓克勤担任队长，王清兰担任妇女代表、地下情报员。

11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按照中央指示和陕西省委《关于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工作的决议》精神，集结于照金，实施省委《军事计划》。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红军游击队领导研究决定，全面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2月16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组织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开展轰轰烈烈的分粮斗争。先后组织70多个村庄的数千名群众，进行大规模武装分粮斗争30余次。

12月18日杜衡受省委派遣来到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负责组建红二十六军。

12月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决定，并错误的指责游击队领导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谢子长、刘志

丹、闫红彦、杨重远 4 人的职务，并将谢子长、闫红彦送中央(上海)受训。

12 月 22 日陕甘游击队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选举王世泰为团长。

12 月 24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军委政委兼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师克寿任共青团委书记。

12 月 26 日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全歼宜君焦家坪(今属铜川印台区)民团，俘团丁 60 余名，缴枪 60 余支。

年底照金地区普遍建立村级农会组织和妇女联合会。当时的农会主任有：王文强(芋园)、马长贵(房上村)、王满堂(陈家坡)、李胜明(韩家山)、杨玉财(黑田裕)、李龙发(碌碡坪)、张老五(大崖子)、潘克军、朱贵(老爷岭)、潘克顺、丁月良(金盆)、陈开榜、白明礼(北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有：阮金莲(北梁)、杨秀珍(绣房沟)、王氏(老爷岭)等。同时在红军主力帮助下，照金地区相继组建了香山、芋园、照金等几支农民游击队，统称陕甘边游击队，由李妙斋统一

## 1933 年

1 月上旬红二团来到耀县香山寺，开仓分粮，以济饥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约 10 万人参加了分粮斗争。不日，红二团西进，消灭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活动范围扩大到照金薛家寨一带。杜衡指示火烧了香山古刹。

1 月 4 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照金根据地成立陕甘边特委。

1 月 17 日红二团夜袭庙湾，翌日晨与夏玉山民团接火，战斗失利，伤亡二、三十人，骑兵连连长曹胜荣阵亡，指导员张秀山负伤。杜衡撤销郑毅参谋长职务，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1 月中旬金理科奉陕西省委指示到达照金根据地，负责组建陕甘

边特委。

1月27日红二团骑兵连夜宿宜君衣食村(今属耀州区瑶曲镇)遭夏玉山民团偷袭，战马损失过半。

是月红二团在瑶峪村建立中共香山区委，周德福负责。10月周德福遇害，区委解体，时有党员80余名。

是月汪锋受陕西省委派遣到达红二团。组建红二团随营学校，校长李杰夫，政委汪锋。

2月李妙斋率陕甘边游击队进驻照金薛家寨。根据地军民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整修崖洞，相继建立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设施。薛家寨成为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机关所在地。

2月4日杨虎城部骑兵团、特务团两个营，纠集庙湾民团，分三路进攻红二团驻地芋园，我军无备受挫，丢掉四门“榆木大炮”，时遇渭北游击队赶来接应，突出合围，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英勇斗争，敌军被迫撤出。

中旬照金妇女游击队在北梁成立，王有莲任队长，进驻薛家寨后发展到30多人。

3月3日红二团结束外线作战，返回照金。

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中共陕甘边特别军事委员会、共青团陕甘边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一并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共青团特委书记由师克寿担任。不久，机关驻地迁至照金薛家寨。并先后建立了北梁、黑田裕、金盆、老爷岭、香山等基层党组织，特委下辖耀县、旬邑两个县委及苏区党组织。

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正式给红二十六军下达了重要指示，其任务是加紧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新苏区，组织苏维埃正式机关，实行分配土地，武装工农。省委又指示：照金地区开展分地运动，没收地主庄院，把土地分配给基本农民，指出“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现时条件

下，由农民联合会、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的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任务。”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派习仲勋、金理科等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或重要成员，以及党团骨干前赴照金，参加领导照金苏区的工作。

是月根据省委指示，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驻地照金薛家寨，统辖耀县、三水(旬邑)、宜君一带的地方游击队。李妙斋任总指挥(后由黄子文、吴岱锋接任)，习仲勋任政委(后由张秀山接任)，史进才任参谋长。

3月下旬红二十六军东进同官攻打金锁关截断成榆公路后，又折转南下三原武字区歼敌一个排，奇袭泾惠吊儿咀民团。

是月耀西游击队到照金，归属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编为第七支队，队长任连俊、指导员李文喜，后隶属第三路陕甘边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经常活动于淳化、耀县交界地区，又称淳化耀县第七支队。

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岳家山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文化教育等职能部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再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机关驻地薛家寨。

4月13日红二团在旬邑土桥镇歼敌30余人。接着，又在彬县

龙高镇全歼守城民团。

4月15日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成立。

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四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

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分兵四路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避实就虚，留陕甘游击队于苏区领导人民斗争，红军主力迂回敌后，寻机歼敌。

是月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对所属的游击队进行整顿，撤销原来的二十三支游击队建制，重新整编为一、三、五、七、九、十一支队和妇女游击队。

春夏之交边区革委会在薛家寨山下建立亭子沟集市贸易市场，不仅方便了周围群众，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红军的生活和其它必需品，从而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苏区经济。

5月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和照金地方基层党政机关团体，根据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在芋园、照金、绣房沟、大崖子、香山、陈家坡、北梁、老爷岭、黑田裕、杨家山、碌碡坪、杨柳坪、孙家山等村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6月初杜衡由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金理科调回省委，秦武山接任陕甘边特委书记。

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杜衡否定刘志丹等人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发展和巩固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命令红二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建立根据地。

6月21日红二团由照金北梁出发，南下渭华。23日红二团行至三原长坳，杜衡离开部队向省委汇报工作，政委由汪锋代理。

24 日，红二团从高陵渡过渭河。

6 月 25 日红二团一日五战，冲破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及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行军百余里到达蓝田流峪口。

夏陕甘边游击队攻克宜君民团五里镇墩，击毙了团丁张韩珍，俘获敌人、枪支各 20 余，将其衣物粮食分给穷人。

7 月中旬红二团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张家坪激战，伤亡很大。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带部队分别突围，在秦岭山中转战。

7 月 20 日陕西省委派杜衡、杨声专程到耀县，并指示张仲良当日从西安赶回耀县。下午在城内曹雯家召开耀县县委会议，研究部署配合王泰吉起义和成立耀县游击队的具体事宜。

7 月 21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党杨虎城部驻防耀县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中共耀县县委为配合起义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宣传抗日救国，安定民心，镇压反革命分子，没收并分配地主的粮食。起义部队在耀县 7 天后南下三原，辘辘把一战受挫，在红四团(由渭北游击队支队一大队改编而成)接应下北上照金，在当地游击队和耀县游击队的配合下，一举除掉了照金后沟的民团据巢。

7 月 22 日耀县县委在党组织力量较强的阿姑社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张邦英，副队长张仲良。

7 月 23 日耀县游击队在阿姑社召开了五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斗争北区阿姑社村恶霸左善楚，当众烧毁了地主的债务契约。接着又处决了左善楚和东区孙原村作恶多端的张廉明。

7 月 24 日耀县游击队在方巷口收编了北区民团赵连壁部，时有队员 90 余人，枪 60 余支。

7 月 28 日耀县游击队集结白家庄进行整编，分编为三个中队。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为党代表、政治指导员，曹

雯任经济员。一中队队长陈国栋、二中队队长王安民、三中队队长张智怀，次日同县委其他同志率领游击队经道东、墓坳、高山槐转移到照金根据地。

7月底耀县游击队开赴照金，被改编为陕甘边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11月包家寨会议后，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被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

8月13日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由黄子祥、杨声率领由三原武字区北上到了照金根据地。

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习仲勋和秦武山主持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三支武装(红四团、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指挥，提出了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方针，加强了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对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8月下旬王泰吉率领陕甘边红军诱出庙湾民团，歼其一部；21日于高山槐打击张万里民团；24日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27日袭击柳林民团，消灭数十人。

9月21日国民党军刘文伯部纠集耀县夏玉山、雷天一民团和淳化、宜君、照金、同官、旬邑县民团约千余人，乘红军主力9月中旬离开照金西击旬邑等地之机，勾结叛徒陈克敏向照金苏区中心薛家寨发动疯狂“围剿”，企图占领薛家寨。苏区留守部队凭险据守，奋勇阻击，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和通讯员武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9月21日转入外线的红军主力，到达合水固城川，与强世卿率领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汇合。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部队南下，俘虏旬邑县朱鸿章保安团52人，奇袭张洪镇，俘保安团150余人，击毙12人，缴获枪枝120余支，物资20驮。9月22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撤出张洪镇，返回照金休整。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等在渭南、华县等地党组织帮助下辗转回到照金薛家寨。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10月12日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数千人的军队和民团对照金苏区发动进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主力红军再次北上。

10月18日在叛徒陈克敏带领下，国民党军队偷袭薛家寨得手。边区党、政、军机关决定分路突围，寻找主力红军。19日，照金苏区陷落。敌人在照金进行抢掠屠杀。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王万亮、王满堂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10月18日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率领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陕北一支队夜袭甘肃合水县城，毙俘赵文治团近

200人，缴枪100余支，合水县长及县城内的十几个大地主无一漏网，救出押在监狱内的80余名共产党员、革命骨干和赤色群众，同时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开仓放粮。

10月28日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在庆阳县毛家沟门地域毙俘赵文治团200余人，缴获枪200余支(挺)、弹药大部，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大振了红军军威，大灭了敌人的锐气。

11月3日至8日(有说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三路游击区，建立三路游击队；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共300余人。同时，师、团成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杨森任师党委书记，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34年1月，师长王泰吉前去豫西进行兵运工作，由刘志丹接任师长。

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挥师南下，宜君县杨家店子守敌一个连企

图偷袭红军。四十二师围歼该敌。共毙俘敌连长以下 120 余人，缴枪 120 余支(挺)，红军伤亡 30 余人。

冬第三路游击队帮助创建了中宜游击队，中宜游击队在中部、宜君、富县交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是年照金根据地各区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保卫红色政权。

是年照金地区成立了三个团支部，有团员 20 余人。

## 1934 年

春陕甘边特委为了加强对淳化、耀县、旬邑交界地区的领导，派郭洪超等人建立了中共赤淳工委和赤淳县苏维埃政府。

春节红四十二师为解决部队给养，减轻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南下进入耀县、同官，在原照金苏区及其周边地区打土豪，筹集部队经费。期间，拿下生义堡，没收了豪绅财产；收拾了黄龙山土匪杨谋子，缴长短枪 50 余支，杨谋子等罪大恶极匪首被处决。

2 月中共陕西省委将淳化与旬邑交界地区划为西区、淳化与耀县交界划为东区；在东区成立了赤淳县工作委员会，金理科任书记。

是月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张明吾(后由王安民、陈国栋接任)，政委黄子文(后由张仲良、张邦英接任)。其运用里应外合战术，攻克叛徒陈克敏踞巢龙家寨，开始恢复照金苏区。

2 月 25 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苏区小河沟四合台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人民的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等委员。

3 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从南梁进入照金地区，消灭瑶曲、大石板、五里镇民团 100 余人，然后转向西北、涉过沮水，进抵店头，歼民团一部。

4月23日红四十二师从耀县稠桑出发，兵分两路，攻打同官梁家塬和黄堡镇，击毙敌营长范子畴，生擒区长梁子峰。打开地方粮仓，分救济粮给贫苦农民和灾民。

4月26日红四十二师又将旬邑县保安团百余人，围困在淳化县甘咀村沟边一个打麦场内，经激烈战斗，击毙敌连长，歼敌数十人。

夏末红四十二师又在宜君偏桥伏击去肤施(延安)上任的国民党县长及其随从。

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重建，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等任委员。

5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今黄陵)小石崖设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黄子文。

7月陕甘边特委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四十二师以最大的力量，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恢复照金苏区。

9月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张邦英任书记，黄子文任主席，区委机关驻中部县小石崖，下辖中共耀县县委、赤淳工委、淳耀县委、新正县委、赤水县委、永红县委及富甘、富西、中宜等县党组织。

11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被敌杀害于旬邑县甘草坪，时年23岁。

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

11月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改为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对外仍称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

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抽调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部分人员组成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

## 1935 年

春陕甘边南区游击队第六支队紧密配合当地农民赤卫队开展打土豪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台尔凹等 60 多个村建立起 16 个农民联合会和高山槐、高尔塬、寺坡三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及台尔凹区苏维埃政府。

2 月 5 日刘志丹在安定县周家峻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4 月 27 日淳耀县游击队配合红一团在赤水县马家山全歼敌联保主任焦世凤、郭日午所带保安团，并当场击毙焦世凤、郭日午。

6 月红四十二师由师长杨森率领，由黄陵县土桥到宜君县五里镇街，围攻了敌镇公所墩，开仓分粮济贫。

7 月张邦英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8、9 月富西、富甘、中宜等县党组织划归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直接领导。陕甘边区南区党委下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永红等 5 个县委。

10 月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南区苏维埃政府在桃渠原召开淳化、耀县交界地区(原赤淳县东区)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姚殿森任主席，隶属陕甘边区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

11 月第六、第九游击支队编入陕甘边南区独立营。

12 月陕甘边南区党、政、军组织撤销，陕甘边区南区改为关中特区。

## 1936 年

1 月中共中央派贾拓夫来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中特委及关中特委苏维埃政府。淳耀县属其管辖。

2 月关中特委派封正宝任淳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

4 月国民党调集东北军对陕甘边区及淳耀县大举“围剿”。淳耀县的主要干部疏散转移，工作一度转入地下。

5 月陕西省委撤销，成立陕甘宁省委。淳耀县归其领导。

9 月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托，在宜君马栏重新组织恢复了中共关中特委。淳耀县归其管辖。

12 月 24 日西安“双十二事变”的消息传到淳耀县，淳耀县在寺坡召开五、六百人的庆祝大会。

12 月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维汉到关中特区视察工作，与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研究赤水、淳耀县情况。

## **1937 年**

1 月上旬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和李维汉、张邦英等领导在桃渠河亲自参加淳耀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方面军在耀县城内设立办事处。

2 月 10 日汪峰在独立旅配合下在耀县除掉善于投机钻营的雷天一和叛徒陈克敏。

10 月淳耀县为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调整县委和政、军、群众组织机构。

是月为贯彻陕甘宁边区苏维埃制为民主共和制，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在区、乡选举的基础上，在驻地安社举行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淳耀县政府。封正宝为县长。

## **1938 年**

下半年淳耀县政府从安社迁潘家城。

12月 胡宗南对陕甘边实行封锁，对边区地区实行控制和破坏。

### 1939年

5月后国民党在陕甘边区周围修筑五道封锁线，驻扎部队多达数十万人，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进而逐步升级，对内实行“强化保甲，剿共清共”；对边区实行武装进攻，暗杀拘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冬八路军718团解放庙湾镇。

### 1940年

5月汪峰率警卫营智取照金，省委机关由安社村迁往照金。

6月11日独立一、二、三营与警备八团相互配合，一举歼灭照

金西侧赤水县郭相堂、李仰之两股贯匪200余人，匪首李仰当场被擒，在押解途中，将其处决。从此，照金周边安全有所好转。

### 1942年

春淳耀县在照金师家道、金刚庙村等设立“难民”乡，集中安置饥荒外来户和逃难人口约120户、300多人。

是年民生客栈(1940年初建立)更名为柳林联合客栈。是关中地委在北区建立的秘密交通站，它担负着传递情报、护送首长、筹买武器、购置药品食盐，兼做国统区统战工作及交通联络；客栈先后由邢子舟、刘永端、张仲平、徐晓东、陈效真、江平等各自在分管各项工作任务的特殊岗位上为革命默默奉献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始终保持单线联系。

### 1943年

3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将东行政区改为县制，成立了同(官)宜(君)耀(县)县党政机构。

10 月同宜耀县撤销，其辖区划入淳耀县，淳耀县党政机关设庙湾。

### 1947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4 日警一旅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转战 250 余公里，七战七捷，歼敌 2000 余人。至此，关中分区的淳耀、赤水、新宁、新正 4 县全部收复，分区党政机关恢复正常。

7 月淳耀县独立营在照金区民兵和瑶衣支队的配合下，分别在耀县高山槐、南司马梁等地歼敌一旅一搜索排，击溃保三团两个连。

12 月下旬国民党耀县移民并村工作队(又名清乡队)组成，对解放区小蚯、柳林、照金、白瓜、阿子等地推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

### 1949 年

3 月淳耀县游击大队部并入耀县游击大队部。

3 月 14 日中共耀县县委和耀县政府在瑶峪村白雀寺联合召开第一次科、部长会议，正式宣布陕甘宁边区的通令，淳耀县建制撤销，辖区并入耀县。

## 照金革命史参考书目

1、《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中共耀州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 1988 年 5 月编印。

2、《红二十六军在照金》，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公室 1987 年 12 月编印。

3、《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州区历史(第一卷)》，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版。

4、《中共铜川党史人物传》，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 1998 年编印。

5、《红色印迹》，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 2011 年 6 月编印。

6、张秀山：《从西北到东北——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版。

7、《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

8、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

9、《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

10、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铜川历史大事记(1925—2000 年)》。

11、《照金丰碑》，中共铜川市耀州区委史志办公室 2005 年 5 月编印。

12、《中国共产党耀县历史大事记》，征集编撰委员会办公室 1996 年 11 月编印。

1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版。中共耀县委员会史志(简本)，1992 年 1 月

14、《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6 年 3 月编印。

15、《民族英雄刘志丹》，中共延安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

16、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铜川党史通讯》期刊。

17、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铜川英烈》第三期。

## 后 记

照金，是全国红色旅游景区和陕西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照金革命史是关中革命史的重要部分，也是陕西革命史的重要章节，更是中国革命史的有益补充。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 1932 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建较早的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力地震撼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恐慌和混乱；同时，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配合支援了陕北、渭北、陕南、陇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唤起了千千万万陕甘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的觉悟，鼓舞了西北人民争取解放的勇气和信心，它又是红二十六军创建、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的坚强阵地。在创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中，党进行了一系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群众武装，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为以后进一步开展陕甘边革命斗争创造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物资基础。照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92 年 4 月 20 日，照金革命旧址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1995 年被省委、省政府定为陕西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 年，占地 6900 平方米的照金革命纪念馆建成开放，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理想场所。

为了记录和缅怀这段珍贵的历史，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了解照金精神，学习照金精神，发扬照金精神，中共铜川市委结合全国学党史活动的实际，由市委史志办负责编辑出版《照金革命史》一书。市委史志办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召开动员会议，抽调业务骨干，安排办公室和办公设备，全面开展编撰工作，成立了《照金革命史》编写组，承担本书的编写任务。

按照市委史志办的安排部署，编写组拟定了《照金革命史》目录，确定了各章撰稿人，各章撰稿人在大量研读收集到的资料文献的基础上，按照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体例、文字规范等要求进行初编，并对编写内容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几易其稿，于2011年8月下旬，陆续将初稿报送市委史志办。参加撰写初稿的作者是：

第一、二、三、四章：王亚东；第五、六、七、八章：杨妮；第九、十、十一、十二章：梁晓沛；第十三章：皇甫江，大事记部分由姚志贤同志搜集整理。

《照金革命史》初稿完成后，市委史志办组织力量，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市委史志办党史科科长皇甫江完成了全书的统稿工作。从事党史工作多年的王都喜对该书第一稿进行了初审。市委史志办主任谢常山、副主任刘建设、刘耀林对《照金革命史》进行了审读修改。2011年9月底，修改后的《照金革命史》初稿分别送给省委党史研究室、市上有关领导及有关专家、学者审阅，广泛征求了意见。

2012年3月27日，市委史志办召开审稿会议，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文琦携专家学者来铜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对《照金革命史》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本书在框架结构、史实、内容、注释、文字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会后，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处处长许发宏结合会议讨论意见，对《照金革命史》进行了全面修改。

《照金革命史》是在全市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凝聚了全市广大党史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心血。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力图实事求是地记述照金革命苏区从创建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阐明其历史贡献，总结其经验教训。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吸收了近几年来党史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吸纳了《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铜川市耀州区历史》等书的研究成果，在第五章的编写中，

还吸收了铜川市委党校陈建宏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照金是延安精神的重要起源地，照金精神最终汇入延安精神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该书在编写期间还受到耀州区委史志办、照金革命纪念馆等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向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共铜川市委、市政府、省委党史研究室对编纂出版本书非常重视，市委书记冯新柱、原市长王莉霞、省委省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辛栓明、副主任姚文琦、市委副书记张应龙等领导多次对该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进行指导，市委书记冯新柱、省委省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辛栓明还为本书作序，保证了出书任务的顺利完成。

为求本书文字翔实、数据可靠、事实有据，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并对史料作了逐一比对和考证。对矛盾存疑之处，我们坚持以党史正本为准，严肃取材入书。为求全书用词准确、时限精细、语言流畅，编写成员对初稿都作了多次的研读和反复的修改。印刷之前，赵瑛同志再次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校对、订证。但毕竟时间仓促，资料有限，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党史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年5月3日